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是可行的！

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是可行的！

## 日月今闻

坚持马列主义战争观，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4
一、战争的根源.....	5
二、现代战争的起源.....	5
三、战争的性质.....	6
四、战争成败的关键.....	7
五、战争、和平与革命的关系.....	8
从乌俄冲突看现代化军队：一支特化的力量.....	11
一、军队的现代化和职业化.....	11
二、现代化军队的强大之处.....	12
三、现代化军队不擅长的事项.....	12
四、民众的选择.....	14
共存、清零与自由人联合体.....	15
非苦防疫，苦官僚主义也.....	23

## 日月前事

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发挥革命者的历史主动性——苏联解体对当代共产党人的启示..	27
一、区分苏联解体、苏共下台和苏联资本主义复辟.....	27
二、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	28
三、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后国内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	31
四、如何防止胜利后再次复辟.....	33
五、结语.....	36
中国共产党白区学生工作的经验与启示(1937-1949)（一） .....	38
一二九运动.....	38
一、基本历史阶段.....	38
（1）抗日战争前.....	38
（2）抗日战争时期.....	39
（3）解放战争时期.....	44
二、典型案例.....	48
三、经验和启示.....	57
（一）坚持走群众路线.....	57
（二）灵活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和政策.....	58
（三）利用多样化的方式组织群众，开展宣传.....	58
（四）高度注重学生群众的利益.....	60
（五）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	60
群众运动的成功范例——波澜壮阔的一二一运动.....	63
一、抗争胜利前云南的各方政治势力.....	63
二、一二一运动前的云南政治局势.....	64
三、一二一运动的历史过程[12].....	64
四、云南省工委领导一二一运动的基本经验.....	71

## 日月精华

努力让大家一文理解马克思的逻辑.....	74
〇、提要.....	74
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	74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理解.....	76
三、资本主义的负面社会影响.....	80
四、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矛盾.....	82
五、马克思心中的「共产主义」.....	83
六、马克思「共产主义」主张背后的关键假设.....	85
负一、结语.....	86
分裂的胡锡进与主流意识形态困境.....	87
一、胡锡进思想的变迁历程.....	87
二、胡锡进言论背后的社会思潮.....	93
三、胡锡进思想的哲学基础.....	96
四、“老胡说事”的未来.....	98
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	104
一、知识分子.....	104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	106
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	107
四、结语.....	111
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趣味者”.....	112
四个概念——多维度的阶级划分与分析框架.....	116
资本家拥有大量财产后，为什么还要剥削无产阶级？.....	124
既然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过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美国也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吗？ .....	126
阶级斗争下可以发展经济吗？.....	127
为什么民族主义的战斗力相比别的主义更加强大？为何近代国家多以民族主义作为团结国家的意识？.....	130

## 日月奇谈

恩义.....	132
烟魔.....	135
己.....	139
何以斗争？.....	142

# 日月今闻

---

## 坚持马列主义战争观，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

文/知凡

历史总是惊人的重复。一百多年前一战爆发的时候，第二国际的先生们纷纷倒向了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喊出了保卫祖国的机会主义口号。最近，俄罗斯发动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俄共久加诺夫迅即发表声明，支持普京的行动，国内许多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也纷纷在对外政策上倒向支持俄国。这些先生们不仅忘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甚至忘记了本国曾经受过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和平主义、沙文主义、超帝国主义纷纷登场，因此，进行科学的战争观教育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包括回答战争、和平与革命这一重大关系问题上。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科学地分析了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并且发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号召，毛泽东也曾科学预见抗日战争的进程，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但失去了马列主义视野的一些军事专家，就开始屡屡发生误判了。张召忠 2003 年曾预测，美军将会陷入到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美军会到处遭到袭击，会在巴格达爆发惨烈的巷战，但是都没有发生。如果说张局座至少口头上还坚持马列主义战争观和人民战争理论，那么金灿荣说二十万台军在导弹面前是一堆烂泥，简直是赤裸裸的沙文主义观点了。可笑的是，在这次对俄乌冲突中，金灿荣又一次错误地判断了局势。但是，国内许多民众对战争的理解都是来自于这些专家，这不得不说一个极大的悲哀。让我们来看看马列主义对战争的科学观点吧！

## 一、战争的根源

---

战争是一个历史范畴，既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也不会永世长存。原始社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对抗，所以也不存在剥削反剥削、压迫反压迫的斗争，更谈不上战争。部落内部各成员间发生的一些非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氏族、部落等社会组织就能较圆满地调整 and 解决。当然，在部落外部，即部落与部落之间也发生过一些武装冲突，但这同我们所说的阶级社会的战争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首先，它只是因争夺猎场、草地或复仇而造成的一种偶然的对抗现象。他们对俘虏或者屠杀，或者放回，或者收容，或者将女性作为自己的妻子，根本不存在阶级奴役和民族压迫。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决定它既没有专门进行战争的军队，也没有专门进行战争的武器。所以，原始社会部落间的那种偶然的武装冲突，在科学意义上根本不算是战争。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财产出现了，人们逐渐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阶级，人类历史逐步由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中，充满着各种战争。这时的战争，首先是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镇压和掠夺奴隶的一种手段；同时，它也是被压迫的奴隶阶级反抗压迫、剥削，争取自身解放的一种手段，比如古罗马的斯巴达起义。另外，还有奴隶主集团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比如商朝末期的武王伐纣战争。

因此，私有制是战争产生的根源。

## 二、现代战争的起源

---

一般而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战争统称为近代战争，现代战争是指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现代战争的实质是什么呢？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列宁发挥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他说，要了解现代战争，必须对欧洲各国的全部政策作一个总的观察，必须真正地研究和了解资本主义强国的两大集团在战前几十年间所实行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会忘记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而且会根本无法了解这次战争，会被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骗子牵着鼻子走。

一战前的德国处于快速发展期，而英国则走向衰落，但快速发展的德国迫切需要海外殖民地，势必与占有大量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发生冲突，因此列宁说：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它办法呢？

战争的爆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私有制引起的国内阶级矛盾，如果本国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帝国主义分子也有可能通过发动战争来转移矛盾消解革命。

简言之，战争作为政治的非和平手段，一定是国际国内矛盾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才会爆发，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双方的资本输出与势力范围的矛盾已经到了只有通过打仗才能一较高下的程度，另一个是国内的工人运动到达了革命的临界点，战争会成为统治者转移矛盾的手段，但事与愿违的是，战争往往又反过来会激化矛盾，成为革命的最后催化剂。这就是历史无情的辩证法。

当前俄乌战争，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和北约在北溪二号管道铺设上的矛盾，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也就是2021年，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接连爆发了大规模工人罢工，哈萨克斯坦的罢工还引发国内政变。俄罗斯国内也爆发了自2011年—2013年俄罗斯示威以来该国最大规模的反普京抗议事件，普京对这些抗议事件的态度都是镇压、镇压、再镇压。本国以及盟国的阶级矛盾也应该是普京发动对外战争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战争的根源是私有制，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那么，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世界大战的危险就会存在，这是改变不了的趋势，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制度。

### 三、战争的性质

在阶级社会里，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政治现象。有内战和外战，有大战和小战，参战各方有大国有小国，有强国有弱国，战争有进攻有防御，有胜利者有失败者。

从战争的阶级性质、政治目的和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看却只有两类，即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对此，列宁曾指出：“战争和战争不同，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

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毛泽东同志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那么，什么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呢？在当代，历史的进步性是同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毫无疑问就是正义的，比如当前印共（毛）游击队反对印度剥削阶级政府的人民战争，菲律宾共产党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

反之，那些为了奴役、压迫和掠夺人民，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或地区霸权的战争，为了镇压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发动的内战，不管进行战争的阶级、国家、民族或政治集团披上多么漂亮的外衣，也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的、非正义的战争。比如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印度发动的围剿革命者的“绿色狩猎行动”、还有现在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

另外，是不是在本国领土上打仗就一定是正义战争呢？答案是否定的，不能简单地根据战争在哪国的领土上进行来判断战争的性质。

全部问题在于这种“进攻的”或“防御的”战争的政治内容。因此，无论战争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归根到底总是由剥削者和压迫者挑起的。从实质上说，一切被压迫、被剥削和被奴役的阶级和民族，被迫进行的自卫和反击，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进行战争，都是“防御战”。列宁说过：“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那么不管谁先进攻，这些战争都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而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同情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希望它们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

既然战争性质不同，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那么，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应当笼统地反对或支持一切战争，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一切正义战争，谴责和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

## 四、战争成败的关键

---

既然是战争，成败肯定是引人关注的问题。俄乌战争，结局是谁胜谁败呢？

战争成败直接来源于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导弹需要人的制造和使用，这个人是有情感的，他内心是否支持这场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但凡是战争，领导者都会进行动员，告诉战士们打仗的目的是什么，即使是侵略战争，也会编造一个保卫祖国、传播民主或者捍卫自由之类的幌子。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人心向背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二战后的战争，大多数是美国发动或参与发动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如果遭到被侵略国的进步政治力量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反抗，基本是失败的，比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如果发动战争的是侵略者，但被侵略一方领导人本身是腐败无能的，这时候双方军事实力和指挥就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即使大国占领了小国，因为发动战争的大国本身的侵略性质，决定了这场战争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就是典型的例子。

人民战争只有在代表社会进步方向而且能广泛动员民众的政治力量领导下才能进行，自身腐败、脱离群众的萨达姆和卡扎菲当然无法发动民众为保卫他们而战，就算保卫祖国的口号喊的震天价响。张召忠、金灿荣们预测的失误正是在这里。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本质，俄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反战抗议活动，俄罗斯肯定没有全胜的把握，另一方面，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泽连斯基号召乌克兰人民奋起反抗，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决定了泽连斯基的做法是符合乌克兰人民利益的，根据乌克兰一个社会学小组针对 2000 名乌克兰民众进行的民意调查，泽连斯基现在的支持率高达 91%。但无法得到美欧直接武力支持的泽连斯基要完全靠自身赶走俄罗斯侵略军也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民粹主义的泽连斯基和威权主义的普京可能都无法获得完全的胜利，这个时候资产阶级之间的媾和就成为一种选项。这个时候，要警惕资产阶级之间为了妥协，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

## 五、战争、和平与革命的关系

---

战争除了胜败，还有没有其他意义呢？当然是有的。

现代战争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创造条件。早在 1887 年，恩格斯就曾指出不久就会有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 800 万到 1000 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但这场世界大战“只有一种结果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贫困和为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造成条件”。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过程中，列宁就一再告诫和鼓励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战争中阵亡的和由于战争而丧生的几百万人并不是白白地牺牲的。千百万人在忍饥挨饿，千百万人在战壕中牺牲性命，他们不但在受苦受难，而且也在聚集力量，思索大战的真正原因，锻炼自己的意志，他们对革命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认识。”“对于我们这就是保证，保证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在欧战以后到来。”事实完全如列宁所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实在欧洲各国普遍形成了革命形势，在俄国，由于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而胜利地实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这是战争引起革命和革命制止战争的突出例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如此，英美帝国主义妄想通过扶植战败的德国充当防范苏联的屏障和镇压人民革命的打手，然而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主观愿望相反，战争又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更广泛、更

深刻的革命，来了个“义战遍于全世界”，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说，“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完结。如果有疯子要发动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灭亡的是帝国主义。”

有人会说，战争要死很多人，怎么办？战争要死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但战争的爆发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是爱好和平的人们所能决定的，何况现在和平时代，家庭内部冲突、劳资冲突，也并不温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战争”呢？在历史上，一战造成数百万俄军的死亡，十月革命恰恰制止了战争的继续进行，减少了生命的损失。所以，一味地反对战争，是做不到的，是一种和平主义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一般地、笼统地、抽象地谈论和平，而是把和平同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革命的观点看待和平问题。列宁认为，“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那就是惧怕战争，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年之后，曾极其精辟地分析了当时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从不同阶级立场出发同情和平的三种人。他说：“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政治里，同情和平的有三种人。（1）自觉的百万富翁害怕革命，想加速和平的到来。他们清醒地、正确地宣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的和平（不割地、限制军备等）是一种空想。而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的拥护者之流，正在鼓吹这种庸俗的空想。（2）不自觉的人民群众（小资产者、半无产者、一部分工人等）希望和平，不管是什么形式，他们反战声浪一天天高涨，朦胧的革命情绪一天天强烈。（3）自觉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密切注视着群众的情绪，利用他们一天天增长的渴望和平的心情，把朦胧的革命情绪变成明确的革命情绪；并证明只有采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来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才是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列宁的这段分析科学地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和平同战争一样都是有阶级性的；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有帝国主义和平和社会主义和平之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需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平，即“和平”地剥削、压迫和奴役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才，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鼓吹社会和平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宣传的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和平，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出现的真正的和平。人类永久的和平时代则是同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能制止战争的，只有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要自觉坚持国际主义，反对沙文主义，因为侵略别人，或者支持这种侵略，自己并不能因此得到解放，反而会被绑在资产阶级的战车上。

叙利亚战争已经绵延十余年，造成了无数人的死亡和伤害，产生这种悲剧的原因恰恰是叙利亚只有反动政府军、各地军阀和外国侵略军，独独没有类似于红军这样的队伍出现去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消灭国内外反动派。乌克兰人民也面

临这种形势，什么北约、俄罗斯统治者都不是好东西，只有乌克兰工人阶级联合其他劳动人民一齐对乌克兰的垄断寡头进行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出路。1914年，列宁曾撰写《告乌克兰工人书》，号召工人们不分民族地联合起来同资本作斗争。列宁说：乌克兰工人“只有同一切民族的工人首先是同大俄罗斯工人，即矿工、工厂工人和农业工人结成兄弟联盟，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解放的道路。”

俄罗斯的工人阶级也应该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支持乌克兰人民的反帝斗争。正如恩格斯所说：“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末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

帝国主义必然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战争的基本观点，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战争的起源以及如何对待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

# 从乌俄冲突看现代化军队：一支特化的力量

文/李鹏程

长期以来，不少人对军队持有一种畏惧心态。如今的军队，无论是战略战术打击的破坏力还是战术打击的精准度都远超历史水平。美国打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更是使现代军队的力量被部分人神化。军事力量俨然成为了一种绝对支配性的社会力量，仿佛只要有国家或者某种势力掌握了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其他势力就难与之抗衡。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遭受的挫折打破了这种迷思，显露了现代化职业化的军队其实是一种特化的毁灭性力量。所谓特化是生物进化领域的概念，指的是生物为了适应特定环境，从而使得局部器官过分发达的情况，常有的案例有剑齿虎的剑齿，马的蹄子等。特化能够使得生物特别适应特定环境成为一时之雄，但一旦环境发生变化，特化的物种往往更难适应，从而更容易走向灭绝。现代化军队的问题也是如此，它的特点是为了适应正规军队的对抗环境而产生的，因而它的强大也体现在这一特定方面，而在其余的方面，它的能力甚至赶不上传统军队。

## 一、军队的现代化和职业化

各大国的军队在新世纪纷纷在现代化的同时走向了职业化。军队为什么会走向职业化？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在冷战之后，随着军事装备专业化信息化程度的提升，军事人员熟练掌握军事装备所需要的时间逐渐增加。义务兵员在军队里面呆的时间太短，无法满足军队的专业化要求，所以军队会走向职业化。在野战当中，信息化程度高的部队相较相同数量的传统机械化部队也拥有相当大的优势。

第二种观点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判断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维持一支规模庞大的以义务兵构成的机械化军队军费开支庞大，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比如大规模的义务兵员在离开军队后面面临的就业问题等。同时，随着冷战末期西方各国民众反战情绪蔓延，这些国家招收义务兵员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使得各国纷纷开始裁军，并让军队朝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力求打一场精细化的小规模战争，快速解决问题。

这两种观点分别阐述了推动军队职业化的军事和社会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军队职业化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就算是我国，在军事因素的决定下，近年也快速走上了军事职业化之路，士官制度改革后义务兵无法在军队内超期服役，服役超过两年必须转为职业化的志愿兵（士官），和部队签订合同。未来代表中国军队作战的也会是职业化的士官了。

职业化军队在相对落后的时期和地区也广泛存在，由于落后的军队并不会让人畏惧，本文所指的职业化军队特指因为现代化发展需要走向职业化的军队，也即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对这些军队来说，现代化和职业化是一体两面。

现代化军队的强悍之处显而易见，它的劣势却常被人忽略，最主要的劣势是职业化军队不可能维持太大的规模，一方面高科技装备太贵，无论是军事装备还是制导弹药都贵，这使得现代化军队在战争中成为了一只吞金巨兽。一枚导弹数十万元，一架战机造价上亿，一旦战争持续，消耗是天文数字。另一方面长期呆在军队里的职业军人也需要比义务兵更高的人力成本。即便现代化军队规模缩小了，维持它的运转依旧相当昂贵，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 二、现代化军队的强大之处

---

现代军队强大，可它的强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体现在和另一只正规军队的对抗上，尤其是野战、空中和海上对抗上，因为它在近些年的发展，正是为了适应正规对抗这一环境，为了在对抗中获得先机。

正规军队之间的野外、空天或海上对抗，这是现代化军队的主战场。军事装备的代差使得在野战当中，落后的机械化军事装备往往成为了聋子瞎子，被先进一方大肆屠杀，海湾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海湾战争中，现代化军队借助自身的精准打击能力，迅速对敌对方政治势力中枢进行打击，破坏其指挥系统和防空系统，掌握制空权，持续对敌方地面部队进行打击，降低其战斗力，最后在野战中迅速摧毁敌方军事力量并推翻敌对方政权。海湾战争打出了许多人的美军恐惧症，因为当时的中国军事装备技术水平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并无实质差距，面对当时的美国军队来说很可能也是单方面被屠戮的结果，但仔细想来，海湾战争打得这么漂亮并非没有前提，首先伊拉克的沙漠地形非常适合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其次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不得人心，第三当时伊拉克军队绝大多数位于科威特境内，被美军包了一个大饺子。在12年后的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政权的军事实力远没有从海湾战争中恢复，可凭借着不同的策略，还是给美军造成了比海湾战争大得多的麻烦。

## 三、现代化军队不擅长的事项

---

现代化军队是特化的，它在某一方面强大的同时，自然在其他的方面反而弱小。现代化军队首先打长时间的总体战相较于义务军队并无优势，高水平的军事装备非常昂贵，固然在野战中可以通过技术优势进行压制，可一旦要啃城市堡垒这样的硬骨头，陷入了巷战泥潭，现代武器装备的技术优势就被拉平，其规模和成本上的劣势就被迅速放大了，从此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行动遭受挫折就可以看出。面对军事实力和国力均弱于自己的乌克兰，现代化的俄罗斯军队的进攻行动在一个多月后的现在依旧举步维艰。

为什么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和海湾战争的结果截然不同呢？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俄罗斯在政治因素影响下不得不对乌克兰全境发动进攻，在战争开始就着手进攻乌克兰已开展防御的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基辅等城市。其次在于俄罗斯军队的所谓现代化其实是半吊子的现代化，它的弱点在总体的攻势作战中被快速放大。限于经济实力，俄军只有部分武器装备完成了信息化改造，制导弹药的消耗

在前期的精准打击结束后因为产能限制也无法得到补充，于是俄军成了一支拿现代化装备发射冷战时期非制导弹药的滑稽军队，不得不让本可以在远程和高空发动打击的现代化军事装备贴脸和对方对抗，以致遭受更大的装备损失。随着军事装备的进一步消耗，俄军不得不调用更多缺乏防护的民用设备参与战争，更加剧了人员伤亡，这对人员规模显著缩小的职业化军队来说更为致命。半吊子现代化的俄军因为内生性的不协调反而兼具信息化时代和机械化时代的军队劣势。

反观乌克兰一方，有大量的城镇用于军队驻扎，可以用来作为野战的支点，俄军想要夺取这些城市则必须通过巷战方式，面临大量的装备和人员消耗，例如黑海沿岸的马里乌波尔城，俄军打了一个多月仍未攻克，反而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装备损失。面对拥有一定战略纵深的中等国家的总体防御，如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依旧很难啃下来。这样的战争中，防守一方的人民要付出的代价会相当惨重，城市家园被摧毁，人民流离失所；可对进攻一方来说也不会好受，国家深陷战争泥潭，国内生产大受影响，反战浪潮迭起，在国际社会中也会面临指责。一个落后国家在现代化战争中依靠这样的方式拖垮先进国家，在战略上反败为胜，也大有可能。就比如乌克兰在一个多月的苦战之后，终于逼得俄罗斯力竭撤退，迎来了战略反攻。

可能有人会认为俄罗斯受挫是因为其因为经济实力弱小导致的军力薄弱，那么比俄军更加先进的美军，在新世纪所打的两场战争，也暴露出了现代化军队的弱点，既不擅长攻城，也不擅长应对游击战。伊拉克战争常被和海湾战争一道提起以渲染美军的强大，可伊拉克战争和海湾战争也有区别。在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政权的军事实力并未恢复，无论是军队规模还是防空系统等高科技军事装备数量都较海湾战争时逊色，可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还是遭受了比海湾战争中更大的损失，因为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战争中扬长避短，直接放弃了在南部沙漠利于装甲部队进攻的地带进行防御，把防御重心放在城市，试图通过巷战等方式给美军带来更大的杀伤，这个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奏效了，伊拉克军队在实力更弱的情况下在政府被完全推翻之前给美军带来了和海湾战争同等规模的杀伤。而正规作战的结束才是美军麻烦的开始，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美军在伊拉克的暴行引起了大多数伊拉克民众的反对，在本土宗教和政治势力影响下，伊拉克民众持续地对美军进行打击，使得伊拉克成为美军的一个战争泥潭。在 2004 年的第二次费卢杰战役中，面对抵抗意志坚定的两千余反美武装分子，一座常住人口 30 万人的小城，美军动用了一万五千兵力，在付出了 54 人阵亡，四百余人重伤的代价后，获得了巷战的胜利，伤亡和 2003 年整个伊拉克战争的正规作战达到同等量级。美军这样的零散损失在 8 年的战争中接连不断。

在阿富汗亦是如此，美军呆了二十年之久，最后还是被塔利班赶了出来。在这二十年里，美军利用高科技手段，对自己的军事装备和战术进行了很多针对游击战的适应性改造，固然在战斗中针对当地武装人员有了更大的优势，可每一次的战斗就像用刀去劈水，无法改变当地的民间生态，反而加深了当地民众对美军的厌恶。在持续和美军的斗争中，阿富汗民众选择了自己业已熟悉的宗教意识形态作为和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在美军撤出之后，美国扶持的阿富汗傀儡政权无法得到民众的支持，在短期内迅速崩塌。

职业军队和过去的义务军队相比应对”治安战”更无优势。因为”治安战”实质上是人心向背的斗争，是争取民众的斗争。而所谓的“治安战”一般都是侵略者的战争，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发动者的下场。现代化军队是针对野战对抗特化的力量，对政治斗争一无所长，它所擅长的毁灭只会把民众推到对立阵营。现代化军队人数更少，固然在野外依靠科技装备可以控制更大的区域，可面对群众中存在的暗流，现代化军队手握重锤，却不知该击打何处，并无太好的应对办法。它只能依赖本国派驻和当地傀儡政权的民政系统和它配合开展争取民众的工作，可一支以摧毁为根本目的的军队，相较于传统军队更不可能和民政系统良好配合。

如果把视角从国际转向一国之内，则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现代化军队不擅长镇压业已存在的由思潮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其原因和”治安战”是类似的，军队可以杀戮，可以政变，可以在一时之间通过武力掌控一个国家的中枢，那是以民众当中还未形成合力为前提的，当群众当中的暗流已经汇集成了朝特定方向的合力时，职业军队只会和历史其他所有形式军队一样被汪洋大海淹没，甚至因为它人数更少，被淹没地还要快一些。有国内民族主义者嘲笑印度政府在对付纳萨尔派时经常只调动警察部队，认为这是印度政府迂腐地遵循法律的体现，只要印度政府调动军队，纳萨尔派马上就会灰飞烟灭。殊不知警察等内卫部队相较于在野战中大开大合的军队而言，对付游击队的招数还要更多一些。

实际上，面对组织起来的民众，从古至今的一切军队从来都没有机会。只是在海湾战争之后，出于对现代化军队打的一场漂亮仗的恐惧，不少人开始觉得现在的军队已经是例外了。可美军和俄军的糟糕表现表明现代化的军队亦没有逃出社会规律的制约。

## 四、民众的选择

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军队不擅长应对民众，面临民众的反抗，他们都很可能陷入”治安战”的泥潭。可民众的思潮可能走向不同的方向，乌克兰的民众有可能选择极端民族主义，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众可能会选择宗教，固然在对抗外国入侵者时，这样的意识形态有一定值得同情的地方，可它们终究是落后的意识形态。同样的，在经济困顿时，亦有不少民众会选择国家主义保守主义甚至是宗教等落后反动的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张目或者分化群众的力量。这很考验左翼政治力量的能力，如何既不脱离群众，又能够坚持自身的原则，把群众争取到自身的战线上来，这是每个左翼人士必须思考的课题。



## 共存、清零与自由人联合体

文/五百二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警告人类，虽然我们已经拥有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但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仍然极其落后，**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都不是解决之道。因此，摆脱完全政治化的共存派和清零派话语，跳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争，认真思考一下人类的未来，是非常必要的。

疫情是面镜子，能照出人类在“正常”秩序下掩盖着的矛盾。而社会矛盾，正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从这个意义讲，正确看待、正确总结疫情期间出现的种种问题，与每个人的未来息息相关。

目前，关于疫情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大门派：**共存派**和**清零派**。门派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最初只是策略之争、方法之争，还有点学术争鸣的味道。如高福、张文宏等专业人士都小心翼翼地谈论过在某种条件下的“共处”前景。2021年8月7日，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总顾问、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撰文，痛批英美等国抗疫政策，指出我国必须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自此，争论明显升级，到此次上海疫情则达到高峰，被一些主流媒体上升为**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深圳特区报：“动态清零”是打赢疫情防控硬仗的必由之路，

<https://www.dutenews.com/tewen/p/6630273.html>）学术味越来越淡，政治味越来越浓。

总体来讲，**主张动态清零的清零派占优势**。全球抗疫实践的结果也为清零派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如韩国，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凭借“检测、追踪、治疗”三管齐下的强力防疫政策，抗疫成效显著，一度被誉为全球防疫的“优等生”。但是，面对奥密克戎引发的感染浪潮，韩国却不再坚持原先的“严防死守”，而是转向“与病毒共存”模式，大规模检测、积极追踪密接、严格隔离等防疫措施被逐步抛弃。今年2月之后，韩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新冠病例总数从100万增至1500余万，死亡总数从2月初的约6800人，上升至19000余人（4月10日数据），尽管韩国累计病死率仅为0.12%（这为共存派提供了证据），为世界最低，但绝对数量仍很可观，短期内挤兑医疗资源的情况很严重。韩国两方面的经验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至少说明，**现阶段采取共存模式的风险还是很大的**。中国人口规模远比韩国大，人均医疗资源不如韩国，疫苗接种水平不如韩国，可以预期，放弃动态清零后造成的后果远比韩国严重。

虽然清零派占优势，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得到了解决，只是在日益高调的宣传话语下，很多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淡化了。自媒体上则是从来不乏阴谋论，认为目前上海的种种困局是由于共存派的干扰造成的，甚至是有意制造出来的。这些问题包括：一，大量体制外人士收入锐减，封城的代价压在了底层的打工人和小业主头上；二，各种官僚主义的推诿扯皮，造成本来可以轻松解决的事情，以疫情之名无人负责，次生灾害频生，典型案例如上海东方医院的周姓护士



哮喘发作，却因被本院拒诊耽误时间而死亡；三，生活物质保障水平堪忧，一方面是物价腾贵、一菜难求，另一方面又是食品堆积如山，分发不出去，甚至直接被扔掉，自媒体上有大量这样的图片视频在流传；四，各种封控措施管理混乱，无论是核酸检测、信息发布还是隔离点安排，都有大量乱相。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笔者是不赞成共存派阴谋说的。上海疫情中的确有不同的声音，但是，要说他们干扰了整个行政系统，就有些耸人听闻了。我们把目光放远些会发现，**最早封城的武汉和湖北全域，去年初封城的石家庄、通化等地，近期的西安、吉林等地，所有上海出现过的问题，这些地方都出现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区别，第一，这些地方并没有所谓网红医生的干扰，第二，上海获得的关注度远大于同期的其它地方，比如吉林省和上海的人口差不多，但被关注度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是吉林没有问题吗？完全不是。从吉林方舱医院农民工被感染、瞒报疫情和欠薪事件的曝光，我们也能管中窥豹。

如果说武汉出现问题是因为疫情早期经验不足，二三年过去了，同样的故事反复上演，已经不能用廉价的“必要的代价”来搪塞过去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依靠自发性生存的一般动物，就是能总结经验教训。

**共存派和清零派**之争，在被高度政治化之后，其实是**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但是，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不是整体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通往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推崇的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注意，是集体主义，不是整体主义。需要申明的是，笔者并不反对学术争鸣，不反对从根据具体情况调整防疫政策，这里谈的是**政治化的共存派和清零派**。

在现实中，整体主义的概念经常被替换为集体主义，下文中很多引用也是如此，请注意语境。

比如，不少人鼓吹人类有两种不同的文化，认为东方的整体观更强一些，以集体为本位来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因而推崇集体主义；西方以个人为本位来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奉行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这个好理解，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源远流长，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而完善起来的，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资产阶级在用商品经济瓦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同时，用个人主义击溃了整体主义，使之成为主流价值观。从词源来讲，托克维尔于1840年在其所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下卷中，创造了“个人主义”这个词，并赋予个人主义比较完整的、能体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涵。

这里所谓集体主义，既包括了当代社会主义革命中形成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成分，也包括了东方在自然经济和人身依附年代所产生的整体主义。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目的的自给性、再生产过程的封闭性以及手工劳动的落后性，凸现了生产单位（家庭、氏族、庄园等）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每一个狭小规模的生产单位需要对每个成员进行完全的统治，每一个

成员必须对所属的共同体表现出绝对的顺从，方能被接纳。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很容易被“集体”利益所吞噬。

从现象上讲，东西方之别似乎的确如此。如俄罗斯，在西方眼中算东方国家了，似乎一直以来就有集体主义文化。且不说农奴制时代的村社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中兴起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新世纪以来，有学者总结称，集体主义在俄罗斯有回潮之势，学校重拾集体主义道德教育，媒体重现集体主义正面宣传，学界重构集体主义研究视阈，社会重树集体主义价值导向。（武卉昕，周建英. 俄罗斯集体主义回潮及其原因探析[J]. 国外社会科学, 2010(5):6.）

细究一下，这是混淆了私有制之下的**整体主义**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

抗疫初期，东方一些有儒学传统的国家，采用的方式也更“集体主义”一些，如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表现为封控管理更严格一些。这个加引号的“集体主义”，其实说整体主义更恰当。

私有制下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虽然形式上对立，历史上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是，在现实中并非是水火不容的，相反可以说是互补的。比如黑格尔就鼓吹国家至上主义，他把国家看成是理念在人类社会的实现，是“客观普遍性”和“普遍目的”的载体。他认为国家的根本使命不是保护个人自由，而是赋予个人以自由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目的与“普遍目的”是矛盾的，因而黑格尔所鼓吹的国家至上事实上就是作为个人主义补充的整体主义。

再比如，儒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虽然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整体主义观，但同样也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可见，阶级社会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从来是并行不悖的。

利用整体主义价值观来发展资本主义，典型的例子是韩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后发国家，韩国将工人称为“产业战士”，努力培养以经济发展优先、现代化建设优先、民生优先的国民意识，灌输努力工作就是爱国。直到八十年代，韩国人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每周工作 6 天，每年只有三四天的法定假日是合理的常态。很多工人每天的工作从早操中肃立收听国歌开始，管理人员则用意志、纪律、下一代的幸福等充满激情的话语来激励工人努力工作。



回到国内的现实，**集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区别何在呢？为什么我们说高度政治化的**清零派**鼓吹的仍是**整体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呢？

还是要从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来解读。

**首先，要看生产关系。**社会分工产生了单个人利益和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矛盾，使得国家这种“冒充的共同体”应运而生。但是，阶级分化使得“冒充的共同体”难以合理照顾每个成员。在整体主义观念之下，即便是做一些客观上有利全体成员的事情，如封建时代的兴修水利、兴建长城等工程，在实行的过程中又不能不损害农民的利益，统治者总是采用极度劳民伤财的方式去实施；近代，如蒋介石抗日也是进步的，但即便是抗战，也要采取横征暴敛、抓壮丁等方式，搞得天怒人怨，形成片面抗战的局面。这不是他们愚蠢，也不是有人捣乱，而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我国现在的情况，既不是封建年代，也不是旧中国，但很显然，我国疫情中大量的打工人和小生产者，他们要承受失业、收入剧减等代价，国家无法为所有人兜底。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办法，是要将他们纳入到公有制生产关系中去，真正实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对合理的抗疫政策也能做到完全理解拥护了。事实上，**清零派最重要的群众基础，也是那些衣食无忧的体制内人士。**

建国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城市失业率达 20%以上，人民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创造性地采用了很多办法，解决了失业人员的生存问题。一是由政府直接出面发放粮食、救济金，这是最主要的救济措施；二是对旧公教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措施，“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三是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救济；四是以工代赈实施临时救济。“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这就是集体主义精神。

今天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建国初高很多，不要说“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一个亿万富翁的收入就能让成千上万人匀着吃了。但这条路在现有条件下显然行不通。

其次，要看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与作用。雷锋有个很有名的说法：“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但是，雷锋这颗螺丝钉并不是没有意志的、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人，雷锋有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政治意识，有着非常主动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更像是一个具有全能性的细胞，而不是冰冷的螺丝钉。**细胞不同于螺丝钉的特点，第一，它虽然也是整体的一部分，但它却具有发育成完整生物体的潜能，这是螺丝钉完全不能相比的；第二，它与整体的联系更有机、更全面，它不是单向的接受指令，而是与整体融为有机的一体。毛泽东号召每个人都关心国家大事，就是希望集体中的每个个体都具有全局的眼光和主动精神。毛泽东年代，比雷锋事迹更壮烈、更有故事性的大有人在，雷锋至死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行为，牺牲的方式甚至有点“窝囊”，但毛泽东却偏偏选择一个普通的战士作为全军和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是大有深意的。雷锋在政治上是无产阶级战士的优秀代表，他有着高度政治自觉，不是一个简单执行上级任务的工具人。



信仰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战士，比起那些仅仅靠严酷纪律约束下的工具人，迸发的能量是有天壤之别的。

抗美援朝中，有位叫刘光子的普通战士，创造了单兵俘虏英军王牌 63 人的纪录，成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刘光子的行为，没有上级命令，完全是凭着普通战士的觉悟和对战场态势的把握，奋不顾身、随机应变的结果。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有很多打乱建制、猛打猛冲的做法，让敌人目瞪口呆，也完全不符合军事教材中的教条，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做法，是一般军队无法做到的，旧军队恐怕一打散就崩溃了。这就要求集体中的每个人都要明白个



人奋斗牺牲的意义，要求每个人充分理解上级的整体意图和个人在整体意图中的地位，才能做到形散神不散，将个人作用发挥到极致。



反观上海疫情中，每个部门中的每个人都只对上负责，只能机械古板地执行上级的意图，各部门之间协调性极差，基层人员和群众很多时间茫然不知所措，出现类似危重病人无法就医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了。笔者所在的社区（不在上海），近期内组织了数次核酸检测，每次都是临时发通知，突然封闭小区，连最基本的动员和解释都没有。志愿者拉的微信群，唯一功能就是临时发通知。奇怪的是，群内询问的声音也极少，似乎大家都习惯了这种冷清的工作方式。

当然，这不能怪基层人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正常的运行方式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突然转换为全方位的整体主义方式，的确是勉为其难。在此条件下，绝大部分成员缺少集体主义之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应对这种需要高度社会化的问题，也必然力不从心。

在上海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自发成立的集体主义团体，即大量小区成立自助自救志愿者组织，形成比较完备的组织框架与工作流程，线上、线下协同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社区防疫工作的开展。

说到这里，**集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大家应了然于胸了。从形式上看，两者似乎区别不大，深入其里，就是**细胞**和**螺丝钉**的区别。个体虽然都是整体的

组成部分，但一个是鲜活的、全息全能的，一个是冰冷的、没有自己意志和情感的。

**集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都要求个人在一定条件下作出牺牲。当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对立时，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不会空洞地谈自我牺牲和个人主义。对这个问题，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过论述：“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因为共产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什么意思呢？马恩认为“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比如，你向一位打工人宣传，你们要无私啊，要顾全大局啊，从抽象的道德来讲，似乎没有错。可是，打工人连糊口都困难，他向老板多要点工钱，“利己”一点，有问题吗？你这种宣传打工人能听进去吗？

但是，仅仅“利己主义”还不够。要保障每个打工人这种“利己”的权利，打工人必须团结起来，大公无私，目光长远，为了打工人群体的利益，有些打工人需要牺牲掉眼前的、个人的利益，这就要先进的打工人具备“自我牺牲”的精神。否则打工人永远无法获得解放，打工人“利己”的利益也永远无法满足。

所以马恩认为“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离开具体的内容讲“利己”和“牺牲”，认为两者水火不容的，是无意义的。这里所谓“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对立问题，实际上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只有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消失之后，这种对立才会消失。在此之前，人类由于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尖锐对立，“自我牺牲”是一种刚需，牺牲者总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只有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没有尖锐对立的条件下，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个时候“牺牲”才是多余的。

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由每一个自由人所组成的共同集体。它既不同于那种贬低、否认个人作用，使个人沦为社会的附庸和工具的整体主义，也不同于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将个人利益作为最高追求，逃避社会责任的个人主义。相反，它是彻底的**集体主义**的产物，是集体主义的最高表现和完成形态，是真实的共同体。

我们常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此言差矣。在私有制下，富人也没多少想象力，无非就是炫富，追求声色犬马的物质与欲望追求，这不需要想象力。相反，辩证地来看，穷则思变，穷，受压迫，看到各种问题，进而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讲，穷人的想象力比富人要丰富得多。

**限制我们想象力的不是贫穷，是生产关系。**私有制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很难想象，除了**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外，还有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它将带领我们通往自由人联合体。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警告人类，虽然我们已经拥有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但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仍然极其落后，

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都不是解决之道。因此，摆脱完全政治化的**共存派**和**清零派**话语，跳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争，认真思考一下人类的未来，是非常必要的。

## 非苦防疫，苦官僚主义也

文/李鹏程

伴随着吉林疫情长期处于高位发展阶段，上海疫情的愈演愈烈，社会对防疫的态度也越来越割裂，在去年前年作为西方民众反智主义、政府不作为的化身被广受嘲讽的“与病毒共存”的观点终于在国内舆论场上有了一席之地，和坚持防疫清零的观点正面打起了擂台。

究其原因，时代变了。病毒传染能力大幅增加导致过去常规的防控措施不再有效，精准防疫更是成了笑话；疫苗接种比例的提高使得大部分人感染病毒后均为轻症，更给流调造成了困难，今年多地爆发疫情后的流调已经无法追溯到最初源头。清零成本上升对应的是国外一些地区因为疫苗接种比例极高，放开防控后也没有给社会带来太大冲击的消息。清零还是放开，已经成了不少人心中值得放在天平上衡量的两个选项。

如果说以上是民众的态度发生转变的外因的话，那么对从 2020 年以来防疫由量变到质变的厌烦可以说是内因了。从 2020 年初武汉疫情开始，防疫的大棒挥舞了两年，共克时艰的口号喊了两年。防疫成为了政府、医院、社区等机构部门最高的政治正确，只要出一点岔子，那面对的就是重重追责。基层公务员、医生、社区工作人员被这个压倒一切的 KPI 压得喘不过气，为了让防疫绝对不出岔子，转头就制订了许多不合理的规章，给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添堵。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对病毒的恐惧，对政府的信任加上对国家防疫“独领风骚”的自豪，这些不合理处被民众暂时忽略了。但随着不快的积累和抵消因素的消失，民众的情绪是越来越激烈了。

民众在厌烦什么，苦于何事呢？**第一苦于疫情和防疫的种种措施导致许多人工作受到影响，收入下降，原本的生活难以维持。**在 2020 年的第一轮防控中，就有大量店面关张。后续的两年中，除了防疫相关的如疫苗、核酸检测、口罩以及在线办公等行业相比疫情前火热之外，其余的行业均较疫情前凋敝。更何况经历多年的发展，国内除了金字塔尖的一群人之外，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质上都处在毫无余裕的状态，每月挣到的钱都花在了各种各样的地方，租房、饮食、衣物、子女教学，足以把每个人辛辛苦苦每个月挣得的收入掏空。多年房价的飞涨使得哪怕是社会的中上层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高昂的首付吸干了父辈的积蓄，房贷则占去了每月大部分的花销份额。一旦收入下降或失业，就要面临断供的风险。可相较于官僚对防疫的“狠抓落实”，对民生的保障却只停留在官样文章里的“不能因为防疫影响民生”里，一切后果需要民众自己承担。核酸检测社区有人催着做，可要是失业了，社区又有谁关注、有谁愿意管，有谁能帮忙？不可能的，连单纯的因为防疫措施影响到民众生活了，体制基层和社区都不会愿意改变的。

**民众第二苦，苦于不合理的防疫措施对民众生活的破坏。**在 2021 年，每有散发疫情，就是一个一个社区的核酸普查，春秋时节还好，若到冬夏，就是成百上千人在大太阳或者是寒风中排上数个小时的队，等着核酸检测。偶尔因为检测



点试剂准备数量不够，排上几个小时队最后却被告知试剂不够了，今天测不了了，不知等待的群众又是什么心情？社区有没有可能做不同人群之间的分流，让群众少排些队？没人知道。民众只知道对个人来说，核酸检测是必须得做的，在有疫情发生的地方，没有核酸阴性证明寸步难行，没法上地铁，没法上班，没法进商店。

**民众第三苦，苦于各级官僚管理者相互推诿，敷衍塞责。**固然明面上的指导思想是“既要防疫，也要民生”，可是在官僚系统内部，是一旦防疫出现漏洞，必会追责；做到什么程度算影响民生，没人知道。或许只有到出现大规模的舆情事件了，才算影响民生了。那么各级官僚自然就在防疫上丝毫不讲情面，然后在碰到民众求助时装出一副理解民众生活诉求又爱莫能助的样子，让民众再去找其他部门，其他同级单位，或者是自己的领导。给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大量的障碍。这两年之间，民众不知道放弃了多少正常的生活需求？发生疫情之时，哪家医院的门诊依旧开放，能够接收正常就诊的病人？过年过节之时，到底找到哪一级领导能够决定自己能不能够回家？需要搬家的时候，是社区、物业还是片警能够决定自己能否搬进小区？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人的精神必会消磨。

**民众第四苦，苦于防疫措施驴粪蛋外面光，只做表面功夫，严格定规，普遍违反，选择执法。**办公楼商场进出门有人提醒戴口罩，进入之后不戴口罩的比比皆是，尤其是餐馆餐厅，堂食的时候必不可能戴口罩，可进门还是要求大家佩戴。测核酸的时候要求保持一米五的间距，可队伍根本无人组织。一些园区上班人脸识别打卡，明明上班时人群聚集，可还是要求大家打卡时摘下口罩以便人脸识别，高铁检票口亦是如此。部分高校要求学生不得离开校园，可校园居住的教职工家属随意进出，游客和留学生亦是来去自由。表面上的严格是应付上级检查的，实际的松垮是对现实的种种妥协。只是民众看了未免心里嘀咕，明明防疫起的是这样的一个大调，可真正做起来怎么这么随意，那我们还防个什么劲啊？时间一长，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防疫的意义。

**民众第五苦，苦于官僚制订的政策明明在实质上已经把民众的选择堵死了，还要在那儿玩弄文字，虚情假意地表示对民众自由选择的尊重。**如今年三月，归国人员要求获得 12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酸检测本身获得结果都得数小时，再加上在不同机构之间的信息传递，也就意味着归国人员必须在获得结果后再买飞机票安排好行程，且这些事情必须在 12 小时内完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实质上已经把归国人员回国的路基本封死了。可官僚还是可以凭着这一规定在民众面前惺惺作态。国企也是如此，讨论职工过年回家政策一直讨论到腊月二十八，拿出结果说回家可以，但必须经过领导审批，腊月二十九主管领导纷纷赴外单位开会，问起来就说我们没有阻碍大家回家过年啊。这样的行径，作为官僚当然很聪明，不管是“严格防疫”的绝对原则还是“保障民生”的相对原则都兼顾了。只是民众也都有记忆在。

**民众第六苦，苦于对于大多数群众，无论是健康码系统还是各级官僚，执行防疫政策均死板僵化，毫无人情味。**没有核酸证明就是不让进医院，再着急也不让进。

民众第七苦，苦于部分基层干部基层组织借着防疫大棒宣示自己的权威，焊门的有之，征用宿舍的有之，破坏财物的也有之。

民众第八苦，苦于部分商家和个人借特殊权限，游离于防疫重压之外，借机哄抬物价，发良心财国难财。2020年初的口罩，今年多地的蔬菜均是如此。

民众第九苦，苦于不同地方不同层级防疫标准不统一，防疫政策朝令夕改，地方的防疫政策规定难以获知，在需要出行时有时已做了周密的准备，临到头还是缺少了某个部门某个层级规定的材料。

民众辛苦，可基层公务员、医务人员、社区工作人员难道不苦了么？他们也苦。一有散发疫情就要加班加点统计，组织核酸检测，开展流调，进行隔离，四处救火。常有防疫工作人员在碰到散发疫情之后，连着两三日连续工作，无法睡觉。严格防疫了两年多，他们就不疲倦么？更何况，有的时候一地发生疫情，可能并非当地工作人员的错误，追责的时候还是要把当地的防疫相关人员揪出来，安上一个态度错误或者政治站位不高之类的罪名。

那是什么让民众，让基层的防疫人员都不得不这么苦的呢？究其根本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国内的公务系统是科层组织，命令自上而下发出，每一个层级都是对上负责，上层发出的命令下级实质上无从置喙。固然在科层之中有所谓的民主，但在系统内上级给下级穿小鞋相当容易，下级又没有什么反制的措施，那下级履行内部民主发表意见时又有什么勇气什么动力给上级的想法政策提意见呢？在定位上是民主和集中并重，可在实际中集中从来压倒民主。那么在科层之中上级制定的指标下级只能是坚定不移地完成，甚至为了邀功如果是正向指标还要再完成得更漂亮一些；上级制定的规章下级只能死板按规章执行，甚至要求地更加严格一些，这样出了问题在执行层面不会追责到自己头上。制订规章的部门和层级为了躲避责任，也会更倾向于把规章模糊化处理，这样基层做什么事情都能解释到规章范畴内，出了什么岔子都追究不到自己头上；部分基层部门看到不明所以既要又要的指导规章，为了避责，只会保障最优先的 KPI，按着最严苛的标准执行，对于其他的指标，诸如“保障民生”，还是要开个象征性的口子意思一下备上级检查，至于真的有没有保障好，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在这个系统里面，民众是什么？民众处在层级的最下层，连基层的公务人员都没法直接影响到。面对不合理的政策，民众在科层系统里面有发声的权力么？只能是在社交平台上嚎两嗓子罢了，偶尔引发了局部的舆论事件，上级自上而下地撸掉了当地的部分官员。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民众本身是没有权力的，他们的权力反而来自于上层的赐予，那在科层体系内部又有谁会把具体的民众放在眼中呢？实际执行的时候又有谁会把民众的利益和诉求想在心上呢？

至于科层中的基层执行人员，作为科层中的倒数第二层，他们的意见也是无人重视的，而且因为他们是直接对疫情负责的，所有上级的压力都压在他们肩上。如牛马般工作、奋斗、牺牲就是他们在目前唯一能走的路了。

过去的几十年中，如防疫一般压倒一切的单一 KPI 执行了很多次，钢产量、粮食产量、严打指标、计划生育、GDP……每次完成 KPI 都在社会其他方面造成了巨大的代价，粮食产量放的卫星、冤假错案、扒房牵牛和超生游击队、环境污

染和无规划投资，再到现在防疫时的种种乱象。社会管理是复杂的工程，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单一 KPI 呢？究其原因只有权力集中于上层的科层组织官僚系统能够给组织各级制定一个压倒一切的 KPI，而组织的各个层级都无法提出反驳只能贯彻执行。归根结底，依旧是官僚主义之害。

最近某市的疫情愈演愈烈，因为早期防控反应过于迟缓，大量感染者从防控的漏勺中漏了出去，形势已经越来越不可收拾。某市现在着手大力防控，一方面调动资源过多超出行政能力极限，多处隔离点方舱医院物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原有的物流体系因为封控严格无法运行，物流效率大幅下降，不少居民的生活资料也无法得到保障。在支持防控的国家主义者群体中逐渐流行起了这样的阴谋论：某市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在保障病毒传播的前提下让民众竭力感受防控的弊端，从而为日后放开做好准备；某市有国外买办的代言人，想要等放开之后引进国外高价新冠治疗药物，从而从中牟利；某市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派驻军队医疗力量进入某市不单单是去救援的也是去维持秩序的。这些国家主义者，经历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的挫败和国内疫情反弹的双重打击，他们在心中构想的无敌的中俄联盟已经被撕得稀碎。对他们来说，一个直辖市行政能力拉胯是不可以接受的。毕竟，如果一个代表最先进行政水平的直辖市都拉胯了，那全国其他地方不得更拉胯啊？有人不承认拉胯的现实，甚至认为有人故意传播病毒。只是，某市所有的基层防疫人员难道都能这么好地领会到某些人曲折的意图，既要严格防疫，还要让病毒肆意传播？国家主义者也是时候认清现实了，拉胯就是拉胯，没有理由可找。过去一年防疫的成果一方面来自于民众的良好配合，另一方面来自于客观上病毒的传染能力还没有能够把这张本就漏洞百出的网击穿而已。

可在这么拉胯的行政能力下，主张放开防疫的一方，他们的建议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放开防疫需要极高的疫苗乃至加强针接种率，才能把病毒危害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先别说国内现在远没到那个水平吧，2021 年时天津防疫人员曾到北京有偿征集志愿者，到天津当地施打疫苗，以便提升当地的疫苗接种率。如果放开防疫让病毒传染，在注水的疫苗接种率下，又不知有多少人会受影响？医疗系统会受多大冲击？所以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在防疫和放开的二元对立，问题在官僚主义也。

# 日月前事

## 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发挥革命者的历史主动性——苏联解体对当代共产党人的启示

文 | 天明

内容提要：正确总结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是总结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以及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现实社会主义还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保留了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这是社会主义内部的保守力量及其政治代表走资派产生的经济基础。政治上缺乏社会主义民主是走资派上台的政治条件。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在修正主义统治下，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采取党内斗争的形式，必须要发挥历史主动性，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带给当代共产党人最大的启示。要避免再次复辟，一方面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生产水平提高和人们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已经不难做到了，另一方面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是先锋队，承担领导任务，政府在党的领导下承担行政任务，对政府公职人员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即选举制、随时罢免制和普通工人工资制，取消一切特权，建立廉价政府。具有参政议政和自我教育功能的群众组织的半独立状态是监督党和政府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关键。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专政，国家职能应该逐渐被社会所取代，这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条件。

苏联解体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作为二十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正确总结苏联解体，特别是正确总结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以及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当代共产党人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 一、区分苏联解体、苏共下台和苏联资本主义复辟

首先要界定的是，苏联解体和苏共下台是同一年发生的有联系但又有区分的两件事情。而苏联资本主义复辟要远早于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实际上放弃了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标志性事件。列宁说：“什么是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1]赫鲁晓夫就是在共产党内部的这种旧制度的代表，政治上主张全民党、全民国家，经济上鼓励物质刺激，外交上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共运路线上鼓吹和平过渡，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2]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后，苏共由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发展到80年代末，党内存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和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代表的保守派三股力量。这三股力量在如何对待苏共执政地位和是否保留联盟方面存在分歧。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下台方面是同盟关系，共同粉碎了试图挽救苏共执政地位的保守派发动的八一九事变，事变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1年8月23日签署了“关于暂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命令”。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

苏共下台，实质是自由派的胜利，经济上的意义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撕掉掩护，通过“休克疗法”瓜分国有资产，公开走资本主义道路，苏共的书记和国营企业的经理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大卫·科兹说，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苏共下台并不是复辟的开始，而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化和公开化，是官僚资产阶级内部分赃的新形式，所以，苏共下台时，没有群众去保卫这个党，因为苏联劳动群众怎么会去保卫这个早已复辟的政权呢？

休克疗法是对苏联人民程度更深的一次洗劫，但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保留了苏联时代的福利体系。因此，不能认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不问姓资姓社，大规模让工人下岗的结果比苏联解体要好多少。

苏共下台后，博弈转向了是否要保留联盟上，叶利钦主张独立，戈尔巴乔夫主张保留联盟。在加盟共和国之间，波罗的海三国早就不满苏联，最想独立，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工业基础好，也想独立，中亚五国是农业区域，需要中央政府的补贴，最不愿意独立，特别是哈萨克斯坦。戈尔巴乔夫试图保留苏联的努力很快被占上风的叶利钦制止。作为多民族联邦的苏联解体是必然的，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苏共是维系这个多民族联邦的唯一的纽带。苏联解体是联盟国家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

苏联解体的原因与斯大林时期开始没有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也有关系。斯大林认为民族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掩盖了存在的民族问题，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之后的几任领导人继承了这个传统，逐渐使得加盟共和国不满情绪增长，演变成苏联解体。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仍然值得学习和继承。[3]

正确总结苏联解体，最重要的不是追究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谁的责任大的问题，而是总结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以及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

## 二、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

---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是需要很好总结的，这是正确总结反复辟的前提。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痕迹，这是复辟的经济条件。

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苏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存在着三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少量的小私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个人副业）。

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开始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不得不对资产阶级专家实行高薪赎买政策，并赋予他们一定的企业领导权力，后来这些人逐步被苏维埃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所代替。苏维埃时代培养的这些人、经理等，许多人在组织上入了党，但他们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一九二九年普遍实行一长制领导以后，许多企业的领导大权，实际上是被掌握在这些经理、厂长、技术人员等人手中。在集体农庄的管理中，农庄主席拥有很大的权限，有的农庄主席要求：“每个庄员都绝对执行我的指示”。在知识界中，实行学位学衔制。实行这些制度的结果，使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强化和扩大。资本主义企业中那种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企业领导人员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资产阶级管理制度，形成了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第三，在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更是占统治地位。本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交换关系不能马上取消，在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的等级工资制，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但是，当时苏联在工资制度方面，逐渐背离了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把列宁时期规定的仅限于资产阶级专家范围的高薪制，逐步扩大到党政领导干部和新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极高的工资待遇。比如原本是为了能让为人民日夜操劳同志们吃饱肚子的“疗养食堂”，慢慢扩展成了特供商店，从吃饱穿暖进而演变为骄奢淫逸。1980年，鱼子酱事件、勃列日涅夫女婿丘尔巴诺夫腐败案件，1982年马戏团走私钻石、珠宝事件等案件的频发也是必然的结果。[4]

走资派并不像一般资本家那样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把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变为垄断权、剥削权、压迫权，实际上是把权力转化为资本。他们通过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以合法和大量非法途径，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恩格斯指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5] 党内走资派所以能够把职位和权力变成无偿地占有别人劳动的特权，把权力转化为资本，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分工，还存在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领导和管理国家的职能还不能做到普遍地由人们来轮流行使，还有一部分人的特殊职能。

其次，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得不保留了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情况下，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就变得非常重要。列宁说，政治相比于经济，不能不占有首要地位。毛泽东1959年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谈到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毛泽东说：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

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反抗。苏联在斯大林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拿着高薪，享受着政治权利和生活方面的特殊待遇，这部分人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或者说保守力量，他们对社会主义如何进一步发展是不关心的，反而试图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去解决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正如毛泽东 1959 年所说，苏联的工业和农业虽然还在发展，但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多年来基本上是停顿的，而且还出现了值得引人严重注意的倒退现象。[6]

由于现实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保守力量就其活动能量和影响来说，在社会上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里面既然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又有新的富裕阶层和特权阶层，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会寻找党内的代理人，这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在苏联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首先是从放弃马列主义指导思想开始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面否定了斯大林，实际上是放弃了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

领导权变更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随即开始。赫鲁晓夫认为苏联经济发展迟滞的原因，是经济机构组织不好。他多次下令改组苏联的经济机构，但仍然失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上台后，以为仿效资本主义的一套方法，也许可以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

他们提出了一套“物质上关心的法则”和“物质刺激的原则”，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一套作法，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样提出来，也未免过于露骨。而他们现在就把这一套，硬说是列宁的原则。实行这一套原则的结果，苏联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因为这一套“原则”，归根到底是鼓励人们去大肆追求私利私欲。实行这一套“原则”，使庞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把国家和世界大事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为了肥私囊而精神都变了。在苏联，贪污受贿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总而言之，人们都是为了怎样才能发财而奔忙。人们的思想腐化到了这种地步，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陷于一片混乱了。[7]

官僚集团事实上占有了大量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积累资金受到影响，再加上工人因不满官僚主义产生消极怠工，苏联的经济发展迟滞，后来的一系列改革继续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试图扭转经济颓势，直到 1990 年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最后，复辟是不是必然发生的呢？当然不是，否则就陷入宿命论。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虽然比较强大，但如果领导权能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复辟也不会发生，毕竟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的，大多数人是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权不被篡夺不能靠少数领袖的魅力和威望，需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否则就会出现人亡政息的结果。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对旧势力和剥削阶级的镇压结束之后，探索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形式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形式可以保证领导权得到群众有效监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类的倒行逆施能得到抵制而无法推行。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曾经发表《十月革命百年和当代共产党人的教训》，总结苏联复辟的教训，他们认为，除了理论错误和经济错误之外，还有一个严重的政治民主的失误，1936 年苏联宪法将苏维埃的生产单位选举制改为选区选举制，为国家



机关脱离劳动群众留下了隐患，让无产阶级的苏维埃逐渐蜕变成成为资产阶级的议会（从一个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纠正特权阶级错误的机构，变成了资产阶级利益分配的机构）。他们认为，确保人民对政治生活的普遍参与，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职能。这个观点值得参考，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代表的产生办法确实需要总结。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还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保留了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这是社会主义保守力量及其政治代走资派产生的经济基础。政治上缺乏社会主义民主，是走资派上台的政治条件。如果领导权落入走资派手中，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发生。

### 三，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后国内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满意的，人民也是不满意的，但苏联发生了反复辟斗争吗？应该来说，有，但并不多。从 50 年代后期到苏联解体前，苏联国内出现了一些毛派托派小组以及群众斗争，但并没有扭转复辟的趋势。苏联人民反对苏修统治的革命斗争层出不穷。他们曾举行罢工、集会、游行示威，并成立地下革命组织，散发传单，发表斗争呼吁书，直到举行暴动。1975 年 11 月，信仰列宁主义的青年海军军官萨布林，不满苏修统治，举行哗变，准备逃脱苏修的统治，后来起义失败，萨布林本人被处决。就在苏修二十五大开场的当天，列宁格勒某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列宁格勒有的青年学生散发传单，号召举行一场“新的革命”。[8]

一切反复辟斗争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左派没有形成类似布尔什维克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去领导分散的群众自发反抗。究其原因，是因为修正主义这种统治方式，与资产阶级的公开统治相比，有极强的欺骗性，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并不能很快的认识到党的修正变成了修正的党，认知上的不全面，也就无法形成全面的实践，加上修正主义形式上继承了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不允许党内公开的派别斗争。因此，苏联解体前，国内只存在反复辟的毛派小组和托派小组，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

之所以要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是由反复辟斗争的性质决定的，反复辟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

毛泽东精准地预测了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命运，但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毛主席对苏联反复辟斗争的思考，特别是对共产党内部派别的决裂和团结的辩证法。

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曾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是倾向于靠党内斗争的办法解决修正主义的。



1965年8月，毛主席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毛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中苏大论战后，受到中国继续革命的感召，印度共产党的革命派代表马宗达与印度修正主义政党决裂，另建新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非常正确的革命行动，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决裂在六十年代的继续。但印度无产阶级政党在与修正主义政党决裂后，自身又发生了多次分裂，分散了无产阶级力量。

1971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在南方多次提到，党内斗争要坚持“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要造修正主义的反，又要团结，这是不是矛盾的呢？

应该说，要区别对待。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派别内部，还是要争取团结，“三要三不要”是正确的，但与修正主义没有团结的问题。因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如果修正主义已经夺权，那么革命派一定是被清洗镇压，没有任何合法斗争的空间，所有修正主义统治都是如此，这个时候，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组织起来，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不能抱有幻想，消极等待。这个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与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斗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比如，毛泽东对王明左倾教条宗派不能采取分裂的方式，因为这个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遵义会议则是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通过内部斗争纠正错误路线的实践。遵义会议的成功在于无产阶级政党错误路线的主要人物是不自觉的犯错误，本质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同志，在毛泽东的争取下，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闻天和政治局委员王稼祥转到了正确路线一边。而陈独秀和罗章龙的分裂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极为不利的。

总之，在修正主义统治下，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采取党内斗争的形式，必须要发挥历史主动性，另起炉灶，这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带给当代共产党人最大的启示。

为什么在苏联复辟后，没有出现反对复辟的无产阶级政党呢？这里面的原因值得认真总结。除了修正主义统治的欺骗性外，无产阶级革命者自身缺乏历史主动性是更重要的内因。毛主席1966年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9]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确实是最早开始放弃列宁主义路线，修正主义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永远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发达国家国内照样还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存在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这里面存在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历史主动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进行艰苦卓越的工作，找到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候主要和唯心主义思潮作斗争，所以在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比较强调唯物的这一面。列宁在落后国家进行革命，非常强调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列宁的历史主动性，就不会有十月革命。这一精神被在更为落

后的中国进行革命的毛泽东所继承。那个时候的中国从客观条件方面，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明显是不够的，但是，中国革命者创造了中国式的革命新道路、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搞成了社会主义。

经过上一轮资本主义复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意识到，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这种复辟的后果是严重的，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完全被剥夺，劳动人民是不满意的，但苦于没有力量去改变。

很多糊涂认识认为，修正主义是不是比公开的资产阶级统治要好一些呢？不是的。因为修正主义的统治方式是借助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名义，搞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这种做法类似于皇帝的新装，是注定无法自圆其说的，是害怕人们揭露的，所以修正主义国家一般都要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导致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横行霸道，社会矛盾的激化。

## 四、如何防止胜利后再次复辟

按照苏联复辟的原因的分析，为了防止革命胜利后的复辟，必须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应该说前者在现在生产力和文化水平已经高度发展的状态下是不难做到了。关键还是后者。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时期，主要职能是镇压旧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国外敌人的入侵，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国内外阶级敌人被粉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职能就转变为继续革命（或者说继续阶级斗争）以遏制保守力量复辟资本主义和组织国内社会主义建设。

在旧的剥削阶级被镇压之后，党内既得利益者、保守力量（不斗争就会发展为走资派）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而这种专政不能仅仅寄希望于领袖和先锋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民主和专政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10]。

无产阶级民主如何实现呢？列宁认为“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11]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经验，认为巴黎公社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制”，使“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恩格斯概括了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一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 6000 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12]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原则，认为巴黎公社原则是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

“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13]

文革十六条再次确认了巴黎公社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文化革命期间，升官发财的机制被打破了，陈永贵等工农干部没有因为升官而涨薪水。罢免权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实现了，但陷入无政府状态，全面的选举制也在少数地区短暂的搞过一段时间，但没有延续下去，各级干部主要还是上级任命的，但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明确反对等级授职制[14]。

从社会主义历史看，等级授职制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状态下实行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人民的民主习惯和意识是要时间培养的，这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历史责任。但等级授职制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职人员产生的典型形式长期存在下去。

实行公职人员的普通工人工资制，不升官发财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列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15]

难点是选举和罢免，这需要一定的程序。文革十六条提出的先在群众中酝酿候选人、反复讨论再选举就是一种程序，这个办法的具体操作可以借鉴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豆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现在一些群众组织选举的经验，包括候选人的产生办法、竞选演说、辩论等，只要排除掉金钱和宗派影响就可以。西方民主的一些形式也不能完全否定，毛主席曾说过，“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16] 周恩来也曾说：“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17]

现在的条件比五十年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工业已经遍地开花，小生产逐渐消亡，人们的文化程度和眼界都大大提高，从近年村委会、业委会等一些基层民主实践来看，群众的民主意识是大大提高了的，但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如果加上社会主义制度和先锋队领导，那么现在落实巴黎公社原则会比上一轮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更好。

巴黎公社的选举制、随时罢免和普通工人工资制是解决人民群众与政府公职人员关系的方法。巴黎公社的缺点之一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是不能选举的，谁是党员也不能选举。

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处于领导地位，领导政府、军队和群众组织，政府在党的领导下承担具体行政事务。那么，如何保证党和政府不变质呢？组织起来的群

众是铜墙铁壁，半独立化状态的群众组织[18]的监督是保证政权不变质的关键。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群众是需要组织的。不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人们的政治觉悟和积极程度都是各不相同的，不可能都达到先锋队的水平，而且总是只有一少部分能成为先进分子，大部分群众则只能通过其他各种群众性组织，如工会、农会、青年团和妇联组织起来，通过群众组织来培养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的习惯和能力，使他们也成为有组织的队伍。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反对取消群众组织，让群众退回家庭，“要求群众走出家庭”，“在毛泽东这里，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既是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革命实践的目标。” [19]这和刘少奇把群众组织仅仅作为党和革命的工具的群众观有根本的差别。

群众组织不是唱歌跳舞的兴趣组织，而是具有参政议政和自我教育功能的政治组织，只不过层次和觉悟低于党。所以也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现实当中社团、工会组织的章程一般都有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否则容易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无法实现群众组织的功能。

但文革的教训之一就是出现了群众组织对立和打派仗的问题。原因何在？

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20]除了毛主席说的走资派的破坏、混进坏人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之外，派性还有一个内因，就是因为社会化大生产程度不高，工人阶级内部分成不同阶层，中央国营、地方国营和街道集体企业的工人，工厂工人和服务业工人，正式工和合同工、临时工，城市贫民等都是工人阶级内部形成派别的社会基础。毛主席说，“对派别要进行阶级分析”、“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21]。

随着机器大生产的普及，雇佣劳动制度的普遍化，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层大大减少了，如果这个内因基本消失了，那么打派仗就不是工人运动的必然，否则工人阶级的先进性、组织性和团结性体现在哪里呢？工人阶级就和小资产阶级没有区别了。建立在工人阶级先进性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更不可能出现了。

在1927年，上海工人在生产力更不发达且工人大量分散于帮会组织和国民党工会的状态下，仍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赶走了军阀。文革时期上海比较好地实现了“三结合”，就是因为上海是那个时候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工人阶级已经经过几代，农民和小生产者的影响比较小。这充分说明了工人阶级是能克服自身派性的。不能认为打派仗是工人运动带有规律性的必然发生的现象。

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专政，党的领导体现在思想、政治上和组织上，但不能长期包办所有的事务，国家职能应该越来越多的被社会所取代，比如文革后期把犯人放回去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那个时候犯罪率是很低的，群众安全感也很强[22]。再如，民兵尽可能地代替常备

军。这就是列宁说的“半国家”状态即“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一切都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国家职能就直接转变为社会职能，国家不再尽可能的将社会事务控制起来，而是尽可能的将社会生产和生活管理的职能交由社会行使，实现社会自治”[23]。

总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承担领导任务，对公职人员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半独立化的群众组织实现对党的有效监督，国家职能越来越多地被社会所取代，这样就能真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

## 五、结语

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后，往往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所以善良的人们短时间内看不清楚，但随着复辟的深入，群众慢慢也能认识清楚，老百姓一般把修正主义叫做“挂羊头卖狗肉”。毛主席曾说：“现代修正主义者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24]

修正主义的“三怕”应该成为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但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国家的人民的精神武器，马列主义者不能消极等待，应该发挥历史主动性，认真总结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组织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

---

## 参考文献：

- [1]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 年 11—12 月）
- [2] 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次谈话》，转引自 1970 年 4 月 22 日《人民日报》
- [3] 参见周尚文、张祥云：《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与苏联解体有关吗？》，《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6 期
- [4] 《从苏联变修看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由中国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写作小组、北京印刷一厂工人理论组、北京卫戍区某部四连战士理论组共同编写，1976 年
- [5]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632 页
- [6]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 年
- [7]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联书店（香港），1969 年 12 月
- [8] 参见李星：《苏联左翼地下活动小史》，网文
- [9]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1966 年 7 月 8 号
- [10] 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1919 年 9—10 月

- [11]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1917 年
- [12] 恩格斯写的《法兰西内战》1891 年单行本导言
- [13]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1917 年
- [14]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
- [15]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1917 年
- [16] 1956 年《论十大关系》原稿，转引自刘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发展》
- [17]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08 页。
- [18] 阳和平：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和其政党之间关系的探析（修改稿），网文
- [19] 黄道炫：《群众组织有什么用——1944 年的一场争论》，《抗日战争研究》，2019 年第 3 期
- [20]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967. 07—09）
- [2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五一社论：《乘胜前进》，1968 年 5 月
- [22] 袁庚华：《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群众专政观浅谈》，网文。这篇文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群众专政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专政。
- [23]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1917 年
- [24] 毛主席对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做的批语和修改，1963 年 11 月

## 中国共产党白区学生工作的经验与启示(1937-1949)（一）

---

激流按：城市工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环，而学生工作又是城市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在 22 年的革命实践中，党在白区学生工作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学生工作从最初的零星、小规模的运动逐步发展为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本文聚焦于党组织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研究。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基本历史阶段、典型案例、经验和启示，拟分三次连载，本文系连载第一部分。

### 一二九运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以农村根据地为主的武装斗争。但是“没有城市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1]，因此，城市工作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环，而学生工作又是城市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在 22 年的革命实践中，党在白区学生工作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学生工作从最初的零星、小规模的运动逐步发展为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当年一些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作为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已经为大众所熟悉，因此，本文将聚焦于党组织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研究。

### 一、基本历史阶段

#### （1）抗日战争前

---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长期被左倾错误路线的支配，在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方针指导下，白区党组织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花费在组建赤色工会、组织大规模的政治游行示威上，此时的学生工作仅仅对工人工作起辅助和配合的作用，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也大多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性的游行示威，进行盲动的政治宣传。左倾错误路线使得白区党组织遭受了重大损失，党支部被大量破获，党员数量流失严重。以上海为例，地下党员人数从 1927 年的 7000 余人萎缩至 1937 年 5 月的不足 200 人[2]。

1935 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地位。1937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系统地批判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和盲动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工作方针：取消赤色工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合法工作与不合法工作结合[3]。这次会议后，白区的工作开始步入正轨，党在白区的学生工作也蓬勃发展起来。抗日战争时期，一套正确的白区学生工作方针和策略探索成型；至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白区的学生工作趋于成熟。

## （2）抗日战争时期

### 2.1 公开合法活动时期（1937.7-1939.1）

1937年7月初，抗日战争爆发。在共产党的长期努力下，1937年9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发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一阶段，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高涨，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推行了有限的民主措施。共产党利用此时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在国统区的合法身份，进行广泛公开的宣传活动，建立了大量的抗战群众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战救亡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4]。

以广西为例，1938年国民党当局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共4000余人，共产党员积极参与进去，在学生军中建立了党支部，获得了领导权。学生军分别在广西的30多个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共产党员带领学生军战士，每到一地，就走家串户，访问群众，参加各种农事活动，同群众打成一片，然后，通过举办报告会，座谈会，出版墙报，张贴标语，演出戏剧，教唱歌曲，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痛诉沦陷区人民所受的深重灾难，激发起人民群众抗日救亡保卫家乡的热情。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学生军在各地城镇、乡村普遍开设了各种识字班，读书会，开展演剧、歌咏等活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高群众政治思想文化水平，引导群众关心国家大事与时局发展。他们还参与地方的民事工作，为群众排忧解难，处理纠纷；协助当地政府处理政务，解决疑难问题；引导和帮助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把青年、妇女，以至老人、而通过都组织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他们所到之处，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信任和爱戴。群众称誉学生军为“兵王”。[5]

在云南，党先后组织了公开的“学抗会”、民众歌咏团和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学抗会”编辑报纸，报道学生运动的动态；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启发群众觉悟；深入街头和农村，采取讲时事、演唱救国歌曲、演街头剧、报剧、话剧等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抗日救亡。“民众歌咏团”通过歌咏工作扩大宣传，以激励人民抗日热情，鼓舞青年学生开展斗争。在节假日举办歌咏宣传活动，组织各歌咏队参加各界群众抗日集会，定期在广播台演播抗日歌曲，组织创作新歌和出版歌集等活动，推广介绍进步歌曲。民众歌咏团还结合形势变化，组织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及时调整演唱曲目。此外，民众歌咏团还开办歌咏训练班，培训了一批开展革命歌咏活动的骨干力量，把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由昆明推向了全省各地，形成了全省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的高潮。在“学抗会”被国民党破坏后，党又发起成立了“抗先”、“民先”等组织团结进步学生，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组织学习马列理论，并在其中发展党员[6]。

### 2.2 反共逆流时期（1939.2-1944.9）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的策略发生了很大转变，由前一阶段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力图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全面压制群众运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



民党的反共活动达到高潮[7]。在国统区，国民党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1941年，中共鄂西特委遭受重大破坏，400多名党员和群众被捕；在闽西，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干部和群众700多人，杀害200多人；在湖南，数月内300余人被逮捕，十几个县的中共组织遭到破坏。由于国民党的疯狂迫害，国统区各省的共产党党组织受到严重打击，党员数目大幅降低[8]。

在国统区政治环境走向白色恐怖的背景下，中共及时调整在国统区的工作策略。1941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论政策》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十六字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成为了共产党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地下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在实践中，中共中央南方局[9]将十六字方针具体化，白区工作从组织方式都工作方法上都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组织方式上，主要有以下具体措施：

- 1、主动疏散干部，将已经暴露和将要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延安或新四军（略）。
- 2、以巩固党组织为主，一般不发展党员，加强对党员的气节教育。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江苏省委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党的组织求精不求多，不应大量发展……只有必须发展者，可以发展一些”。[10]南方局成立后直到1944年，总的政策方针也是一般不发展党员，以更好地隐蔽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同时，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时局，南方局很重视对已有的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信念教育和气节教育，主要的方式是讲共产党员先烈们的英勇悲壮、坚贞不屈的伟大事迹，教育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斗争，严守党的纪律秘密，不自首，不叛变。1941年，1942年，日机经常轰炸重庆，周恩来连躲避空袭的时间都不放过，经常在防空洞里讲先烈的壮烈故事，各省党组织也通过个别交流和谈话的方式加强对党员的气节教育[11]。

- 3、精简组织层次，缩小党的领导机构。

南方局规定，省委和特委领导人数一般为二到三人，可以不足，但不能超过，三人中留一人作为候补，不做联系工作，只做学问研究。湖南从省委到县委，一律缩减为三人，分别分管书记、组织和宣传工作；云南省工委不设部委，不建立国定的机关，仅组成由三人负责的领导班子，单向联系各自分工的地区，这一阶段内，南方局将大支部化为小支部，一个单位里可以建立几个平行支部，但每个支部人数不能太多，相互之间不能打通关系。

- 4、改变组织联系方式和领导方式。

同一地区或同一个单位两个以上的平行组织，互不发生横向的联系，严格执行“横不超支（部委），纵不越级”的规定。之前基层组织开会时，全体党员都参加，少则数人，多则十几人，调整后，党组织对党员以单线联系为主，如云南的弥勒，罗平等县，保留领导机构，但取消了常委会，由一个干部同县里分散的党员单线联系，实际上该干部执行的是特派员的职能[12]。南方局在是使用和教

育干部问题上，特别强调，使用干部时，要做到以保存干部为主，工作为次；以干部职业为主，工作为次；在培养教育干部时，首先以如何隐蔽为前提，具体教以怎样做秘密工作，方式是个别谈话和讨论工作为主。

#### 5、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活动和下层活动严格分开。

南方局和领导和工作人员一般都有公开合法的身份，是“明牌”的共产党干部和代表，他们一般不管地下党的秘密工作，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一般不做上层人物的工作，从事上层工作的人和从事下层工作的人即使在一个部门里，相互间也不交换情况，不发生联系[13]。地方党党员严禁与新华日报报馆接头，更不得向报馆索要书报和宣传品。南方局的机关红岩，当时设置了一条秘密通道，做秘密工作的人仅通过这条秘密通道进出[14]。

除了组织方式的调整之外，在工作方法上，南方局在多次讨论，总结各省地下工作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地下党工作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群众化））的要求，对于巩固党的组织，隐蔽精干力量，使地下党干部深入群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勤”中的“勤业”，是指共产党要在自己的工作中努力勤奋，钻研业务，做出成绩，获得群众的好评，在群众中扩大影响，树立威信。这样一旦遇到特务的迫害和追查，就会有群众出来保护和讲话。“勤学”，是指要勤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树立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时事，了解国内外形势，如果是一个学生党员，还得学好专业课程，做到成绩优异，成为教师和学生公认的好学生，以利于站稳脚跟开展工作。“勤交友”，就是要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要交，进步分子要交，敌人方面也要交，交了可以了解敌方情况；中间分子更要交，交了以便更广泛地团结群众，了解群众的情绪，带领群众前进。广交朋友并非不讲原则，和敌人交往时，要做到“同流不合污”[15]。

“三化”中的“职业化”，是指将社会中的某项工作固定地作为个人谋生的主要手段，进而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从而掩护自己开展秘密革命活动。“社会化”是指通过学习社会的知识，技能，提高生活技能和劳动技能，把自己塑造成符合社会要求的人，从而取得参与社会生活的资格，地下党要求自己的成员要尽量取得合法的社会身份来掩护自己，能够以社会普通一员的面貌来开展政治活动[16]。“合法化”是指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和条件，进入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部门与合法团体，获得社会职业与合法身份，做到职业、身份合法和所开展的社会活动合法。[17]

经过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调整，地下党在学生工作中认真执行“三勤”“三化”要求，有效地保存了党的骨干力量，并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在勤学方面，西南联大的党员和进步同学勤奋攻读专业知识，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在每次作业和考试中争取得到高分。党员齐亮钻研功课特别认真，除去课堂学习外，经常在下课后，找个茶馆坐下，不受周围的嘈杂环境影响，专心致志读书做作业，受到了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的赏识，他经常提出很多课题交给齐亮，希望他留校任教，由于党员和进步同学在学习中的刻苦努力和考试中的优异成绩，

他们得到了老师们和同学们的赞誉，并在一般同学中树立了威信。齐亮后来凭借其巨大的威望担任了昆明学联主席。

在交朋友方面，1940年，中共中央青委发布关于国统区青年工作的指示，指出统战工作的中心，在于交朋友，交朋友是今日国民党区域最重要的革命工作[18]。以云南为例，各级中共组织在交朋友方面创造了许多形式。一是宝塔式，即一个党员周围交3-5个朋友，3个朋友再交3个，即9个朋友；二是两三人或三五人不等，不定期的类似小组生活；三是个别联系，一个党员周围有三个朋友，分别个别来往，三个人不一定认识，从联络感情，互相有共同的业余爱好活动等开始，在学习上、职业上和生活上互相关切，进而讨论时事，学习革命理论[19]。四是秘密组织读书会，经过相当时期交友活动深刻了解到思想进步的，或从中间状态中经工作转为进步的，组织成秘密的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党报，党刊，进行时事讨论，读书会无明文章，无固定形式，有大体定期的学习生活，如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读书时很谨慎，甚至用黄色小说作为封皮进行伪装，称之为“白皮红心”[20]。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联大附中，云大附中等都有读书会。交朋友的过程中，云南的地下党员积极主动地从生活上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如在西南联大，由于物价飞涨，沦陷区学生依靠学校的贷金维持生活，校内伙食很差，地下党员齐亮挺身而出，办好膳团，到外县去购买物美价廉的米和菜，让同学吃饱，深受同学赞扬。通过几年交朋友工作，云南党组织团结了数倍于党的群众。

在交朋友过程中，南方局开创性地探索出了一种团结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形式——据点。随着交朋友的范围越来越大，联系到的积极分子越来越多，许多积极分子要求组织起来，完全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存在一定的困难，根据这一情况，周恩来指示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据点的名称根据周恩来的一次谈话确定：“干脆就叫‘据点’吧，我们在敌后安插了几个‘据点’，这里也应安插几个据点”。[21]据点既不是中共内部组织，也不是有固定形式如纲领，章程，名称、组织系统的群众组织，它是中共与群众保持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据点是基于友谊和共同的政见基础之上建立的，政治基础就是事实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遵循抗战民主等原则。一般来说，一个单位有三五个熟悉的朋友便可以组成一个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只有纵向联系，不进行横向交叉，它是一种秘密的进步组织[22]。如云南地下党员交友过程中组织的三五个人参加的不定型的读书会，事实上就是一个据点。到1945年春，南方局青年组建立的据点达48个，在20多所院校中联系的进步青年达上千人[23]。

在合法化方面，南方局和各地中共组织充分利用各种合法的团体，组织做发动和争取群众的工作，通过工作启发群众，掌握群众，以至掌握整个组织、团体。如民先，救国会、抗敌后援会，劳协，基督教青年会，甚至国民党，三青团等，凡是有群众的组织和团体，不管它是灰色的还是黄色的，都要设法进入里面去。[24]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中，地下党员组织了歌咏队，剧艺队，美术队，体育队等，并创办了多种多样的壁报，从联络感情、郊游、唱歌、比赛，学术讨论等形式把普通同学组织起来，使得群众生活活跃起来[25]。

通过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南方局领导下的各地党组织成功了保存了已有的组织力量。执行三勤三化的过程中，白区地下党成功地在群众中隐蔽下来，

发挥其群众政治核心的凝聚、引导作用，而且能就此而更加充分地掌握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并且，党的工作范围明显扩大，突破了白区地下党单一的工人工作范围，扩展到了学生、知识分子等各个群体，党的政治基础大大增加。

## 2.3 民主运动重新高涨时期（1944.9-1945.8）

1944年英美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苏联也已经把德国法西斯赶出了国土，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了反攻，但国民党却在豫湘桂战役（1944年4月-11月）中大败，中国军队损失五六十万人。在此背景下，一个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呼声在国统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高涨起来。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和各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国统区的民主浪潮由此兴起[26]。

在成都和重庆，从1944年5月4日起，各学校中有进步倾向的壁报纷纷出现，讨论时事政治、活跃学术与思想的聚会常常举行。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华西金陵等大学，都先后举行了一些座谈会，讲演会，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在华西大学，经共产党员倡议，发起组织了皖南事变后第一个公开的进步群众组织——“时事研究会”。与此同时，在成都成立了一批进步社团，如四川大学的“时事研究社”、“女声社”，金陵大学的“狂狷周刊”、“时声社”、南京大学的“燕京文摘社”、“星火社”等，他们用各种形式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1944年暑假，金陵大学等6所大学等20多名进步分子举行座谈会，一致认为：现在群众对国民党反对派日益不满，要求斗争，当务之急是尽快把群众组织起来，每一个进步分子都应该回到学校，用各种方式去组织群众。秋季开学后，各校又有一大批以进步分子为核心的社团组织起来，讨论时事政治，活跃学术与思想的集会更加频繁。

在云南，由于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矛盾，云南政府对民主运动持默许的态度。从1944年开始，西南学生中进步社团纷纷成立。1944年5月3日，在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联大学生举办了五四座谈会。5月4日，昆明学生3000余人集会纪念五四，要求民主。8日，西南联大的国文学会在图书馆的大草坪上举行3000多人参加的纪念晚会，晚会讲演号召科学、民主、救国的五四精神[27]。7月7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云南四校等2000余名师生参加了纪念抗战7周年时事晚会，进步学生和著名学者在会上发表演讲，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谴责、痛斥国民党的腐败和妥协政策。1945年4月30日到5月4日，云南省工委领导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后来发展成为建国前最大的秘密外围组织）以各大中小学校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和学生社团联合发动青年学生，组织五四纪念周活动。在纪念周期间，昆明各校学生和工人，职业青年络绎不绝地来到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参加青年运动座谈会，科学讨论会，文艺晚会，音乐晚会，诗歌朗诵会，书画展，球赛，火炬竞走等纪念活动，使近2万青年受到一次广泛的民主教育。特别是5月3日，举行了有三四千人参加的五四青年运动讨论会，社会知名人士，教授、大学生、工人、职员和中学生积极发言，群情激昂，气氛热烈，表达了人民的斗争意志。“坚持团结抗战！”“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口号声震撼着整个会场，显示出纪念周活动的浩大声势。当晚，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

克和“民青”组织负责人研究决定举行五四大游行。次日，1.5万人参加了五四大游行，由民主党派教授闻一多居首，高呼“坚持民主团结，反对独裁内战！”“取缔特务机关，取缔新闻检查制度”等口号走过昆明主要街道。游行结束后，又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专学生自治会名义发表了《国是意见书》，提出六条民主主张，通电全国。通过五四纪念周的活动，“民青”和进步社团迅速发展壮大，进步力量掌握了云南20所中学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并于5月成立了昆明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选出了地下党员齐亮任昆明学联主席[28]。

在民主运动中，不少进步青年要求靠拢党的组织，而当时南方局总的政策仍然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实行“三勤三化”，一般不发展党员。而新的民主运动和革命斗争在群众中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并且在日益走向深入的情况下，光靠社团、党员，进步骨干的分散串联，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让他们得到锻炼，积蓄革命力量，待条件和政策许可时再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已经成为青年运动发展的需要。在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带领和推动下，一批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各省市区出现。1944年10月，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成都的一批团结在党周围的进步分子组建了成都民主青年协会；1944年底，云南的一批学生进步分子成立了云南民主青年同盟；1945年，重庆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在原有据点的基础上，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这些秘密外围组织都有明确的纲领和章程，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目标，实行民主集中制，扩大了共产党在青年中的政治影响，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29]。

### （3）解放战争时期

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艰苦的地下工作，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数量已经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在学生总体中仍然处于少数，大部分学生依然处于中间状态。不少学生认为只有读书才是自己的正业，学好本事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不很关心政治，彼此很少联系，或者只作为运动的同情者，少参加实际活动；还有少数家境较富裕的公子哥儿，追求的只是比较舒适的物质生活，甚至除上课外很少留在学校里，对学生运动既不参加，也不反对。这两类学生最初在学校里处于多数，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30]，白区地下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大部分学生一步一步争取过来。

#### 3.2 第二条战线时期（1946.7—1949.1）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协议，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爆发。为了稳定后方，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独裁统治。1946年7月一周之内，特务暗杀了民主党派爱国人士闻一多和李公朴，军警任意搜查封闭报刊，大肆逮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

国民党一意孤行，悍然发动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支

京、天津、青岛 5 市发生的美军暴行至少有 3800 起，被横冲直撞的美军车轧死的中国人多达 1000 余人。1946 年 12 月 24 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抗暴运动)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后，地下党北平学委(南系)北平学委(北系)紧密配合，并肩战斗，发动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2 月 30 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 5000 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愤怒的学生高呼“美军滚出去”、“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要求严惩暴徒，赔偿损失，公开道歉，撤出美国驻军。学生的行动得到市民的广泛同情，他们纷纷加入到抗暴斗争的行列中。这场波及全国的反美抗暴运动持续了两个多月，参加学生到达 55 万人，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

1947 年初，国统区开始面临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失利，军费开支暴涨，再加上官僚资本巧取豪夺，使得国统区经济凋敝，恶性通货膨胀爆发，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如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到 1947 年 7 月已上涨 6 万倍。上海的米价，1947 年 6 月比 1 月上涨 8.3 倍。北平物价在半年之内上涨约 10 倍。1947 年 7 月 24 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个材料，说明法币 100 元可买的物品：1937 年为两头牛，1938 年为一头牛，1941 年为一口猪，1943 年为一鸡，1945 年为一条鱼，1946 年为一个鸡蛋，1947 年则为三分之一盒火柴了。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大量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危机日趋严重。靠工资收入的教师朝不保夕，靠助学金和贷金维持生活的学生受到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1947 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 月 15 日，南京中央大学等学校的学生 3000 人，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未能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决定 5 月 20 日举行大规模游行。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等也派出代表到南京请愿。在北平，5 月 18 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也纷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华北学生还成立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斗争声势日渐扩大，最终发展成为波及全国的“520”运动，这一运动后期又深化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以学生群众为先鋒的爱国民主力量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的发展，将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深地陷于革命力量两面夹击的不利境地而无法自拔。

### 3.1 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1945.9—1946.6）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蒋介石反对派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力量，在积极进行军备的同时，在政治上虚伪地邀请共产党进行和谈，并宣称和平建国，组建联合政府。经过了 8 年残酷的抗日战争，广大青年普遍渴望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对内战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初期，上海沪江大学同学会对本校学生的民意调查便反映了当时大部分学生的愿望：

表 1 沪江大学学生关于内战问题的民意调查

内战不可避免	可获政治解决	绝对应该避免	可望速战速胜	无回答
170人	110人	423人	244人	20人

在这一背景下，国统区的地下党一方面继续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实行三勤三化，另一方面开始领导群众开展了发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

这一时期，学校中的各种群众组织广泛恢复。北平的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组织了校友会，学生会，天津地下党成立了天津市学联；上海成立有近百所学校参加的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31]，不仅如此，在上海的许多学校，党员根据群众不同的爱好和需求，建立了文体性或学术性的组织，歌咏队几乎遍及大多数学校，读书会也相当普遍；壁报刊物社团甚多，剧社较多，各种研究会也不少。有的学校党组织根据女学生的特点，建立了女同学会或女生宿舍组织。一些学校的党组织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组织群众，建立了膳委会、学生自办的伙食团、经济食堂、助学小药厂、图书馆、合作社等。党组织考虑群众的现实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将群众组织起来。在次基础上，引导学生从“贫富悬殊”、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现象去反思社会制度。针对当时大多数学生由于物价生活而陷入经济困境的状况，上海地下党在 1946 年初发起全市性的助学运动，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后，帮 4000 多名学生解决了生活困难[32]。

另一方面，西南地区的共产党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宣传和集会。在云南，1942 年 11 月 25 日晚，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联合举办反内战时事演讲，到会的大中学生，教师，工人市民等共 6000 余人。著名教授在会上发表演讲，主张迅速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晚会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阻挠和破坏，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在报纸上污蔑与会人士为“匪”。学生教室等群情激愤，地下党迅速领导开始了昆明学生总罢课，最终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33]。

### 3.3 迎接解放，准备接管（1949.1—1949.10）

1948 年 9 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秋季攻势，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和收编国民党军队 154 万余人。这一时期地下党在学生群体的工作重心组主要是动员学生参与武装斗争迎接解放，以及进行护校斗争。

在广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逐渐平息下来，转入到开展保卫学校财产、反对迁校、保障师生安全的工作中。有的学生通过打入国民党的企业、机关，搜集材料准备接管的工作。还有的学生通过直接投身革命运动，进入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为建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与人民的解放英勇奋战。学生组织“爱国民主协会”的成员约半数以上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广东农村的武装斗争，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一支、大鹏武工队、五桂山游击区人民武装、珠江纵队、



北江二支队等。根据现有资料统计，仅广州的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文化大学、中大附中、执行女中、侨二师等校在解放战争后期牺牲的青年党员、地下学联成员就有 19 人，他们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上海，在争生存的合法斗争掩护下，各校广泛开展了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活动。护校活动一般是由全校性学生组织与校方合作或取得校方的支持，以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各种内容的护校队、纠察队、救护队、宣传队等，发挥群众创造性，巡逻放哨，开展多种形式的护校活动。1948 年底，党组织获悉国民党政府策划提前放寒假和延长寒假，企图将一部分学校(包括交大、同济等)迁往台湾和华南，一部分学校驻兵。针对这一阴谋，许多学校学生提出不放寒假，继续上课，自办伙食等，获得教师的支持，国民党当局的计划未能得逞。

激流按：城市工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环，而学生工作又是城市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在 22 年的革命实践中，党在白区学生工作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学生工作从最初的零星、小规模的运动逐步发展为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本文聚焦于党组织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研究。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基本历史阶段、典型案例、经验和启示，拟

分三次连载，本文系连载第二部分。



《“一二一”运动》，作者：王广范

## 二、典型案例

### (1) 广东中山大学的学生工作

中山大学于1940年10月从云南徽江迁回广东坪石。迁回坪石初期，学生人数1700余人，到1942年度招生后，激增至4100余人，其中包括各院系本科生3439人，研究生18人，先修班学生348人，香港各大学、专科借读生146人，以及少数南洋归国学生。学生和教师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学校，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各种政治派系的影响，情况比较复杂。地下党充分利用各种合法的组织，成立合法的社团，如班会、系会、级会、同乡会、同学会以及各种学术研究会、歌咏团、诗社剧团、壁报社，宣传党的主张，团结教育学生。

广东省委动员一批年轻的党员投考中大，并抽调一批有经验的党员干部回中大复学。有的曾任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有的曾在特委负责部分领导工作。省委还把原任特委青年部长、连阳中心县委书记张江明调到省委青年部任副部长，专职负责中大和几所高等学校与重点中学的地下工作。鉴于国民党顽固派自1939年以来不断制造反共事件，省委决定在中大不建立全校性的总支或党委，而在各学院分别单独建立支部，支委分工联系党员。先修班和中大附中都有党员。前后共有一百多个党员。张江明常驻坪石，直接与各学院支书联系，统一和协调全校性工作和斗争。

党组织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注意掌握政策。迁校坪石初期，各学院党员虽然不多，但文化水平、政治觉悟较高，其中一部分又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因此有较强的战斗力。党组织要他们对学院各派政治力量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分工负责联系学生群众和做教授员工的工作。在隐蔽地下的艰难岁月中，党员仍然保持十天或半月过一次组织生活，认真学习党的文件和指示。当时中大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社团，每系有专业性质的学会或研究会，如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教育、历

史等学会。每个学院有一个女同学会，同一届的学生又有横向联系的组织如动社、铝社等。各班还有班会，但没有全校性的学生组织。临时性的级系代表联席会是当时全校公认的学生合法机构。此外还有各地同乡会，其中人数较多的中原(客籍)、四邑、广西、潮州等同乡会比较活跃影响较大。中大党员积极领导和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用各种手段威胁利诱大学生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在中大的“军统”、“中统”等各自在学生中发展本派势力。中大党组织经多方面研究后，认为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可利用他们的派系矛盾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省委批准后，先后派党员关海、吴逸民、杨家杰、黄杰文等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担任区分部书记、委员或区队长职务，由此与代校长张云及教务长董爽秋经常保持联系，还利用他们与“中统”派的矛盾来掩护革命工作的开展。如地下党支持师院进步学生驱逐中统派院长齐浮林时，由于“军统”派的系主任也表示反齐，坪石举行的国民党党政军警联席会议就认为是“自家人闹来闹去”。“中统”派向韶关国民党省党部控告文学院岭风文艺社(地下党员黄杰文任社长)是赤色组织，由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起作用，就以“该社为我党(国民党)忠实同志所主持”，搪塞过去。“中统”派见文、法两学院进步壁报林立，于是大肆宣传两学院所在地的车田坝和铁岭已经“赤化”，参加国民党中大区党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则在上报国民党省党部的文件中称：“我党(国民党)致力于学术文化工作者众，所谓‘赤化’，实属无稽之谈”，弄得国民党省党部真假莫辨，还派专人来调解“中统”与“军统”两派之争，最后把“中统”的三青团干事长调走了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大一部分依靠海外接济的学生，侨汇断绝。更多的依靠学校贷金生活的学生也因物价暴涨，受到严重的威胁。特别是一向由外国进口的洋油(煤油)，一日之内涨价数倍，国产茶油价也跟着飞涨。学生们已难于饱腹，更没有有余钱来买油点灯夜读！因此，解决饱和光的问题，便成为大多数学生眼前迫切的要求。恰巧学校有人揭发总务长动用学生贷金去做生意，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学生们的愤慨，纷纷提出提高贷金，惩办贪污的要求。但也有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假冒若干社团的名义把矛头指向代理校长张云，指责他包庇有贪污嫌疑的妹夫，企图把张云拉下台取而代之。党组织对这些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大多数学生要求饱和光，是合理的，应予以支持和组织引导，但也要明确这次斗争的性质主要是关心同学的切身利益，改善同学生活待遇，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掌握贷金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斗争取得一定胜利后，就应适可而止。同时要提防“中统”派在运动中偷梁换柱，转移斗争目标。经过党员向各方面进行工作后，1942年春，各院系学生代表在车田坝举行联席会议，推选农学院的欧阳象才、工学院的张盛澄等学生(党员)为全校代表，率领学生队伍浩浩荡荡来到校本部游行请愿，要求学校增加并发放生活贷金和灯油费。张云派校长室秘书黄际遇老教授与学生代表谈判。他在向代表说明学校所能处理经费的范围后，表示愿意协助学生向教育部申请增加生活贷金和灯油费，以改善学生的学习待遇。双方经过进一步协商后，决定由学校电告教育部转达学生三项要求：一、增加学生贷金数额；二、另发晚间学习灯油补助费；三、今后贷金数额随物价上涨定期调整。此外由学校预借一笔现款帮助学生解决眼前生活困难。结果使50%的学生增加或获得生活贷金和灯油费。

1942年11月，在党被迫停止组织活动后，党员按照党中央坚持“三勤”活动的指示，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继续发展多种形式的社团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员工支持和拥护党的抗日、团结、进步的主张，为后来发动大批党员和进步学生进入游击区，参加东纵、珠纵等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1943年春，广东春旱严重，灾情为百年来所罕见。尤其是潮汕一带，百姓以草根、树皮、观音土为食，卖小孩以斤两论价，甚至有的灾民食人肉。加上国民党政府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奸商囤积居奇，致使各地粮价暴涨，中大师生的吃饭问题受到严重威胁。5月中旬，中大附中潮州同乡会与广西大学潮州同乡会、中原同乡会发起救灾运动，发出快邮代电呼吁政府切实救济岭东灾民。与此同时，坪石中大有大字报呼吁“既要救济灾民，也要救救我们！”诉说不少多子女的老教授已靠典衣卖物来维持生活，低薪职工和靠贷金度日的学生已处饥饿线上，要求学校和政府设法救济。大字报贴出不久，虽被特务分子覆盖，但随即又在各学院出现，而且愈盖愈多。这些大字报引发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共鸣，于是要求增加工资和学生贷金、灯油费的呼声在各学院此呼彼应，学生们互相串连，教职员工也积极响应。农学院学生因询问院长提高贷金消息遭到训斥，学生们于是要求校长撤换这位不关心师生生活疾苦的院长。师范学院的学生也再次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但是这时中大地下党奉上级命令已停止组织活动，执行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级组织党交待下来的任务是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党员不宜再出头露面去组织和领导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发起全校性的斗争。当时，法学院师生集会推举进步学生李士铮等五名代表（内有教职员代表两名）向学校请愿，提高生活待遇。李又暗中串连各学院在国民党、三青团任职、有双重身份的地下党员，共同研究行动部署。此时学校当局见灾情严重，各地出现抢米风潮，生怕学生闹出事来，遂通知各学院派代表与学校商量“共渡难关”办法，并先发放若干粮价补贴和增加少量贷金以缓和紧张局面。6月初，学校派总务长何春帆等约见师生代表，经过谈判协商，校方答应学生贷金可与全国物价最高的昆明、重庆地区同一标准，教职员工的粮价补贴则与广东省政府人员的补贴一致。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中山大学迁回广州，不久传来国民党镇压“一二·一”昆明西南联大学生争和平民主斗争的消息。中山大学地下党于1946年1月30日发动100多名中大学生，与广州其它各校学生共200多人，罢课一天，并且到广州市区举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示威游行，声援昆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揭露蒋介石策划内战的阴谋。1946年2月初，中共广州市青委书记林华康在罗湘林家里召开有罗湘林、廖建祥、罗柏元等人参加的会议，宣布成立中山大学党总支委员会，由罗湘林任总支书记，廖建祥任宣教委员，罗柏元任组织委员。全校各学院约有五六十名党员，“组织形式有的成立支委会，有的仅设支部书记，有的仅是小组或单线联系”，医学院在广州市区，党组织不归总支领导。

1946年2月下旬，三青团在中大及各校张贴反苏反共标语。21日晚，中大三青团分子还殴打不满三青团组织反苏游行的进步学生江仲怡。25日，国民党、三青团诱骗广州各校学生参加反苏游行。对此，广东区党委发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补充指示》，要求赶紧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发展各种细胞组织。中大迁回广州后成立的临工委在地下党总支的支持下，改组为级系代表会，并开展各社团

活动，恢复和健全“中师剧社”、“南燕剧社”、“春蕾壁报社”等。3月25日，针对“江仲怡事件”正式成立“国立中山大学人权保障会”。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白色恐怖笼罩广州。中共广州地下市委为保存革命力量，进行长期斗争，重新强调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要求做到“立住脚跟，联系群众，支援农村，整顿组织，转入地下。”部分党员撤退后，广州仅剩近百名党员。

中山大学地下党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在学生中成立各种秘密或公开的社团，并成立学生会，使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占了优势。这些进步学生组织常常召开各种座谈会、演讲会，讨论时局问题。茅盾、周钢鸣、司马文森等著名进步作家都到校作过演讲。但在广东国民党当局导演“五四”反苏游行后，进步力量受到打击，大批党员被迫离校。1946年12月24日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事件激发起学生的抗暴运动，中大地下党组织及时发动广州各校学生共2000多人，于1947年1月7日在市区举行抗暴示威游行。中大学生中部分积极分子，基于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自发地多次出面召开福利问题和时事问题的座谈会，于1947年2月间发起全校性的反内战、反独裁的罢课运动。但由于脱离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缺乏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公开斗争的经验和策略，加上广大学生正忙于期末考试，结果仅有少数学生响应，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而学校当局却乘机迫害进步学生，于3月初开除了10名进步学生。1947年初，中共中央青委通知各地区党组织要按实际情况建立党的青年外围组织，为在全国解放时建立青年团作好思想、组织上的准备。中共广州市委经研究决定，以党员为骨干，首先在中大建立一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定名“广州市爱国民主运动协会”（简称“爱协”），起草了会章和秘密工作条例。1947年3月29日，“爱协”在纪念广州黄花岗起义这一天正式成立，拥有会员约50人。这“是解放战争期间广州地下党新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外围组织。后来在中学发展时，采用‘学生联合工作协会’的名称。1949年春，又统一改称为‘地下学联’，但仍保留‘爱国民主协会’的名称用于发展其他阶层的成员”。“爱协”成立后，地下党组织便逐步把大部分学生积极分子吸收进来，帮助他们总结二月罢课的经验教训，对他们进行群众观点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

1947年震动全国的“五·二〇”惨案像一根导火线点燃了华南人民反内战的怒火。消息传来，中大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声援京、沪、平、津同学的正义斗争。5月22日中午，中大地下党马上向第一线的同志提出：“迅速打开局面，推动全体同学大会的召开，参加大会选出的工作机构，公开出面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的紧急战斗。但当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广州行营主任公开威胁学生说：“谁敢煽动游行就枪毙谁。”中大学校当局也贴出“严禁学生集会和游行，发起者一律开除学籍”的布告。这时中大几乎没有任何“合法”机构可用来发动群众了。要打开群众斗争的局面，就要有正确而灵活的斗争策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经何锡全等认真研究后，当天下午贴出一张既无题目又无署名的通告：“一群热心于时事和福利问题的同学将于晚上七时在福利饭堂开座谈会，届时请同学们踊跃参加”。当晚的座谈会开得很成功。会议决定要求“膳团联合会”尽快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这一决定得到与会的803位学生签名拥护，并以他们的名义发起，于5月24日召开全校2500多名学生参加的大会，打开了群众斗争的局面。

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破坏5月24日中大全体学生大会的召开，5月23日晚上，军统“十三太保”之一、三青团广东支团干事长黄某窜到石牌，召集中大的三青团及青年军的骨干会议面授机宜。内容是：“一、占据会场有利地位，集中力量，以便利发言及会场之控制，二、争取主席团人选，三、上述失败，就发动叫嚣、喧哗，扰乱会场，四、最后，以左臂缠白手帕为记，制造流血。”并派校外特务到会，以指挥三青团及部分青年军特务的行动。中大地下党摸清敌情后，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5月24日上午大会开始前，地下党已布置了勇敢的、身强力壮的学生把守门口、窗口和靠近主席台前排的位置。召集人宣布大会开始时，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一个特务迫不及待跳出来说：“今天起来发言的同学，都要先自报姓名、学院，系、班级的所在单位”。指挥唱歌的学生立即指挥大家高唱“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压下他们的嚣张气焰。推选主持大会主席团时，特务们抢先提出竞选人，表决时他们只有37票，而由学生们提名的5位，却以绝对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大会作出决议，选举产生了由45人组成的公开领导机构——工作委员会，其中，地下党员和“爱协”成员占1/3的名额，保证了党的具体领导，促使这次大规模爱国民主运动的顺利开展。

1949年2月初，在反对国民党政府南迁到中山大学的斗争中，先是发动师生抗议迁校的命令。校园贴出抗议的标语，指出“只有日寇才占用过中大”，“一致呼吁全校员工重振‘五·卅一’焚烧伪宪法流血护校的精神，誓死抵抗南京流亡政府的占据校舍扼杀教育”。然后在广大师生中进行反迁校的民意测验，结果89%的教授和83%的学生反对迁校，迫使国民党政府放弃原来计划。反迁校斗争取得胜利。

在反对教育部门提高学杂费的斗争中，各校采取统一行动，坚决反对教育当局提高征收学费和米费。结果，斗争取得胜利，大多数学生也不致失学。

中大附中主任张某自1947年“五·卅一”运动以来，秉承国民党当局旨意，先后开除进步学生10人(其中地下学联成员4人)。当其殴打萧教授事件发生后，地下党立即通过附中学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组织附中护校委员会，向张展开斗争，在报纸上公布其罪行，并在校内广泛发动学生给张写劝告信或警告信，迫令他立即辞职。中大师院派出20多名同学到附中着令张辞职，表示：“如张氏恋栈不去，决联络各学院学生一致声讨”。中大附中同学多次派出代表，并多次呈文，要求坚决撤销张的附中校主任职务。由于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迫使中大校方令张下台。

为了更有力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面目，揭露国民党政府制造的南京“四一”惨案，1949年4月15日在中山大学体育馆举行了追悼会。指挥部组织纠察队站岗放哨，迫使当局派来镇压的暴徒只好站在校门外张望。少数潜伏在校内的反动学生不敢轻举妄动。追悼大会发言的师生，充分利用大会讲坛揭露、控诉、声讨国民党当局镇压革命的暴行，誓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追悼大会变成了向反动派宣战的誓师大会。

## (2)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日常学生工作

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上海学生界的党组织继续长期隐蔽，开展群众斗争。其中，既有轰轰烈烈的大规模运动，如“欢迎马歇尔”的斗争，公祭于再，“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等，也有细致而扎实的群众工作。下面对于后者的相关经验进行了总结梳理。

## 2.1 通过勤学勤业，广泛交友，把群众组织起来

不论是哪一类学校，学生党员都抓住有利形势，在勤学勤业力争读好书，取得师长赞许，同学尊敬的同时，积极主动地联系周围群众。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和学习情况，关心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和他们交知心朋友，结伴同行，个别谈心，一起温课，交流思想，互助互帮，建立感情。再根据群众的不同特点，带领他们参加联谊性、学术性，以至政治性的活动，逐步扩大联系，进而启发他们组织起来，一步一步打开局面。

例如务本女中，在抗战胜利后 1945 年 10 月重新复校，学委即从外校抽调 8 名党员投考，去恢复党的工作。由于学校刚复学，同学互不相识，因此分布在 4 个班级的这 8 个党员，首要任务是做好调查研究，了解群众情况，她们在未正式上课前，就分工走访、结识了几十个同学。随后，根据该校学生大多家境清寒、注重学业的特点，与同学一起补习功课，互教互学，扩大了联系面。在此基础上，又组织了文体活动，发动了 100 多名同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二分之一）上街助学义卖，涌现出积极分子 50 人，到“六·二三”运动党员发展至 12 名。

大量的思想工作是以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以强烈的政治热情和对群众的深切关心来进行的。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自己也是在党引导下成长起来并且还在继续成长。他们通过和群众日常密切的交往，在一起上学、一同温课、走访家庭、嘘寒问暖、开展活动、参加斗争之中，围绕生活学习、时事形势、理想前途、个人遭遇等各种问题，以平等的态度，共同探讨议论、漫谈体会、交流心得、疏解苦闷、寻找答案，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启发：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引导他们从“贫富悬殊”、“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现象，从制度上去找原因；对于埋头“死读书”的学生，既肯定他们学习努力，又帮助他们开拓视野，关心国家、人民的命运，建立正确的学习观；对于出身上层家庭的学生，发掘他们身上青年人共有的积极因素，肯定他们的进步；对于女学生，把她们在家庭、社会受到的歧视，从妇女解放引伸到社会解放。像这样日常的、结合实际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是群众宣传教育的基础，是上海学生运动的好传统。

党员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将群众组织起来。有以班级、系科为单位的组织，也有跨系科的社团。在许多学校，党员根据群众不同的爱好和需求，建立了文体性或学术性的组织，歌咏队几乎遍及大多数学校，读书会也相当普遍；壁报刊物社团甚多，剧社较多，各种研究会也不少。有的学校党组织根据女学生的特点，建立了女同学会或女生宿舍组织。一些学校的党组织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组织群众，建立了膳委会、学生自办的伙食团、经济食堂、助学小药厂、图书馆、合作社等，考虑群众的现实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将群众组织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90%以上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都由进步力量领导。另外，在一些学校，建立了其他形式的全校性组织，也取得了公开合法地领导全校学生



工作的地位。进步力量在全校性组织中领导地位的取得与党组织行动迅速和关心学生生活等策略是密切相关的。如南通学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即派江苏省党部书记张某任院长，建立了三青团及中统组织，加强了控制。但党组织行动迅速，根据该校学生家境清寒者占半数的特点，组织了全校性的“同学互助会”，先后解决了约300人(全校学生为800人)的学费困难，使这个全校性学生组织站住了脚根，三青团的争夺，校方的取缔，均未得逞。

在组织广大学生群众的过程中，许多学校都遇到了国民党、三青团的阻挠和破坏。他们或通过校方压制，包办学生会选举，或企图使学生会与其“学生总会”挂钩，或硬把反动分子塞进学生会，或采用各种手法进行挑拨和打击。各校党组织坚决依靠群众，团结师长，开展斗争，巩固领导权。如同德医学院学生自治会成立后，三青团分子提出要向“学生总会”登记。为了挫败这一企图，党支部采取以事实教育群众的办法，组织学生代表去分别参观“学生总会”所在地和“学团联”所在地，群众亲眼看到前者设在三井花园(三青团上海市团部，今瑞金宾馆所在地)，接待的人都身穿军服，腰佩手枪，满嘴官腔，不象真正的学生团体；而后者的办事机构设在教诚小学的一个普通的房间，接待的人是约大等学校的学生，衣着、谈吐和一般学生一样，是学生自己的团体。结果群众都表示不愿与“学生总会”挂钩，而拥护同“学团联”联系。可见，斗争对于群众的教育作用是很大的。

这一阶段，各学校的群众组织工作，从广泛交友到形成多种群众性小集体，到及时建立全校性学生组织，工作是艰苦而深入的，也是很有成效的，局面迅速打开；群众的组织程度有较大提高，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 2.2 生活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

党的群众工作的一大特点是既关心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生活斗争中将群众组织起来，又能够将生活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上海学委组织发起的大规模助学运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劫收掠夺，准备内战，造成物价上涨，人民生活艰难，大批学生面临失学危机。因物价狂涨，1945年11月，上海各大、中、小学决定向学生增收第二期学费，金额较第一期增加达4倍以上，相当于沦陷期内学费的7倍。有团体联合发起了义卖助学章，被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抓走街头劝募的学生70余人。这次助学运动受到了挫折。

1946年初，学费继续上涨，上海学生中出现一个为数相当大的清寒学生群体，困难严重的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情况甚为紧迫。

根据党的指示，要把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同保卫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学委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再次开展大规模的助学运动。由于已经有了抗战时期助学义卖的成功经验和不久前1945年11月的助学运动受到挫折的教训，学委认为需要做到广泛发动群众，争取社会同情，扩大合法，并精细、主动地做好组织工作，从而冲破国民党的禁令，挫败国民党的阻挠与破坏。

首先建立一个公开领导全市助学运动的机构——“助学联”，随后便立即采取一系列争取社会同情、扩大合法的有力步骤。向国民党政府社会局和警察局申请登记备案。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向社会宣告：因“百物飞涨，失业众多，下学期学费昂贵，同学失学严重”而办助学，并指出：“虽已有上海市教育局办理教育贷金，但因失学过多，救济难以普遍，仍有多数同学受失学之痛苦，”驳斥了国民党所谓已经有官办的贷学金，学生们不该“多此一举”的论调。启事还公开宣布助学运动的数十所发起学校，办公联络地点为建承中学。宣布聘请法律顾问和会计顾问。各顾问也分别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接受聘请。随即又由若干著名人士登报声明，组成管理委员会，宣布在浙江兴等三所银行开户，所有捐款当日交银行。与此同时，各基层学校学生都纷纷行动起来，在校内放手进行宣传酝酿，筹组劝募小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助学联”还组织学生进行声势浩大的社会宣传，在街头和公园内讲演，演出活报，张贴标语漫画，在影剧院放映幻灯片，以及电台播音等等，争取社会公众的了解与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宣布助学运动为非法，但又不肯承认为合法。他们仍然试图进行种种阻挠和破坏，然而却更加坚定了广大学生团结起来，集体助学的决心。

在一系列紧张而有条不紊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准备的基础上，“助学联”决定在1946年春节举行全市学生大规模义卖助学章，并在《大公报》上公开刊登启事，公布义卖助学章的日期和助学章的面值，郑重声明助学章均编有号码，盖有印章，助学劝募小队人员胸前均佩带识别标志，做到堂堂正正，师出有名，组织严密，博得了社会的赞许。国民党当局十分被动，他们欲压不能，却又不甘心失败，匆匆忙忙在2月4日，以市教育局教育贷金委员会的名义也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说什么“推销助学章事与本会完全无涉，请各界人士切勿轻信”云云。针对这个启事，“助学联”顾问马叙伦当即于次日仍在《大公报》上作出批驳，他说：“国家金融无善策，物价日增月涨，学费也随而激增，政府不能制抑，以至学生自谋救济，我辈已非常内疚，教育贷金委员会在报上启事，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

助学运动引起了社会各界同样受国民党压榨的人们的普遍共鸣，他们纷纷伸出援手。助学运动共计帮助了4000余名学生解决了困难，并于3月31日在《大公报》上公布了得到助学金的学生名单和帐目结算清单，工作的认真、细致和周到深得社会赞许。

助学运动是生活斗争，又紧密联系政治斗争。党坚决代表群众利益，通过发动群众解决他们自身的学费问题，同时，又引导大家进一步认识失学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的内战与搜刮。通过助学运动，广大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加强了团结，得到了社会实践的锻炼和教育。运动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密切了党群关系，推动了学校基层工作，积蓄了力量，打开了一些新单位。运动在策略运用、争取社会同情方面是比较成功的，积累了组织大规模活动的经验。由于这次助学运动对国民党禁令的冲破，还有助于以后寒暑假期间，各种形式的助学活动的经常开展。这次助学运动，还同棉纺、上电、法电、三区百货业、酒菜业职工等要求按生活指数计薪，争取年终奖，保障职业的斗争，起着互相配合呼应的作用。

## 2.3 多种多样的群众宣传教育活动

抗战胜利之后，国统区政治文化中心东移，上海又成为革命进步文化活动活跃的中心之一，占领上海的宣传文化阵地的任务非常值得重视。在这一方面，主要的活动如下：

几乎所有学校都组织了读书活动，进行政治理论启蒙教育和时事形势教育。根据学校的具体环境，范围或大或小，形式大都为半公开，避免反动势力的监视和破坏。进步书报在学生群体中广泛传阅，并且与组织讨论或辩论相结合，不少学校党组织都根据群众思想认识上带有共性的问题组织讨论，诸如：抗战怎么能胜利？主要靠的什么力量？怎样才能巩固抗战胜利的成果？怎样才能使国家真正富强，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究竟往何处去，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也有讨论：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内战的责任何在？罪魁祸首是谁？爱国青年的责任是什么？等等。有的学校还结合女学生的特点讨论：封建半封建制度下妇女的地位与出路，妇女怎样才能解放，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等。广大学生读了解放区的报道，体会解放区人民翻身、军民团结和生产建设的新面貌；看了茅盾的《腐蚀》，联系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认识；学了《大众哲学》，讨论“雷锋塔怎么会倒掉”，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认识为什么人民力量必将胜利，反动派终将覆灭；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新人生观讲话》，议论“人的一生要怎样度过”、“什么是青年应有的人生观”等等。

学校还会举办讲座，或一校单独举办，或数校联合举办，或结合晚会、庆祝会进行等等，邀请老一辈的进步知识分子，给予青年学生以帮助和支持。

抗战胜利后，“上海联”的歌咏工作也开始开展，学生系统一些热心歌咏活动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在各种集会上指挥唱歌。歌咏活动迅速在各校兴起，上百所学校建立了歌咏队，一些主要的学校几乎有会必唱，重点学校更是班班唱、天天唱，新开辟的学校或力量不强的单位常有以歌咏活动为着手点，从而打开局面的。可以说哪里有歌声，哪里就有党的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活报、舞蹈活动、观看进步电影和戏剧，创办多种学生界的报刊等活动，这一些措施所掀起的进步文化运动在青年学生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激流按：城市工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环，而学生工作又是城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2 年的革命实践中，党在白区学生工作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学生工作从最初的零星、小规模的运动逐步发展为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本文聚焦于党组织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研究。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基本历史阶段、典型案例、经验和启示，拟分三次连载，本文系连载第三部分。



### 三、 经验和启示

#### （一）坚持走群众路线

在学生运动中，广大学子积极深入城乡，与民众打成一片，动员群众持续深入推动运动发展，这是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特点。

在日常的工作中，党组织领导学生积极深入到工人农民生活中去。抗战初期，学运同工农相结合，学生们组成各种宣传队，利用节假日，赴工厂、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掀起救亡运动的高潮。在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领导了多次助学、尊师等上街义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地下党员启发身边的学生群众把歌场舞榭中那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与人力车工人、码头苦力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表现作对比，促使同学们对旧社会的腐败和阶级对立建立了初步认识。在1947年底的“救饥救寒”运动中，上海地下党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要在运动中加强对学生的社会阶级教育。抓住募捐和发放的两头，带领学生深入到地区劳动人民中去访贫问苦，并与十里洋场的见闻相对照，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事实引入思索，对学生们起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作用。许多当年的学生，包括一些出身在上层家庭的学生，至今仍然记着从这里受到的第一次强烈的阶级教育。以后在许多新党员的入党报告中，都着重说明了“救饥救寒”对自己的教育和思想转化作用，可见其影响之大[1]。

在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时，党组织始终领导学生积极响应劳动群众的斗争。如发生在1945年得电力工人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致死的“胡世合事件”中，复旦大学便通过学生联合会、壁报联合会等系统，召开多种多样的座谈会，到会者纷纷控诉特务的罪行；复旦大学的学生还冲破敌特的阻挠，到胡世合灵堂对死者

表示哀悼。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党组织发动抵制美货的斗争中，上海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后援会，发表宣言，掀起了巨大的同情浪潮，激励了更多的民众起来对国民党反对派展开斗争[2]。

## （二）灵活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和政策

形势决定策略。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工作方针和策略也必须随之而发生变化。抗日战争初期，针对共产党可以在国统区合法活动的政治环境，中央书记处便发出指示，把群众工作的重心放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习惯、政府法令和合法组织的方面进行与群众的长期埋伏工作。地下党领导青年学生建立了大量的抗日群众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到城市街头和乡村开展抗日宣传，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掀起了反共高潮，公开的党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几乎全部被取缔，白色恐怖到来，这一时期，地下党及时转变工作方式，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并创造性地开辟了“三勤三化”的工作方法，地下党员在学生群体中广交朋友，建立了大量的据点，不仅保存了党组织的有生力量，而且团结了数倍于己的进步青年，这些进步分子在后期大多被吸收入党；1944年，国统区民主运动重新高涨，地下党组织动员学生参与到民主运动中，并通过秘密外围组织的方式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如在昆明开展了大规模的五四和抗战纪念活动，极大地教育了广大群众。

抗日胜利初期，国共尚未完全破裂，许多青年学生尚未完全看透蒋介石政府的本质，但他们又强烈反对内战，此时党组织便领导青年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学生群体频繁展开座谈会，进行集会，揭露内战阴谋，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昆明的一二一运动便是其中的高潮，也正是在一二一运动中，大量学生对国民党的独裁本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爆发，由于前线战场失利，军费开支巨大，而且官僚资本巧取豪夺，国统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此时，党及时提出了“为生存而斗争”“将生活斗争引向政治斗争”的方针，以学生运动为发端，掀起了轰轰烈烈“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开辟了进攻反对派的第二条战线；在1949年之后，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此时，地下党组织青年学生，开展了广泛的护校斗争，迎接解放的到来。

正是由于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灵活调整策略，国统区地下党在学生工作中不仅能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且逐步由弱变强，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队伍，给反对派以沉重的打击。

## （三）利用多样化的方式组织群众，开展宣传

白区地下党在多年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丰富的组织群众的经验。在各种类型的学生组织中，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是最接近党组织的一种形态。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最初成立于抗日战争末期，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学生中的秘密外围组织以团结在党周围的进步青年为主力，这些秘密外围组织有明确的纲领和章程，明确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中的领导层大多是地下党员。

秘密外围组织是党在开展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的得力助手。以民青为例，1945年初期，在民青的协助下，党组织成功地掌握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专四大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在1945年的五四期间，通过民青的联络和组织，云南地下党发动了纪念五四周活动。一二一运动时，昆明市学生中的党员人数不足20人，而且非常分散，因此，党对学生的领导，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主要通过民青来贯彻执行。当时的民青掌握了中等以上学校罢课委员会的领导权，广大盟员一直活跃在第一线，带领群众英勇战斗，冲锋陷阵，在一二一运动中起到了核心和骨干作用。到1946年7月，民青已经在昆明40所大、中学里建立了组织，掌握的进步社团达一百六七十多个，联系的进步群众达三千人；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一部分盟员回到清华，北大，南开，在北平和天津也扩展了民青的组织。1949年解放时，民青在云南全省的盟员达到5000人，在全国已经达到上万人[3]。通过这种秘密外围组织的方式，将暂未达到党员要求的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对党开展学生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秘密外围组织之外，党还注重通过合法的方式组织群众。建立地区性的学联组织，并夺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学生自治会是校内群众组织的核心，掌握了学生会，便能联系到广大的学生群众。以昆明为例，1944年，经过党组织的周密布置，进步分子逐步掌握了西南联大各系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并在校会选举中，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败了三青团成员，夺得了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4]。夺得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昆明市成立了大中学生会联合会，为领导一二一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夺取校内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并组建地区性的学联，一方面可以更密切地联系和组织群众，另一方面在重要的学生运动中，党组织可以通过学生自治会这种公开的形式实现对运动的领导。

在学生自治会以下，便是各种各样的社团。党组织放手地、深入细致地开展日常的群众工作，广泛建立各种层次、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开展各种学术性、文体性、联谊性以至政治性的群众活动，并力争公开合法。一切群众习惯的形式(包括同乡会、结拜姐妹，以及有些学校的复员青年军联谊会等)，即使是落后的形式，也不放弃争取和运用其中有利的因素[5]。通过歌咏、演出、办墙报等各种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朽反动统治，教育广大学生；建立读书会，开办学生图书馆、组织进步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北京大学为提高广大师生政治觉悟，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还曾专门举行过五四纪念活动，举办科学晚会、文艺晚会、历史晚会、经济晚会、戏剧晚会、诗歌朗诵会，以及五四运动史料展览，邀请大批教授进行民主讲演。中共地下党组织注重融健康、进步、革命的内容于学生的一系列社团活动中，通过宣传教育，不仅大大提高了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和斗争热情，而且通过进步社团，广交朋友，联络感情，争取中间青年学生的同情和帮助，也为在时机成熟时发动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准备了群众基础[6]。

合法既包括合乎官方之法，也包括合乎群众习惯之法。如1946年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助学义卖活动，虽然不符合当时国民党相关法规，但是由于当时大量学生生活异常贫困，助学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国民党当局始终不敢宣布助学义卖活动为非法，助学活动最后获得了巨大成功，为4000多名学生解决了困难。

在组织群众的过程中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的方式结合起来，白区学生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四）高度注重学生群众的利益

---

党组织的群众工作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必须善于把党的政治主张与群众的现实利益密切结合，努力维护并实现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学生工作中也是如此。在日常工作中，地下党员通过三勤三化，帮助身边的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如西南联大的齐亮，主动竞选伙食团长，到外县去购买物美价廉的米和菜，让同学吃饱，因而得到同学的拥护，最终被选为联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和昆明学联主席[7]。

除了日常学生工作外，白区地下党还注重将生活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物价飞涨，学生生活异常困难，各地党组织党领导了各种形式的生活自救，义卖义演、互助互济、“活命大拍卖”，发展到后来广泛的储粮应变活动，帮助很多贫困学生解决了生活困难，赢得了学生的支持。党组织还积极领导学生同国民党当局开展斗争，有的学校成了争生存联合会等，要求校方和国民党政府实行全面公费、按物价指数发薪、减免学费等，1947年的五二零运动便是高潮。通过这样一些争取生活条件改善的斗争，共产党争取到了越来越多青年学生的支持。

#### （五）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

---

统一战线是革命的法宝。毛泽东在1947年指出：美蒋的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8]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没有什么群众，他们已经完全孤立了[9]。”白区学生运动的实践证明这些论断的完全正确。当时，整个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和鼓舞很大，学生运动的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很广，包括教授、教师、校长、家长、社会各界人士，及其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在内。

教授和教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大多爱国、正义，爱护青年学生，不满美蒋反动统治，他们的教学事业受到压制，生存受到威胁，日益倾向革命，支持学生正义斗争。学生必然要和教师联合起来，不应该同他们对立；同时，通过斗争去影响和推动他们。对他们不能要求过急，要多理解和体谅他们的处境和利益。要尊敬他们，同他们建立亲切的师友关系。对他们的不同观点，不遽加批评，也不把观点强加于他们。对他们提的意见，只要是有一定道理的，学生方面都要接受，即使接受不了的，也要说明理由，使他们谅解。如1946年，上海一个学校的教授会决定要反欠薪，学生准备声援，但有些教师还有顾虑，学生尊重老师意见，表示可以看一段再说。1947年“五·二〇”运动后期，一些学校教授希望学生早日复课，被捕同学由他们负责保释，学生尊重老师的意见，实行“休止罢



课”。1949年南京“四·一”惨案后，一些教授表示不赞成用普遍罢课的方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党的领导意图也是这样，学生表示接受老师的意见。

对于那些学术上、教学上有成就，或是担任学校一定行政工作，而且是正义感较强的教授和教师，进行团结和争取更加重要。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对他们敬之以师，重之以礼，待之以诚，持之以恒。对于一些主要的教授，有威望的名教授、老教师，指定专人联系，由一些他们的“得意门生”和品学兼优的同学进行个别联系和争取，平时就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争取做到知心程度，这就为后来的工作打下可靠的基础。

针对广大教师、教授在生活上、学术上面临的问题，始终注意在学生运动中适时提出要求。1946年，上海党组织发动敬师、尊师运动，反对降低教师生活。1947年5月，提出提高教职员待遇的要求。中学“反会考”斗争中，包括着“改善教师生活”、“保障教学自由”、“誓改进教学设备”的口号。1948年11月，上海市立中学教师要求发放补助金，实行“总请假”，各校学生表示坚决支持，对老师进行慰问。除此之外，党组织还多次提出讲学自由、言论自由、反对国民党特务党化教育等口号，与广大教师协同作战。

白区的工作实践证明，广大爱国、正义的教授和教师们，由于学生方面平时尊重他们，支持他们，关心他们，在运动中又经常与他们商量，听取他们一切合理的意见，所以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在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运动进行疯狂镇压时，他们能挺身而出，有的进行罢教抗议，有的同学生一起上街，有的愤而辞职，有的设法掩护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个别教师甚至因此遭敌人逮捕和杀害，表现出老一辈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热爱青年学生、崇尚真理的高贵品质，他们对我们学生运动的胜利发展，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做好校长的工作很重要。对于校长和学校上层当权人物要作具体分析，他们的政治表现、与国民党的关系和办学态度各不相同，学校的性质也不尽一致。他们大多数人，一面要秉承统治当局的政策法令，一面又与统治当局存在程度不同的矛盾，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要根据具体情况，做争取工作。有不少校长，他们政治上基本持中立态度，有的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开明的办学方式，对学生生活性、学术性活动一般不加干预；对学生的政治性活动，超过他们所认可的范围，在当局的压力下，则要加以压制。学校党组织采取以团结为主，有时进行必要的说理、批评的方针。在组织学生社团、开展群众活动时，把工作做在先，尽量争取合法，如请校长为墙报、刊物题词，成立学生自治会由他们信得过的“好学生”出面与校方商谈，一般活动事先向校方打招呼。有的活动，校方怕出事，进行干预，则采取灵活的方法，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作一定的让步。有的学校经费困难，学生自治会发动同学节水、节电、节煤，使校方感到学生是顾大局的。学校党组织还提出各种口号，支持校方向当局要求增加经费，增加私校补助费，反对当局对私校的歧视，反对当局对非嫡系学校的排挤等等，对争取校方也起了一定作用。1946年底“抗暴运动”开始时，正值期终考试前夕，南洋模范中学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罢考三天的决议，以抗议美帝的暴行。在当局的压力下，校长亲自出面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支部决定“在坚持罢课的原则下，天数可作让步”，经过学生代表与校方谈判，最后双方作了妥协，学生方面同意将罢考三天

改为一天，校方表示默认，达到了预期目标。南模学生罢考的消息上报后，在整个中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也是争取校方的成功一例。

对于一些同国民党政府关系比较深的校方人物，他们对学生运动时有对立情绪和行为，对他们也要注意分析，不要一眼把人看死。在解放战争后期，他们中分化和动摇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更要立足于团结争取。这样做了，所以解放时，他们大多和师生一起参加了“护校应变”，坚持留了下来。解放后，这些人又有了进步，个别人以后还加入了我党。最后逃到台湾去的是极个别的。

在学生运动中，团结争取社会上的上层人士联合他们一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也很重要。首先是著名的左派人士，以上海为例，当时左派人士群英荟萃，党组织在学生工作中邀请他们到学校去演讲，发表文章和声明支持学生的斗争，在出面向当局交涉，营救被捕学中，这些左派人士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有正义感的社会名流、学校的校友、学生的家长都要争取，有时他们的话比左派人士的话更能起到特殊的作用。1948年上海反美扶日的“公断会”，就是依靠社会上层人士和左派人士一起，加上唐文治、张元济发表《致吴市长信》，才挫败了国民党当局发动的“神经战”。又比如：在美货大量倾销，民族工商业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地下党主动将助学运动与爱用国货的宣传紧密结合，曾在1947年、1948年二次举行全市性的“爱国助学、国货总推销”运动。这样，学生界的斗争与民族工商业界的爱国斗争，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上海学联”也得到过工商界进步人士盛丕华等的经费资助。此外，上海学生运动中的几次大逮捕，地下党组织都通过社会上层人士和家长代表人物，争取著名律师，开展营救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学生界内部也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学生内部，基本上是党的群众工作，但在某些方面也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如学生中的民主党派成员、重要的上层人物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的子弟、教徒，以及某些国民党军队(如青年军)的复员军人学生等等，也须根据不同的特点，做好工作。

学生运动中的统战工作，有时也扩大到对国民党一般军警人员。在斗争中，提出适当口号，对他们做争取工作，诸如：“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谁无父母，谁无儿女，内战对谁有好处”、“警察、学生是一家”、“物价狂涨，警察也苦”等等，起到较好的作用。有的警察悄悄地对老师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有的警察为被捕学生送信。通过这些广泛而细致的统一战线工作，能够在斗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胜利。

## 群众运动的成功范例——波澜壮阔的一二一运动

编者按：今天是一二一运动 76 周年纪念日。一二一运动是党组织领导的成功的群众运动的范例。群众运动有其客观规律，先锋队如果能够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变化灵活调整斗争方式，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运动进行正确的领导，便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壮大自身。



### 一、抗争胜利前云南的各方政治势力

1930 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各地依然处在事实上的割据状态。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一些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矛盾重重，云南便是如此。地方实力派在云南有较强的经济基础，根据 1942 年的统计，昆明有规模宏大的新式工厂 30-35 家，带有国防性质的重点工业企业 11 家，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及云南省企业局下属的银行、工厂等的资金约 3.5 亿元。此外，云南与英、美等国有一定联系，云南地方金融系统在设法加深和维护这种关系。地方实力派时刻防备和抵制蒋介石的排斥异己政策，对外联络川、康、桂等地方势力，对内强化地方统治。在军事部署上，国民党中央军虽在昆明周围驻有四个军，在昆明也有防守司令部和宪兵十三团，但是省主席龙云规定市区治安归地方宪警维持，国民党中央宪兵无法插足。在这一复杂局势下，地方实力派便可能接受某些程度和范围内的民主，甚至允许某些方面的进步。加之抗战后内迁许多高校，云南汇聚了诸如西南联大等一大批著名高校，有许多著名专家学者也聚集在此，昆明因此也具备了发展民主运动的基本条件。抗战期间，南方局[1]和中共云南省工委积极开展针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使得龙云对民主运动总体上持支持与默许的态度，并多次拒绝国民党顽固派的镇压命令。此外，在中共地下党的斡旋下，龙云甚至建立了与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联系的秘密电台，双方就抗战、民主建国、召开国民参政会等重大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2]。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云南省工委总体上进行了正确的领导，党员数量和群众组织规模不断扩大。抗日战争初期，省工委利用国共合作的特殊政治环境以及共产党的公开合法身份，开展了以抗战和民主为主题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3]。皖南事变[4]后，国统区整体上陷入白色恐怖，进步的群众组织被取缔，大量共产党员被反动派抓捕和屠杀[5]。南方局及时转变工作策略，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推行“三勤三化”[6]，及时地保护了地下党组织，在群众中扎下根来，并于1944年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后来发展成为建国前最大的秘密外围组织）[7]。1945年大后方掀起了新的民主浪潮，云南地下党顺势而为，开展了五四纪念周、抗战周年纪念晚会等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呼吁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些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地下党和民青逐步夺取了昆明市主要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并成立了昆明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由地下党员齐亮担任学联主席[8]。由于采用了正确的工作策略，云南的民主运动在国统区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态势，西南联大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这使得反动派大为恼火。

## 二、一二一运动前的云南政治局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便筹划着进行内战，消灭共产党和其它民主进步力量。由于共产党进行了广泛的工作以争取和平，同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准备尚不充分，他们便一方面虚伪地邀请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行和平建国的谈判，另一方面暗中积极地整军备战。双十协定签订之后，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了暂时的平衡，国内呈现出了一片表面上的和平态势[9]。既然这种和平建立在不牢固的力量均势基础之上，而这种均势又极易被打破，和平的局面也就不可避免地是短暂的。

由于云南省主席龙云积极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协商建立新中国，并在云南境内支持民主运动，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1945年10月，滇南边区总司令卢汉奉命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趁昆明兵力空虚，部署中央军第五军邱清泉发动兵变，将昆明城内滇军缴械，免去龙云原本各项职务，调往重庆，任命卢汉为新任省主席。卢汉等在越南听闻事变后拟率滇军返回昆明援救龙云，但蒋介石早已派重兵驻在云南、越南交界的险要地段，卢汉等欲归不得，无可奈何[10]。在卢汉返回昆明之前，由蒋介石嫡系李宗黄代理云南省主席，由关麟征带理云南省警备总司令。蒋介石秘密召见李宗黄，要求他在云南消灭民主堡垒，镇压学生运动。军事政变以后，邱清泉常以查户口为名，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反共不积极的学校校长被撤职，白色恐怖严重地笼罩着昆明。

尽管云南省工委在抗日战争期间取得了不小的工作成绩，但在1945年12月前，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仅有不足20人，民青成员仅有300人左右，实力依然较为薄弱。在严重的政治环境下，省工委的总体判断是：客观形势对我极其不利，一定不要硬碰硬。省工委对组织及时进行调整，并提醒党员和民青成员对反动派的进攻做好充分的准备[11]。

## 三、一二一运动的历史过程[12]

## 1、反内战时事晚会

双十协定刚签订不久，国民党便动用军队进攻解放区，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1月通过《新华日报》等多种渠道号召各界群众动员起来，反对内战。抗战胜利后，社会各阶层争取和平建国的愿望也非常强烈，因此昆明许多学生纷纷要求对反内战有所表示。

在云南复杂的局势下，省工委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以西南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在11月25日召开一次跨校的时事晚会，请几位不太引人注目的教授演讲，发表一个通电，促进反内战运动，这样既响应了中共中央的号召，也不至于引起反对派的过分关注。但云南代主席李宗黄得知此事后十分惊恐，在11月24日召开的云南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做出了“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未经本省党政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的规定。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联大党支部商议后，为避免硬碰硬，决定将跨校晚会改为了联大的校内集会，同时请张奚若教授向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疏通[13]，并将召开晚会的决定告知了联大校方，当时的课余校内集会实际上是不成文的习惯，地方政府从未干预，校方也认为，学生开会一事，“似无劝阻必要”，同意在校内举行时事晚会。

11月25日晚7时，晚会在联大举行。在晚会进行过程中，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军队层层包围了联大新校舍，多次发射子弹向会场进行低空射击。群众伏地听讲，讲演照常进行。特务又割断电线，熄灭灯光，主持大会的同学立即点燃准备好的汽灯，晚会仍然坚持下去。

学生在校内举行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合法集会，并且事先进行了合法报备，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并以枪炮相威胁。双十协定曾明确规定人民群众享有集会和结社自由，但却遭到如此粗暴的践踏。晚会结束后，联大的学生无比愤怒，纷纷要求罢课抗议。联大支部党员在新校舍征集罢课的签名，所有宿舍的学生都表示同意，当夜签名的人高达500多人。26日早上，国民党中央社火上浇油，在发布的新闻消息中，将联大合法集会的学生污蔑为“匪徒”[14]，更增加了群众的愤怒，罢课情绪更加高涨。

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和联大支部商定后判断，云大和中法等高校很可能罢课，许多中学也可能响应。李宗黄和关麟征来势汹汹，从策略上讲，敌人高压之下，不应该硬碰。但是敌人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学生已经自发的罢课，党组织应该因势利导，有领导、有组织的展开对敌斗争。同时，在昆明4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中，地下党和民青能掌握的占20所，地下党和民青成员能影响的有16所，处于中间状态的有6所，被三青团所掌握的仅有3所。于是，省工委决定改变仅举行时事晚会的计划，由昆明市学联联络组织领导罢课。

## 2、罢课和一二一惨案

从11月26日起，在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的组织动员下，各大高校和中学纷纷开始罢课。27日，昆明市学联召开各大中学校代表会议，决议全市总罢课，成立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28日，罢课的学校达到31所。罢联通过决议向全国发布公告，表达罢课的诉求：立即停止内



战，要求和平，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要求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身自由（以上为第一类要求），取消党政军联席会议 11 月 24 日禁止集会之非法禁令，保障同学人身自由，不许非法逮捕，中央社更改污蔑联大之荒谬谣言，并向当晚的师生道歉（以上为第二类要求）。第二类要求作为复课条件，以利于争取教师和社会的支持，以及及时休战。

针对学生的罢课行动，李宗黄、关麟征执行国民党中央的指示：“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所谓“以宣传对宣传”，就是由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发表反动社论，污蔑学生罢课，说现在的危险“不是内战而是内乱”，“不是学潮而是政潮”。所谓“以组织对组织”，就是成立反罢课委员会，下设“行动、情报、破坏、撕毁”等组，盗用学生的名义，反对罢课。所谓“以行动对行动”，就是有组织地派出每队 5 人-100 人不等的特务，遍街殴打宣传队的同学，捣毁学校[11]。针对反动派的这些行为，罢联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敌人的污蔑进行有力有据的驳斥，同时组织纠察队，保护上街宣传的同学[15]。

在罢课的过程中，罢联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29 日，部分联大教授召集罢委会同学开会，出于对学生学业和安全的考虑，闻一多、吴晗等多位教授表示了担忧，他们在谈话中告诫学生，如继续罢课，将危及学校前途，荒废学业。针对教授们这些观点，联大同学并没有针锋相对，而是表示理解。但同时坚持，如果无条件复课，必将使民主运动遭到严重的挫折，增长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事后，罢委会派出代表，分头访问各院系负责人和有影响的教授，向他们说明：学生罢课是迫不得已，只要当局能接受学生提出的一些最起码的要求，就可以立即复课。经过多方努力，进步的教授更加积极地支持学生，中间派教授态度也有所转变。最后，联大教授会通过了决议书，对地方当局侵害集会自由的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的抗议”。此外，罢课得到了民主派人士的广泛同情，民盟云南支部发表声明：“完全同意这一运动，声援这一运动！”，学生在街头的宣传也得到了广大工人和普通市民的支持。

在罢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过激倾向，如部分共产党员和民青成员提出了“罢工、罢市”等宣传口号，不同意以第二类条件的实现作为复课标准，而是坚持必须实现第一类条件。云南省工委认为，党组织几年来积累的力量不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在反动派压力太大的情况下，应竭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上述主张或者脱离广大市民的实际情况（罢工罢市口号），或者是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停止内战，要求和平），只会给敌人镇压以口实。云南省工委和联大等党支部讨论后决定对这些高涨情绪要爱护，不能责备，但要加以启发，以理说服并进行引导。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参加罢课的党员统一了认识，学生的口号和行动始终没有超过广大普通群众所能接受的程度，尽可能地团结到了大多数同学。

11 月 28 日起，李宗黄和关麟征对学生的迫害行动开始升级。29 日学生被打事件高达 25 起，30 日更多。30 日，三青团云南支部秘书周坤率领特务练习投掷手榴弹。联大师范学院、云大和中法大学都被武装特务闯入，撕毁书报，捣毁物件。在日益严峻的高压形势下，云南省党组织认为，如果立即复课，群众一时难以转弯，而逐步缩小战线则可以群众所接受，于是罢联通知各校加强戒备，暂

停上街宣传，要求同学不要单独外出。在这一大的背景下，特务的进攻更加猖狂，制造了一二一惨案。

12月1日，李宗黄向三青团骨干成员和便衣特务训话：以流血对流血！随后，大量特务手持武器，向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昆华女中，南英中学等大中学校进攻。他们野蛮毒打前来劝阻的教授，用木棒、石头追打学生，甚至在校内投掷手榴弹。当天共有4名师生牺牲，重伤25人，轻伤30多人，其中党员、南菁中学老师于再便是在劝阻拉开手榴弹导火线的军人时被手榴弹炸伤，当场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自1926年段祺瑞政府在三一八惨案中开枪打死47人后，中国便没有出现政府在学生运动中打死人的事件。一二一惨案发生当天，立刻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怒火。



图1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地方反动当局派遣军官总队人员和特务携带凶器，进攻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等校，镇压学生。

### 3、一二一惨案后的斗争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全市大中学生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原来对罢课不积极的学生，现在也积极起来了，很多原本未参加罢课委员会工作的学生也自发参加了。全市罢课声浪更加高涨，反对罢课的言论销声匿迹。社会各界对国民党特务在校园内殴打和残害师生表示一致谴责。迫于压力，关麟征到联大假意慰问道歉，并派人送去花圈、现款和两口棺材，被罢联言辞拒绝。看到形势不妙，反动派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李宗黄和关麟征开始内讧，国民党与三青团、中统和军统特务之间也相互推诿，一些凶手当街相互争吵殴打。12月1日晚，关麟征招待各报社记者，希望记者们不要刺激学生情绪。



一二一惨案后，云南省工委在分析研究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加强并扩大以学生为主的战斗队伍，争取工人、职业青年、教师及公务人员等各方面的支援，利用反动派矛盾，集中一切力量，向以李宗黄、关麟征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宣传方面，要公布事实真相，做到有理有据地揭露当局残暴罪行，争取社会多数的同情，狠狠打击国民党中央嫡系的反动派。

12月3日，罢联公布了《告全国同胞书》[16]，除了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外，还在原来第一、二类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类关于昆明血案的要求：严惩祸首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抚恤死者，医治伤者；赔偿一切公私损失。具体层面，罢联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三种：

（一）孤立反动势力。罢联动员各个学校公开检举三青团特务，联大要特务悔过，替罢委会刻蜡版，抄宣传品。特务成了过街老鼠，云南大学学生中的特务甚至不敢回校住宿。一时间，公开的或暴露的三青团销声匿迹了。

（二）扩大宣传，深入社会。自12月1日起，罢联出版了《罢委会通讯》，反驳和澄清国民党中央报社的一些污蔑和造谣言论，报道国内声援昆明学生的动态。此外，罢联还组织昆明大中学生张贴街头壁报，每天出动100-150个宣传队到人口密集的室外场所演讲，讲述一二一惨案的真相，学生们自编自演了大量的活报剧和话剧，并合唱爱国歌曲，吸引了大量的群众。此外，昆明大中学生还深入到工厂、农村以及市民家庭进行挨户宣传、访问、谈心，在同群众的接触中争取各阶层对运动的支持。



图2 昆明学生举

行游行示威

（三）停灵公祭。自12月4日起，罢联发布讣告：愿祭奠四烈士者，可来西南联大停灵处。自讣告发出之日起，每天来参加公祭的人络绎不绝。除了昆明中等以上的学校学生，还有大多数小学师生、工人、农民、职员、士兵、军官、工商业者、地方士绅、宗教界人士都纷纷前来吊唁。在停灵公祭的一个半月里，

参加灵堂祭奠的人数达到 15 万人次，占当时昆明总人口的一半，参加的团体共 700 多个，送来的挽联达上千幅。



图 3 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四烈士灵堂

罢联的行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12 月 2 日起，全市的工人、职业青年甚至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官兵纷纷向罢联寄来捐款，支持学生的斗争。民盟云南支部公开发表声明，对反动派的暴行表示抗议和谴责。全市大中学的教师签名发表宣言，声援学生运动。联大教授会决定停课罢教一周，以示抗议。上海、重庆、西安、武汉、长沙等地发起了大规模的追悼会，并于会后举行游行，表达对昆明学生的支持。国民党反动派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为了掩盖罪责，反动派千方百计推脱责任，先是抛出几个特务当替罪羊，宣称惨案是“个人行为”“误伤”，上演了一出公审假凶犯的闹剧，罢联对这一自导自演的闹剧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直指幕后的真凶为蒋介石嫡系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此外，国民党还强迫昆明中学提前放假，对中学断炊，以孤立大学[17]。针对这一局面，罢联组织中学生尽可能留校，自办伙食，或者动员中学生搬到大学里面进行住宿，以坚持参加运动。由于以上破坏行动未能得逞，蒋介石便亲自出马，发表讲话，威胁学生“一切问题以恢复常态为前提”，否则他“不放弃安定社会之职责”，罢联对蒋介石的讲话公开作答，对其进行逐条驳斥，反动派的以上伎俩都没有成功，被迫将关麟征停职议处。

#### 4、运动后期的复杂局势和停灵复课的实现

随着运动进入后期，斗争的形势更加复杂，对于学生提出的取消禁止游行之非法禁令、切实保障人身自由、中央社更正污蔑师生之荒谬言论以及政府支付安葬、抚恤、治疗费用等诉求，国民党中央已经事实上接受，核心的矛盾在于追究11月25日射击联大事件（涉及到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和惩治凶手，虽然关麟征已经被停职议处，但李宗黄和邱清泉依然逍遥法外，这两个人是蒋介石的嫡系，反动派自然不会轻易退让。一二一惨案后，在云南的国民党嫡系力量已经臭名昭著，蒋介石只得派新任省主席、地方实力派二号人物卢汉来收拾残局，卢汉总体上是拥蒋保己的态度，他答应了学生的部分诉求，但在惩凶的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决定权，如果运动继续下去，卢汉最终将按照蒋介石的意旨强硬行事。

12月9日之后，运动的高潮逐步褪去。在12月9日之前，联大参加“罢联”工作的学生约为总数的1/3，12月10日以来逐步下降，到14日，已经降到1/4，一部分学生有疲倦的感觉，不少持中间态度的学生对运动逐渐冷淡，没有事就去茶馆聊天，看电影消遣。如果运动再持续数日，则这些中间同学也将会退出。

另一方面，新上任的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咄咄逼人，威胁全体教授辞职，并扬言如果继续罢课下去，则将解散西南联大，各个学校提前复员，将继续罢课的学生交给警备司令部去处理。12月10日，云大教授讲师80多人也发表告同学书，要求学生尽快复课，许多中间派教授也认为罢课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此外，蒋介石密电卢汉，如果学生不能按期复课，将按照指示做“最后处置”。

综合这些情况，运动已经到了后期，惩凶的诉求涉及到反对派的核心利益，很难通过继续罢课争取成功。如果无限期罢课，将会失去广大中间学生和教授的支持，使进步力量陷于孤立。在此背景下，云南省工委审时度势，修改诉求，不再以追究11月25日射击联大的责任作为复课条件，同时将惩治凶手这一诉求定位于同联大教授会一起斗争，促成李宗黄和邱清泉的辞职。最终罢委会上将复课最低要求由七条修改为五条。在联大、云大以及多数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地方军政当局答应了罢委会的五条要求。12月25日，罢委会宣布停灵复课。停灵意味着斗争告一段落，但不出殡，意味着并没有放弃斗争。1946年3月16日，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免去李宗黄各项职务。3月17日，昆明学联为一二一“四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公葬。至此，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



图 4 1946 年 3 月 17 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昆明学联冲破反动派的重重阻挠，组织了由昆明各界群众 3 万多人参加的盛大出殡游行。

#### 四、云南省工委领导一二一运动的基本经验

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和一二九运动后最大的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它揭开了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序幕，粉碎了蒋介石直接统治云南的企图，为 1949 年卢汉的起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一二一运动并非有意识策划的行动，云南省工委本想避敌锋芒，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不与反对派硬碰，但反动派的暴行却使得矛盾迅速升级，自发的学生抗争兴起，白区地下党积极参与其中，实现了正确的领导，使得一二一运动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综观云南省工委领导一二一运动的历史过程，有以下几方面的经验值得重视：

坚持走群众路线。广大学生群众的支持是一二一运动胜利的根本保障。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建国是社会广大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殷切期望。双十协定明确规定了集会结社自由等各项民主权利，但在云南的蒋介石嫡系分子却频频挑衅，压制学生群体正常的民主诉求和集会自由，甚至在校园内制造残酷的血案，使得昆明学子群情激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这场运动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众基础，运动中也始终坚持着明确的具体诉求：惩治凶手，修改国民党中央社对反战时事晚会的污蔑、保障人身权利以及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这些诉求，反映了最广大学生群体的呼声，因此，绝大部分昆明大中学生参与进来。在一二一运动过程中，地下党和民青通过罢联、罢课

委员会、学生自治会等把广大学生组织起来，使得大量的进步学生和中间派学生也都积极地参与到运动中来。正是依靠各种各样的方式组织群众、发动广大学生群众，云南省工委才能在党员仅数十人、党组织的秘密外围成员仅 300 人的条件下，领导起规模达数万人的学生运动。

在斗争中锻炼干部，发展组织。一二一运动前，联大中学生党员不足 20 人，云南民青成员仅 300 人。在一二一运动过程中，地下党员和民青团员积极参与到罢联的工作中。每一次重大的决策，都是云南省工委同这些党员和民青团员反复商议讨论后做出的；在关键性的转折时刻（如运动后期及时复课），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都深入到学生中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使得广大学生形成共识，运动始终沿着统一的方向前进。这批党员和民青成员在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一二一运动结束后，大量民青成员被吸收入党，一些表现优异的学生被吸收进入民青，党组织和秘密外围组织迅速扩大。到了 1946 年夏，联大中的学生党员人数超过 100 人，民青盟员发展到 600 人。参加一二一运动中的多数党员和民青成员在西南联大复员后回到平津地区，成为了北平民主运动中的领导者和骨干。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云南省工委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在运动过程中，罢联始终把矛盾牢牢对准国民党的嫡系力量李宗黄、关麟征和邱清泉。对于地方实力派代表卢汉，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罢联总体上表示支持和理解的态度，使得卢汉始终处于居中调停的姿态，没有直接倒向反动派一边镇压学生运动。在运动过程中，曾有一些中间派教授以及进步教授由于担心学生安危，或者不了解情况，对学生继续罢课持反对态度，罢联均派出与这些教授关系密切的学生或老师，向他们仔细说明情况，解释罢联的合理诉求和主张，最终使得大多数教授都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或同情。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刚从北平来到云南的时候，并不了解一二一惨案，他对学生的行为不认可，要求学生限期复课。罢联并没有因为梅贻琦的这一态度直接将梅划入敌对阵营，而是请梅贻琦的老同学闻一多出面与其交流，经过四小时的谈心，梅贻琦转变态度，支持学生的条件，积极与政府当局进行交涉和商谈[18]。此外，罢联还组织学生深入到工人、农民、职员等社会群体中进行宣传，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程度地孤立了敌人。

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抗日战争之前，共产党的白区工作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表现之一便是斗争中提出过高的政治目标，只知道进攻，不知道撤退，不愿意做任何妥协，最终使得党员和赤卫队成员脱离广大群众，骨干力量损失殆尽[19]。在总结错误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20]，一二一运动一直践行着这一原则。惩治凶手、修改对学生的污蔑言论等条件，是广大学生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支持，罢联在运动中始终理直气壮。通过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对派的嚣张气焰，保障了学生的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在运动后期，当多数中间派学生疲倦，日益脱离运动，且许多教授也要求尽快复课时，罢联并没有坚持无限期罢课，而是适当妥协和让步，修改了条件，及时实现了复课，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运动的成果，为日后云南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里以关于一二一运动后期复课分析的两段话结束本文：

*“这时就应该衡量利害，假如坚持原案，继续罢课，在现在中国的情况下，不易办到，结果必致引起内部的分化，失去社会的同情，使运动陷于孤立而无法*



继续，招致重大损失。若能将条件稍加修改，能团结内部力量，取得社会的同情，也能取得部分的胜利。而且反内战民主也不是短期所能奏效的，而复课也不意味着工作的停止。假如此时适可而止，保存实力，巩固胜利，复课以后可以换一种方式，作有效的努力，所以在这时将条件做部分修改，考虑复课，这种做法是对的。”

——联大罢委会，1946年1月

“我们不仅要在斗争开始时，善于掌握具体情况，提出正确的口号，取得一些胜利，更重要在斗争过程中，善于观察情况的变化——反动者策略的改变、社会同情与声援的减弱，群众斗争情绪的提高或低落等，根据新的情况来事当和适宜的发展或结束这一斗争。”

——《青年生活》，1945年12月23日

# 日月精华

## 努力让大家一文理解马克思的逻辑

文/孙睿

载/大石内藏助 3152626835

我一直对马克思当年到底说了啥非常好奇，毕竟哲学家们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误

然而我相信对马克思的理论有一定的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一百多年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演变过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 20 世纪出现的各类所谓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组织背后的逻辑。

最近浅读了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 Peter Singer 的 **Marx: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感觉自己终于对于马克思的主要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初步了解。谨在此对于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做一个提炼和总结，希望能够帮助到对这一话题同样感兴趣的朋友们。

声明：这篇文章是对于 Peter Singer 教授的这本书的总结，力求简明全面。至于这本书对于马克思主要思想的理解是否准确、客观、全面，我没有考证（毕竟看不懂资本论，也看不懂德语 hh）。关于 Peter Singer 教授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评价是否正确，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并没有绝对的对错。

### 〇、提要

- 将马克思的理论看作哲学思想，比看作经济理论更加恰当。
- 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以及人性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新颖和深刻的理解方式。
- 马克思从未具体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怎样的社会。
- 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核心假设和愿景可以说是难以实现、甚至不切实际的。

### 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

不同于历史唯心主义所认为的「理念或者大人物制造历史」，「唯物史观」是一种决定论的学说，即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可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source: 维基百科）



## 1) 物质生产活动是世界的最真实形态

历史的发展有其目的吗？还是「历史」只是一种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变化的随机过程？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历史」是达成某个可发现的目标的必要过程 (p.56)。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有目的的。

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是我们的思想在不断地进化，还是物质的世界在不断地改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思想和意识并不是世界的最真实形态，物质的生产活动才是」 (p.57)。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生产潜力的解放，就是历史的终极目标。

## 2) 生产力决定社会关系和社会道德

要理解这个逻辑，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些概念。

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指我们用于生产活动的资料**。这不仅仅包括生产使用的原材料，也包括处理原材料的机器以及劳动力等。(p.47)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直接决定生产关系。(p.48)

什么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这些都是生产关系。

那么「生产力直接决定生产关系」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如果我们只能用手工磨坊做面粉，那么我们会发展成一个以地主为主的封建制社会；如果我们能用蒸汽机磨米，那么我们会发展成一个以资本家为主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PP 219-20)

马克思同时认为，生产关系直接决定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又直接决定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包括法律体系、政治体系、宗教体系、甚至道德体系。(p.49)

**生产力 -> 生产关系 -> 经济结构 -> 社会上层结构 (法律、政治、宗教、道德)**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自身的劳动力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反过来决定了人类自己的思想、意识、甚至本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被自身的生产力所控制**。然而在过去的历史中，大部分人类无法意识到、或者无法控制这种力量。(p.45) 比如说，大部分奴隶无法意识到奴隶主的权力其实来自于自己的劳动成果。但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他们也无法摆脱奴隶主的控制，或者无法使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奴隶主剥削。



英国的纺织工厂

##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理解

生活在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看到工业革命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财富和更好的生活，而是繁重的劳动压力和来自资本家的剥削。他试图解释为什么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反而使得人们过着更差的生活。(p.75)

### 1) 资本的组成

当我们说「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什么是「资本」？

马克思认为，「资本」包括原材料、生产工具、以及保证未来生产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生活资料。(p.62)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生产原材料、生产工具、还是生活资料，这些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所以，即使是传统经济学家们也认同，资本是劳动力的累积。

### 2) 「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

当我们说「商品」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什么是「商品」？首先我们需要辨析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两个概念。

现在我手上拎着一斤糖，那么这一斤糖的「交换价值」可能是两斤土豆或者 20 元人民币，而它的「使用价值」则是它满足人们对甜味的需求的能力。

可以发现，使用价值是独立于市场而存在的，但交换价值则恰恰相反。所谓的「商品」就是市场中的交换价值。

因此，资本也可以看做是商品的总和，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交换价值被用于交换劳动力、并且这些劳动力被用于生产更多的交换价值的时候，交换价值才会转化为资本。(p.62)

### 3) 「物化的劳动力」与「使用的劳动力」

(本人文学修养实在堪忧,不知道如何意译这两个词才能充分保留其原有的含义,所以就简单采取直译了。)

马克思同样也将劳动力分拆出了两种不同的性质。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相似,「物化的劳动力」指以时间为单位被售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而「使用的劳动力」指购买的劳动力实际上能够为资本家产出的财富。(p.66)

举个例子,奶茶店以 20 块钱的时薪雇佣你工作八小时,那么你的「物化的劳动力」可以说等于 160 块钱。在这八小时里你眼疾手快、上下翻飞、卖力工作,最终为奶茶店带来了 300 块钱的利润,那么你的「使用的劳动力」可以说等于 300 块钱。

在马克思生活的初级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论员工的劳动力为资本家带来的收益有多少,员工的工资都是固定的。资本家们获得工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但是只需要付与其交换价值相等的工资。(p.66,70)

### 4) 「剩余价值」

恩格斯曾在马克思的葬礼上说,马克思第二伟大的贡献就是对剩余价值的发现(不要问我第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那么什么是剩余价值呢?很简单:

**剩余价值 =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 劳动力的交换价值**

也就是说,你为奶茶店贡献的「剩余价值」= 300 块收益 - 120 块工资 = 180 块

人类的劳动力有着天然的创造能力和生产能力,但与此同时,劳动时间也可以作为物化的商品被交换。这二者的差值,就是劳动力的剩余价值。(p.66)

基于前文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家的实际收益其实就是员工劳动力的**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并不是「多余」的,恰恰相反,剩余价值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不断增加的主要动力**。

那么如果你是资本家,你会怎么提高你的收益呢?很明显,扩大剩余价值。如何扩大员工的剩余价值?两个方向:降低他们的交换价值,即降低工资;或者提高他们的使用价值,即提高产出。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两样东西,深受广大资本家的喜爱,因为它们既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降低工资,又可以提高员工的生产力。马克思把它们叫做「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p.70)

劳动分工使得每一个工人只需要做简单且重复的工作,而技术进步能带来更高效的生产机器。这不仅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提高了资本家的收益,而且还使得一个人就能完成原本多个人的工作量,从而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在这种发展趋势下,资本家的收益增加了,但是劳动力需求的下降使得工资也跟着降低了。(不知道为什么的同学请移步经济 101 课程)

## 5) 「必要社会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

如果以金钱为单位折算劳动力，那我们可以分出「物化的劳动力」与「使用的劳动力」；如果以时间为单位折算，则劳动力可以分为「必要社会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

「必要社会劳动时间」指一个人用于维持其生存所必须的劳动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指在必要社会劳动时间之外，工人必须为资本家工作的时间。(p.71)

## 6) 工人阶级的反攻

在以上的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家最终会被工人阶级颠覆。别急！我给你捋一捋马克思是怎么推导的。

首先，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中实行自由竞争，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将日益白热化。强者愈强，而弱者将最终退出市场。久而久之，**资本家的数量会不断变少**，但是每个资本家掌握的资本会变多。也就是说，社会将进入「寡头经济」的阶段。(p.73)

然而，由于资本是过去的劳动力剩余价值之和，资本会不断增加，因此新的剩余价值与资本的比率会不断下降。这意味着**资本家的收益率会不断下降**。(p.74)

与此同时，资本家们**对工人的压榨与剥削只会与日俱增**，因为他们需要最大化从劳动力中获取的剩余价值。(p.73)

同时，工人阶级的数量更加庞大，而且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更加团结（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激烈的竞争）。最终，工人阶级将发动革命，**从资本家手上夺回对生产工具以及土地的所有权，取消财产私有制**。(p.74)



深得马克思精髓的宣传海报

## 7)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漏洞

如果你对马克思最后的结论感到一丝困惑，不要紧张，因为即使是马克思也不能说啥都对。对比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的发展历程，Peter Singer 提出了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忽视的一些问题。(p.74-75)

其一，马克思认为机器、原材料和其它资本的组成形式无法自身产生收益，而只是作为从劳动力中提取剩余价值的辅助工具。（其实我没太看懂这一点）

其二，过去的两百年间，工资水平并未下降，反而上升。

其三，资本家的收益率也并未下降，反而上升。

这样一种矛盾并不是不可解释的。应该说，马克思是「经验派」的思考者，他本身也并不是研究经济的学者。只是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使得他开始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察，试图探究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不可否认，基于个人观察而诞生的理论往往会缺乏全面性，但马克思为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维方式，并且非常犀利地揭露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底层机制。

但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19世纪的最原始阶段，也就是初级的资本主义。在那之后，资本家和政府都在

不断调整资本主义市场运行机制，使得很多马克思当时看到的问题都已经消失、或被大幅调和。而马克思当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无疑也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

---

简单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后，下面将总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他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感兴趣的朋友们请继续阅读。

声明：这篇文章是对于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 Peter Singer 的 Marx: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这本书的总结，力求简明全面。至于这本书对于马克思主要思想的理解是否准确、客观、全面，我没有考证（毕竟看不懂资本论，也看不懂德语 hh）。关于 Peter Singer 教授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评价是否正确，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并没有绝对的对错。

### 三、资本主义的负面社会影响

基于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自然对资本主义是很有意见的。我们先看他提出的一些小批评，作为对上一篇的复习，以及对下文的预热。

#### 1) 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压榨

在第一篇里我们说到，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特点，资本必须不断加大其对**剩余价值**的获取，也就是使其购买的劳动力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

而资本想要提高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主要包括「**劳动分工**」和「**科技进步**」两种途经。其中，「**劳动分工**」使得一个工人就能够完成原本多个人的工作量，同时又减少了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久而久之工资将下降到仅能维持工人基本生存的水平。(p.64)

与此同时，劳动分工也直接无视了每个人的特长和创造能力，使得劳动变成了简单且机械的活动。(p.64)

#### 2) 中小资本家的生存空间被挤压

同样地，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特点，大资本家将利用自己的资本形成优势，不断夺取市场份额，挤压中小资本家的生存空间。当这些中小资本家无法依靠自己的资本维持生计，他们也只能选择加入「**工人阶级**」，为大资本家服务。(p.64)



### 3) 社会经济危机的强度将越来越大

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初中历史课本上列出的「鸦片战争的原因」之一，就写着「资本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思路与我们不谋而合。

他认为，由于盈利的需要，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将不断扩大，而**市场的过度生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最开始，资本家们可以通过开辟新的市场、或进一步开发现有市场来消解过剩的商品。然而随着所有市场都被开发完毕，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将越来越强烈，且越来越频繁。(p.64)

When you trash the world economy



资本主义大佬们显然深谙此道

### 4) 人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损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一切事物都商品化了**。也就是说，因为一切事物都可以在市场上被交换，甚至包括劳动力，所以每一样东西都被附加了「**交换价值**」。

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将产生改变。人们看待生活中的



每一样事物，最先考虑的都是其「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而在彼此之间，人们追求的不再是人类心灵相通所带来的纯粹的快乐，而是**将他人视作增加自身利益的工具**。(p.35)

#### 四、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矛盾

为什么马克思笃信工人阶级必将反抗、「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到来？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一个难以调和的核心矛盾。只要资本主义不被颠覆，这个矛盾便不会消失，而**这一矛盾的存在，将不断累积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直至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

这一核心矛盾，叫做「人的异化」(human alienation)。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消失，或者说私有制的消失，是解除人的异化的**唯一途径**。

那么「人的异化」又是什么意思？

笼统地说，「异化」(alienation) 指个体与**原本应当与其一体的事物**互相分离。(sourc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的异化」特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与自身的劳动力和人性相分离，甚至成为对立面**。(source: Wikipedia)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工人阶级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而资本家的财富是工人劳动力剩余价值的累积。**资本，作为工人劳动力的产物，却最终统治了工人阶级**。因此工人阶级与自身的劳动力成为了对立面。(p.35,72)

其次，工人自身的劳动力在被「物化」后，以时间为单位贩卖给了资本家。这使得一部分原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成了必须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工人阶级不能控制自己的时间，因此他们与自身的活动也是互相异化的。(p.35)

此外，在流水线生产中，个体的差异性被抹杀，工人们无法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想象力去生产和创造，而想象力与创造力被认为是人类这一物种独有的能力。因此，他们也从人类群体中被异化出去了。(p.35)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和财产私有制的存在，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使得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陷入深刻的「人的异化」之中。而**人类对自由的内在追求，将使得越来越广大的工人阶级进行反抗，以脱离这种自我异化的状态。**



它又来了

## 五、马克思心中的「共产主义」

工人阶级反攻之后怎样？这个问题很简单：工人阶级反攻后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更难回答的问题是：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

很遗憾，马克思从来没有详细描绘过共产主义社会的样子。

是因为他想象不出来吗？还是他发现自己的理论并不完整？还是甚至他最终发现共产主义本身是不切实际的？

Peter Singer 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其说马克思不能够描绘共产主义社会，不如说他不愿意描绘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相信历史的进程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等到物质条件成熟之时，无产阶级革命自会爆发、并建立起新的社会体系。(p.79)

对于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仅仅是一个称呼，它指代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失衡并被颠覆之后的社会形态。至于它具体是怎样的，那将会是未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在他需要考虑的范围内。(p.79)

这与上一篇提到的「唯物史观」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活动最终决定社会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践行唯物史观不代表马克思认为自己是完全的旁观者。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作用是让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并意识

到资本主义对自己的剥削，以推动最终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p.79)

不要失望！尽管如此，马克思必然还是对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具备的要素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否则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拿什么自由发挥呢？）

## 1) 私有财产消失

财产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基石。正是通过私有化，资本家们能够将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因此，资本主义的颠覆必然要求财产私有制度的灭亡。(p.45)

## 2)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合二为一

马克思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离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当人们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中共同生产生活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体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共有、生产活动共事、生产成果共享，因此人们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也应当是重合的。(p.81)

## 3) 社会道德与人性将产生改变

马克思认为，贪婪、自私、与嫉妒不会永远存在于人性之中。因为生产力间接决定社会上层结构（见上一篇），随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合二为一，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将脱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利己主义」的风气。(p.82)

## 4) 国家政府不再被需要

建立在物质绝对丰富、人性产生改变的基础上，国家政府将不再被需要。(p.86,87)

马克思认为国家政府的职责有二，其一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对其它阶级进行剥削；其二是作为国家武器的持有者保证国家安全。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阶级体系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也将减弱。因此，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力量将不再被需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致力于统筹社会生产、促进个人自由发展的组织。(p.87)



这一点咱们显然不同意

## 六、马克思「共产主义」主张背后的关键假设

如果读到这里你开始觉得马克思在扯淡，不要惊慌 (因为我也...), 须知所有的观点都是建立在某些假设之上的，了解马克思并未说出的某些关键假设，我们才能理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理解为何其中一些结论是不甚合理的。

### 1) 资本主义最终将发展出一个物质绝对丰富的社会

马克思所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物质绝对丰富」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累积财富必须达到一定水平，以支撑接下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制度。

### 2) 人性会随着物质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人性的改变」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利己」的思想不再存在于人性之中，人们才能在公有制社会中继续投入生产、政治权力机构才能不再被需要。

马克思认为，「社会道德」不过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上层结构中的表现，**每个社会的道德准则都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且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也必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改变。(p.83)

同时，马克思说「**我们的欲望天生是社会性的**」，因此我们的欲望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p.63)

### 3) 自由只存在于「必要社会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里

「必要社会劳动时间」指一个人用于维持其生存所必须的劳动时间，而资本家又额外剥夺了工人阶级在「必要社会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p.71) 因此，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将驱动工人阶级从资本家手中夺回这部分时间。

#### 负一、结语

人性真的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吗？自私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可能统一吗？追求自由是人类的本能吗？如何定义自由？「异化」是一种必须被矫正的缺陷吗？人类的思想是由物质世界决定的吗？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吗？

「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个词，其实本该带给我们的，是对自己、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对真理的思考，而不是一个政治符号，或者一个划分敌我的标签。



## 分裂的胡锡进与主流意识形态困境

文 / 纪体

胡锡进先生是个名人，退休前，他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辑，在喉舌里面属于极高级别的。在网络上，他也不和一般的高级别官员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而是做出一副心直口快的样子，在社交平台上频繁发声，人送江湖外号“老胡”。不管是在国内的微博还是国外的推特，经常能看到老胡针对社会热点话题发表的评论。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的评论，有人讽刺他只说国外的问题，对国内问题却很少批评，观点随着官方的政策方向不停摇摆；有人批评他老是和稀泥，碰到什么问题都是这事虽然很坏但也有好处；有人却指责他是在体制内隐藏很深的双面人，貌似忠诚，但私下里却对西方普世价值无比推崇，总想对国内舆论做潜移默化的改造。但他也确实吸引了一批粉丝，他的粉丝们说他评论问题总是理性中立客观，不偏不倚，官方有问题也会指出，群众的极端思想也会批判，西方的民主制度产生社会混乱了他也不会藏着掖着。他们还说老胡作为身处高位的体制内官员，能够突破重重限制在社交网站上发声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大家要体谅老胡先生没法把问题说透的难处。

去年12月，胡锡进先生退休了，不再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他在网络上影响力这么大，退休自然也是相当引人关注。自由派幸灾乐祸，觉得主流终于连胡先生这样公开在网络上发表相对中立言论的人也容不下了。但看看胡先生的年龄，他多半还是正常退休。老胡把自己工作的这三十多年都献给了祖国的新闻事业，现在他退休了，起码可以给他的工作成果做一个阶段性的概括了。他的思想从何而来，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他的言论未来还会受人欢迎么？可以从他过去的经历开始看起。

### 一、胡锡进思想的变迁历程

胡锡进青年时期经历了文革失败和改革开放兴起，接受过西方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后来又目睹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转向国家主义，其思想是一个驳杂的体系，带有一定的内在冲突和张力。

老胡是1960年生人，根据他写的纪念父亲的文章来看，他出身并不差。他爷爷在民国时期是开药店的，家里面有100多亩的田产，在解放前家境相当不错。土改的时候他爷爷被认定为地主，因为没有什么恶迹没受太大冲击，但这个地主身份还是给老胡6年后的童年危机埋下了伏笔。老胡的父亲早年参军后来转业到北京的火箭科研系统当工厂的会计，在那个年代，工厂职工的地位不低，所以老胡刚出生那几年，相比于中国大部分家庭的孩子，物质条件相对优越。老胡在他纪念母亲的微博里说过，他小时总有肉吃，这一点估计很多70后80后在小时候都没法做到。

我小时候家里不算最穷的，但经济上也很拮据。母亲主家，她把家里的绝大部分钱都用来增加全家人的营养。我想要一件新衣服，要一个皮球，都很难。但是我们家总有肉吃，早上还经常买油饼。我小时候总生病，得过甲肝，肺炎，动不动就发烧。（胡锡进：清苦的日子里最需要一位慈爱坚强的母亲）

到了 1966 年，当时的胡锡进小朋友家里受到了文革的冲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1966 年，我们在北京工厂区的寻常百姓之家被抄。红卫兵把我们家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扔了出来，把我的奶奶一把推到地上，骂她地主婆，奶奶坐在地上哭。这一幕是我童年最恐怖、伤心的记忆之一。一直跟儿子过的奶奶被迫从北京回河南老家，孤苦一人，她最后几年是由我的姨和舅舅们照料。这是个时代的错误，父亲无力对抗它，就在心里自责、悔恨了后半生。（胡锡进：五一假期将结束之际 请允许老胡为亡父哭出声）

根据之前对文革的认知，我能猜测当时抄老胡家的红卫兵很可能是老红卫兵，并不是造反派红卫兵。因为当时老红卫兵才会把斗争矛头朝向地主，才会用抄地主家的方式进行活动。我猜测这一童年的经历，给他一直反对文革及和文革类似的剧烈政治运动、崇尚稳定和秩序的国家主义思想产生了萌芽。额外提一句，凡是不知道两种红卫兵区别的人对文革的认知都是不可能正确的，老胡的观点也是这样。

毛泽东是世界性新地缘政治的开创者，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关键性启动者。他有局限性，对民主、人权的理解跟今人有差距，走了文革的弯路等，他是动荡时代的领袖，他与动荡斗争，自己的行为也很激烈。（胡锡进微博，2013 年 4 月 1 日）

老胡从没有在体制内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有可能被重新评价的任何信息……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有一些为“文革”运动正名的声音，个人有自己的看法，那是权利，但要防止这种声音多了，形成其种声势，那会对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没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产生误导。（胡锡进微博，2021 年 5 月 18 日）

到了 1978 年改革开放，胡锡进成功考入了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在这个学校里他一方面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加深了对国家的感情；另一方面老胡接触了自由派的思想并沉迷其中，他看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的书籍，思想上被刻上了深深的烙印。老胡分裂的思想的两极——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在他脑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我当过 11 年兵，也看过一些国家破碎的过程，对“国家”含义的思考也许受到这些经历的影响。我相信，国家是保卫我们每一个公民利益的最外部的一道屏障，我们平时感觉不到这道屏障的存在，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和强大，一定是人民幸福的正环境，而非负分值。（胡锡进微博，2011 年 2 月 26 日）



1978年我考入军校学俄语，大学的后3年全用来读俄罗斯文学。那时人道主义的光芒还没照进中国。我一本一本地读托尔斯泰，契柯夫，充满人性光辉的那些俄罗斯原著，像一顿冰雹，把不到20岁的我砸蒙了。现在都忘了，只有一些残片留在记忆中。但它们是**圆明园里的石头那样的残片，至今支撑着我的精神世界。**（胡锡进微博，2011年2月28日）

1982年，老胡毕业了，被部队安排在基层工作，他不甘心一辈子都待在农村里，想着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于是他想到了考研，成功上岸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到了1989年，老胡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进入了《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工作，此时他对西方的制度依旧比较推崇。被单位派往苏联，目睹了苏联解体的惨状，这给老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在学校产生的对自由主义的狂热开始消退，国家主义思想重新夺取高地。到了1993年，他被派往南斯拉夫充当战地记者的时候，思想转变越发剧烈。他不满于国内读者对西方战地记者的过分崇拜以及对国内战地记者苦衷、无奈的误解，于是他在《波黑战地采访手记》写道：

*中国记者就像一些没有嫁出去的处女，听到的却是“母鸡也能下蛋”的诅咒，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女人，有时候真想胡乱找个男人，生出个私孩子。我就是这样赌气般的一次次往战区跑，妄想地在巴尔干的战区树起一面中国记者的旗帜……我相信，能在巴尔干战区的一条夜路上拥有孤独感和恐怖，是多少中国年轻新闻工作者的梦想！*

波黑战争的洗礼让胡锡进的对国家强盛和社会稳定的向往得到了强化。老胡作为外派记者，在国外见到的不仅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也见到了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侵略、分裂的悲哀，这也让老胡不得不反思自己从大学开始的对自由民主的呐喊是否完全正确。后续老胡经历南斯拉夫难民潮，在俄罗斯也看到自己在苏联上学时导师人生境遇的转变，他更加坚信国家统一、强大和稳定的必要性，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更加稳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式自由民主越发持批判态度。只是此时，他的言论中还带着那种有棱角的年轻理想主义者言谈中常见的激昂，现在的油子老胡是再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去萨拉热窝途中，还能偶见这样的战争遗迹。当时的波黑惨极了。我对国家稳定的相对保守主义观点，跟我的那段经历有关。*（胡锡进微博，2011年9月25日）

在2003年老胡又去了伊拉克战争前线当战地记者，在那时候老胡写的新闻稿中我们也能看到老胡对美国的失望。或许是因为老胡的这种思想转变，加上他有丰富的履历，他在2005年成功当上了《环球时报》的主编。

然而，老胡对美国的失望并没有使得他完全放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他的一部分和官方一致言论有出入的地方就来源于他这种自由主义思想的底色，而这种不一致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容忍和默许。比如在某次新闻发布会上，华春莹公开表示让西方记者向胡锡进学习什么是言论自由，胡锡进的种种“出格”言论俨然成了官方展现对异见人士包容的证明。

对自由主义的隐隐的向往在老胡的言论中总是无法避免地要冒头，比如在任××的问题上，老胡一直表现出某种期待和包容，甚至于他在任被判刑后，在言论中都能品味到一丝惋惜，觉得任××式自由派在庙堂不同派别“政治对抗”中的“不合格”，这是出于对自由派的某种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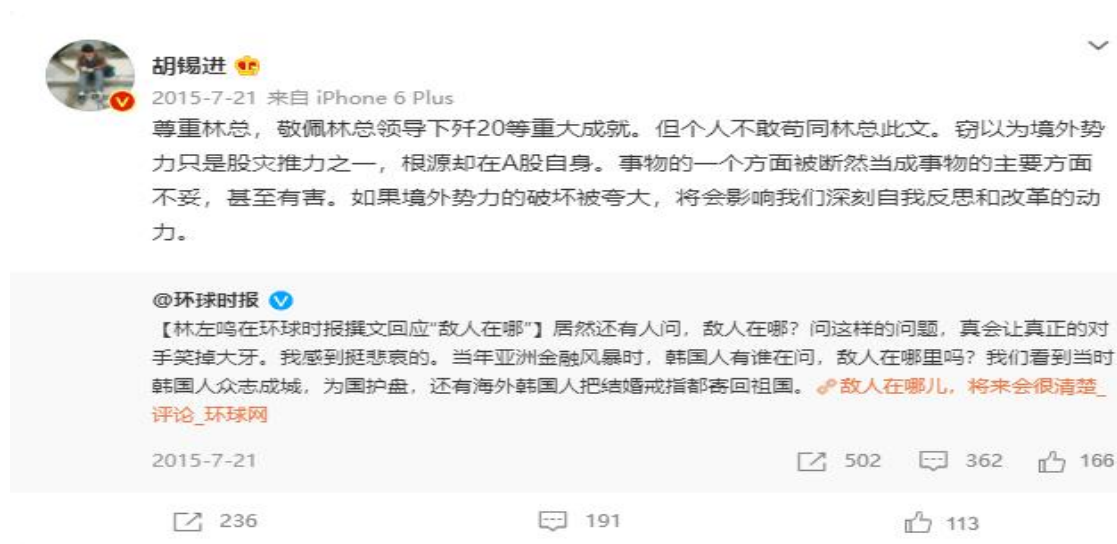
被人造谣发言，不如自己说几句。一是任××这一次说的很过分，坚决反对他的观点和态度。二是他长期这么说话，官方没碰他，我个人希望，支持这种包容的理由直到今天依然成立。第三，任迄今是互联网文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希望他成为贴底线飞行的最佳表演者，而不是续演大V撞线陨落的幼稚悲情戏。李大眼在的时候，潘潘活跃的时候，任大概算捧眼的“中V”。今天他“成长起来”，又是党员，希望他成为教自由派们既“很自由派”，又守他们应守规矩的“党代表”。（胡锡进微博，2016年2月28日）

我认为任××太自信了，甚至可以说傲慢了，既要在政治上出风头，又如此看重法律上高风险的经济利益，他对自己在公司超标准的收入同样不肯割舍。作为一名国企负责人，这样玩政治太“不合格”了，让人难以置信。（胡锡进：客观说，任××出事是注定的，他不出事才是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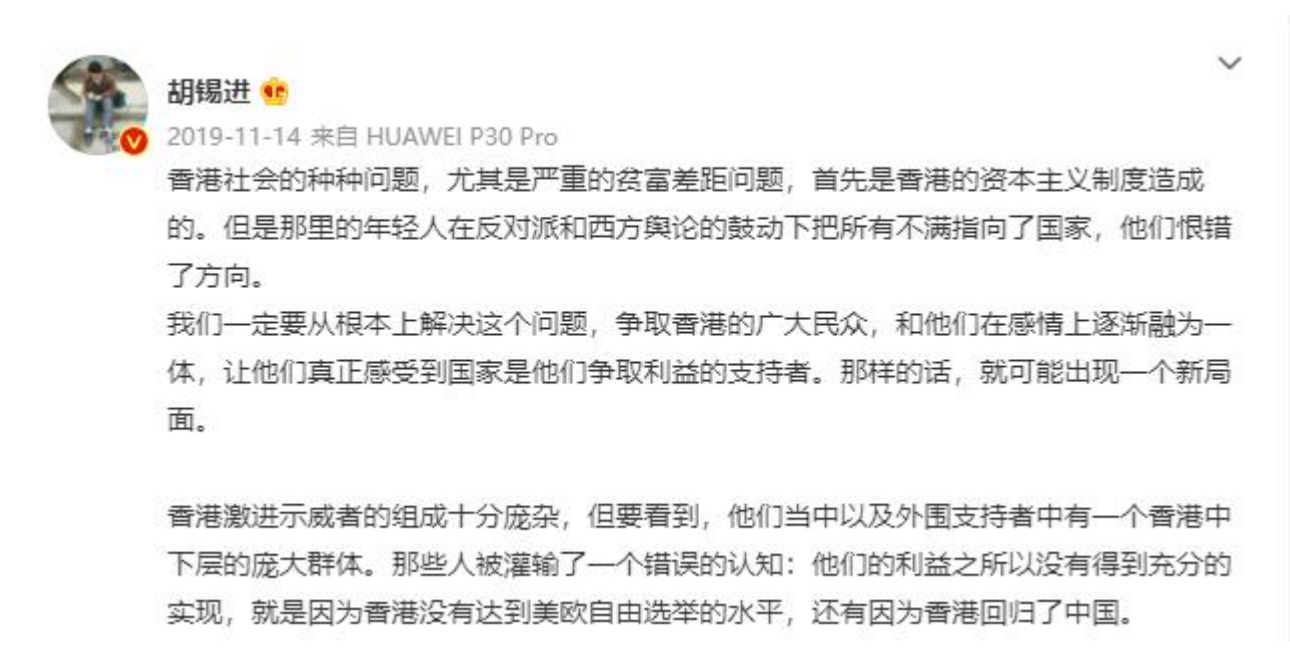
他甚至在言论中对爱国和爱政府做了区分，这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自由主义观点了。



自由主义的思想底色也让胡锡进在大量事件中不吝于指出国内的问题，这种从高层喉舌口中发出的不同于官方统一口径的声音颇为胡锡进博得了敢言的名声。在2015年A股股灾时，有人把股灾的原因归结为境外势力干预，要求国人为国护盘，可老胡指出境外势力只是外因，完全不吃阴谋论这一套。



老胡看到了某地的贫富差距的问题，而且老胡也指出贫富差距是社会矛盾的根源。



自由主义底色也让老胡在支持国家的同时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自发产生了一定的排斥，他希望国家强大，可他不希望采取任何极端的情绪化的言论和行动，国家主义不应凌驾于人道主义原则之上。这种排斥体现最明显的事件就是老胡和沈逸的争论。

与沈逸教授商榷。普通中国人当然没必要做“圣母婊”，但是官方机构的账号应当在这个时候高举人道主义大旗，表达对印度的同情，将中国社会牢牢置于道义的高地上。这不是“圣母婊”，这是任何中国官方机构应有态度和表现。（胡锡进微博，2021年5月1日）

在其他时间老胡也不掩饰他对民族主义的疏远，比如：

联早记者刘怡和新闻周刊万佳欢今天分别采访我，都问到**民族主义**的问题。我答：今天**民族主义**已是贬义词，有很强价值评价色彩。（胡锡进微博，2015年11月6日）

但是无论如何，老胡对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坚持不过是他思想的一翼，就他个人而言，对国家强大的民族主义向往和他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和谐共存，而他期待社会稳定的国家主义倾向更是尤有过之；就他所处的位置而言，体制也希望他能够尽量少说出格的话。老胡在很多问题上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本身的思想就是多种倾向的结合体，在“颜色革命”、“境外势力”问题上，老胡表达的总是显得很别扭，没有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那般的纯粹，反倒是显出一股特有的“中正平和”来。例如他对李文亮病逝的评论，他第一段否定了国家主义者的阴谋论，第二段展示了对国家的信心，第三段又想说颜色革命客观存在，思想的矛盾性体现地淋漓尽致。



胡锡进

2020-2-12 来自 HUAWEI P30 Pro

前几天老胡看到一个帖子，将李文亮病逝后发生的舆情说成是“颜色革命”，这种说法我认为很不好。那个帖子还围绕当前的情境强调，谣言“会让一个国家灭亡，一个民族灭种”。发帖人有一定影响，他这样写或许是出于一种善意和底线思维，但我想说，作者严重误读了局势。

老胡决不相信任何谣言能把今天的中国搞翻，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没那么脆弱，随便一个什么事就能形成“颜色革命”的威力。我不希望这样的帖子（以及类似的说法）夸大风险，制造不安和焦虑，造成针对真实问题注意力的偏移。

在当下的舆情中，肯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捣鬼，包括境外敌对势力，他们当然会把疫情看成破坏中国大陆稳定的时机。然而那些力量捣鬼，是常态，对他们永远要提防和揭露，但这不能代替我们对真实问题的反思和对公众真实情绪的关注。在一个舆情潮中分辨清楚主要方面和内因，以及其中的推波助澜和恶意催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老胡的这种分裂，老胡自己也有所表示。





胡锡进

2016-4-12 10:57 来自 iPhone 6 Plus

有人批我分裂，说我拧巴，我得承认，我就是内心挺矛盾的。我总是惊叹，有些人觉得中国只要把美国或英国的法律引进来，中国立马就美国英国了；还有人对文革崇尚的不得了，深信文革是伟大创举，这些人活的有多么单纯，理想主义，他们就像活在自我构筑的童话世界里。我是中国大工地上的一名普通建设者，身边脏乱差，但又看到城市一砖一瓦逐渐好起来的样子和轨迹。我有意见，但抱着希望，对城市和国家时爱时恨的。我觉得矛盾和复杂是中国超大社会最真实的面相。这个时代或许需要手拿鞭子、身上衣服永远刚熨过的道德和精神守望者们。没他们不行，但知识分子都他们那样恐怕也不行。

☆ 收藏

1524

1709

1326

从这段话里完全可以看出，胡锡进分裂的思想，“稳”字是高于一切的，从他个人的思想而言稳定是他高过所有其他追求的最终追求，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在老胡的心灵世界里面都没有稳定有用，只要继续稳定发展，其他所有追求都是能慢慢实现的，其他任何问题都是能慢慢解决的；从他在体制内所处的位置而言，稳定是体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高追求，对其他任何价值、思潮的追求都不能威胁到稳定。当稳定的问题不迫切的时候，老胡尚且有余裕从其他的角度去阐释自己分裂的观点，一旦有关方面需要高度一致的口径的时候，老胡就会乖乖收敛自己不一致的观点。老胡作为一个高层喉舌显然非常明白体制能接受的底线在哪里。

## 二、胡锡进言论背后的社会思潮

按照前文所述，胡锡进驳杂的思想里主要包含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三种社会思潮的内容，老胡视不同情况而分别或同时使用，形成了所谓胡锡进特色思想体系。社会思潮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被边缘化后，很难有一套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来解释和解决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各种思潮都只能做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革开放后的不同阶段流行一些不同的社会思潮，与当时的社会矛盾息息相关，老胡思想中吸纳的就是这些思潮。

###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思潮，它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文革的否定而产生的。文革被冠以封建独裁、破坏法制、践踏人权等帽子之后，知识界普遍强调思想启蒙，提倡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与民主法治精神，批判专制主义。自由派知识分子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率先呼唤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他们理想中的价值观。

这一时期的思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文革的彻底批判，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和激进色彩，推崇的是卢梭的“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激进观点。

书斋里的理想与现实毕竟是有差距的。“苏东”事件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自由派进行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休克疗法”，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功，苏东经济滑坡与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了知识界对激进自由主义理念的反思。而1992年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确定下来了，市场化改革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自由派知识分子担心走回头路的情况并未出现，南巡讲话中也强调主要是反“左”。自此，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体制的态度，从反对、疏离开始走向了认同。也就是说，他们被体制化了。经济上，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成为受益的群体。

因此，1990年代以后，哈耶克之类的比较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理论渐成主流，与早期理想化的“不自由，毋宁死”之类渐有天壤之别。

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的，经济上是私有制、市场经济、有限政府、科斯产权论等，政治上是政治多元、腐败有利、个人至上等，意识形态上鼓吹历史终结论、民族国家消亡论等。

可以看到，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论，很大部分是主流可以接受的或正在追求的，部分是“可做不可说的”，少部分是不可接受的。这也决定了，自由主义思潮无论在形式上是否受打压，它始终是官方理论工具箱的一部分，只是不用其名而已。胡锡进年轻时受自由主义影响颇深，但他依然能够被体制接纳作为高层喉舌，并公开发表自由主义的言论就是这一现状的体现。

##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思潮同样的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复兴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遭彻底否定后，民族主义以爱国主义之名，成了一面新的旗帜。“爱国统一战线”取代了“革命统一战线”，大谈“五讲四美三热爱”，爱祖国、爱家乡也成了文艺作品的主流。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主要作用是对阶级斗争思维的否定。

1990年代中后期，是民族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及其受众虔诚地以夷为师，却不料老师也欺负学生。“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申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事件，均激发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是民族主义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民族主义思潮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中迅速抬头。部分人由此开始反思改革之路，并重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入世之初，对全球化一度抱有美好期望，经济快速发展，对外交往频繁。然而，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贸易磨擦乃至逆全球化趋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发展壮大，民族国家、强大的政府在资本积累中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的有限政府、政治多元、民族国家消亡论，在此条件下，愈来愈显现其迂腐无用。民族主义渐成主流应用的工具箱之一。而经济下行中的各种矛盾显现，民族主义显然也是一柄有用的利器，用于转移矛盾，消解冲突。

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往往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的情感色彩，具有很强的煽动力。在群体性聚结的环境中。在民族主义的气氛中，会形成一种广

场效应的心理暗示，让不相识的人们突然产生同仇敌忾的、法不责众的行动倾向。这种后果是任何当政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胡锡进的思想中是有民族主义底色的，他一直把对国家强大的期盼挂在嘴边，但他的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都使得他没有办法接受民族主义的极端化情绪化部分，这一冲突是他思想矛盾性的主要根源。

## 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和民族主义接近的思潮，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民族主义以民族作为考虑对象，更为强调本民族的利益和地位，对于当前的国家和制度未必持全盘拥护的态度。而国家主义者是将国家作为考虑主体，认为国家和制度的稳定存续至上。

国家主义把国家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群体，主张国家的稳定与秩序优先于民主和自由，坚持国家利益至上，鼓吹个人必须服从、忠诚和服务于国家，甚至为了国家和国家利益应作出无条件的牺牲。当前中国的国家主义又是和权威主义紧密相连的，以至于有时候很难对它们作出明确的划分。

权威主义，并无统一的定义与名称。最初是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的一种补充，被学界称为新权威主义。按照萧功秦先生的看法，新权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在后发展国家中，只有通过开明家长式的威权政治与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地发展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导致社会的利益多元化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极大增长，只有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中产阶段的成熟，与阶层多元化相对应的妥协性、宽容、尊重契约性法治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新权威主义体制被认为是为未来民主铺平道路的过渡性政治手段。用开明权威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民主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保持转型的可控制性，

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最终目标上并没有根本分歧，而在于以什么方法与途径才能实现“民主”。理想的开明权威主义，是渐进地在试错中走出权威主义的权威主义。

萧功秦考察了中国的权威体制的结构特点，认为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极强国家”与“极弱社会”相结合的权威政治，一方面，它所特有的强大国家行政优势，作为一只创造“看不见的手”的“看得见的手”，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制约力度极低的“极强势政府型”的权威政治，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强势控制的做法由于引不起社会有效反弹与约束，于是会不断自我强化这一体制，结果将陷入一种路径依赖的恶性循环，很难实现理想中的过渡。

伴随着垄断资本，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壮大，除了政治传统和路径依赖的因素，又加上了新的政治经济因素。垄断，本身就意味着统治和集中的加强，列宁说，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过渡性的政治手段成为了最终的目的。

我们可以将这种无法完成过渡的新权威主义，称为国家主义。



除了“统治的趋向”外，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9年以后，相对陷入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的其它国家，中国的发展可谓一枝独秀，这为国家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相比于极端化激进化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主流更能接受的社会思潮发展方向。

胡锡进的国家主义思想萌芽于他青年时对文革的反思，这时候对国家和体制稳定的追求就已经扎根在他心中，在体制内多年的工作经历更是使他的国家主义倾向变得坚不可摧。在他接下来的日子里国家主义压倒了他其余诸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倾向，牢牢占据主导地位。他的言论大多以稳定为前提原因正在于此。

### 三、胡锡进思想的哲学基础

任何思想都有其哲学基础，胡锡进作为颇有影响力的大V，其思想从哲学角度来说，是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折中主义的方法论和表述方式，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杂糅在一起，以“中正”的国家主义思想作为骨干，包装成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后是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坚持原则被认为是死脑筋，实用主义主张真理不是观念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只要有报酬、有效用，能满足我的需要就是真理，即有用即真理。它的现实表现就是，把片面的、经过选择的实践作为检验政策是否恰当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否定了马列主义的真理观。比如说包产到户，从1981年到1984年粮食还是增产的，如果把这三年单独提出来它是对的，但1984年马上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那么它可能就不是一个长期的可以执行的政策。这就是一个我们对于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实践怎么提取、怎么分析，其实也需要综合辩证。列宁曾经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证明任何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你的观点即使再荒谬都可以找到例子，而且可能都是真实的，来证明你说的观点是对的，但是它未必是真理。

胡锡进的思想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实用主义世界观，即以自己片面的经历和阅历来判断是非对错，比如，在看待福建的欧金中事件时，他说：“我们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基层，很多人过得未必顺利，受过一些委屈。老胡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谁在生活中碰到过不断给我们带来灾难，政府和周围正义力量也拿他没办法，需要我们个人动手拿刀捅死的恶人呢？”实际上，作为正厅级干部的胡锡进，发声的渠道是比较多的，他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受到如欧金中那样的委屈，而在基层，类似欧金中这样因为征地、拆迁、分山林引起的不公，农民工拿不到工资一年白干的事情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这些事情当然很多不至于捅死恶人，甚至没有恶人，是腐败官僚使然，是房地产分包制度使然，这就需要追根究底，因果关系本来是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一对范畴，但很少看到胡锡进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总是说这是个例、局部的。真正科学理性的分析正是实用主义者所害怕的。

这种赤裸裸地为不公张目当然也需要包装，胡锡进为了使自己显得公平公正，还使用了折中主义的话术，即把矛盾双方并列起来或把各种根本不同的立场、观

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拼凑在一起的思想方法。折衷主义有以下表现：一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把两点论中间的重点论抽去，将矛盾双方平列起来，不分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结果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二是用调和论、混合论来代替唯物辩证法的结合论，把根本不相容的东西无原则地混合在一起。三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代替唯物辩证法。折中主义貌似公正、全面、公允，实际上倒向错误一边，把人民引到错误的路上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手抓和统筹兼顾事实上都是没有重点的两点论，不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和谐理论并不真是中立的，实际上还是为强势的一方张目，一厢情愿的“共赢”也是折中主义在国际关系上的一种表现。

胡锡进是折中主义的忠实信徒，貌似客观实则暗藏立场的做法确实普遍表现在他的文章当中。比如，为了吸引流量，每年毛泽东诞辰，老胡都要发表一些言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方面，胡锡进肯定毛泽东是一代伟人，民族英雄，但始终又认为其有历史局限性、错误等等，看似公允，实则否定了毛泽东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实用主义是胡锡进所持的根本世界观，以自己所看到或者所理解的大多数来代替真实的世界，折中主义是胡锡进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和表述方式，以看似全面实则骑墙的态度来看待争议问题。在这种唯心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胡锡进借助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争取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赢得了 2000 多万的粉丝。

胡锡进主管环球时报后，利用的就是民族主义情绪来扩大报纸的发行量，封面上采用十个字左右的粗体大标题，格外醒目，报纸大卖，成为 21 世纪之初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三份报纸之一。在自媒体上，民族主义表现为胡锡进在对外问题是一贯的歇斯底里，看看他关于外交的文章标题就可见一斑，“美国之音你讲点武德”、“英特尔很嚣张”、“中国统一大势不可挡，谁想挡就牺牲他们士兵的生命做屏障”、“中国应该增加核武器”等等。

胡锡进思想还有国家主义的成分，他有本书名字就叫《党领导的强大体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的几乎唯一特征。

同为国家主义者，胡锡进与张维为最大的不同是，胡锡进对民众意见的包容程度要大很多，对地方政府一些不作为乱作为也持有限的批评态度，这本身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需的，是胡锡进思想中自由主义部分的体现，自由主义的面相也是胡锡进最为矛盾的一面。胡锡进曾引用乌克兰独立广场运动参与者的一句话颇为动情地说：“自由贵于一切，包括孩子的自由”。这句话引起了微博网友的一片惊呼，“老胡被盗号了吗？”但实际上，胡锡进确实有自由主义的一面，对民众意见的包容，对宣传部门封杀一切不同意见的不满，甚至对翻墙的某种宽容，体现了老胡思想深处认为一个社会要想稳定，必须要靠引导，而不能靠封杀，而胡锡进也许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努力，会赢得官方的重视，会换来社会的长治久安。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杂糅也是胡锡进折衷主义哲学思想一方面的体现。

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迷惑性是非常强的，实用主义者常常用“这东西是被实践证明有用的，那么它就是对”，可是这种实践是全面的社会实践还是片面的社会实践呢？折衷主义者则总是表现地很不偏不倚，很理中客，也颇能拉拢一帮粉丝。老胡的思想就是这两种错误哲学思想的代表。

#### 四、“老胡说事”的未来

---

胡锡进现在虽然退休了，可他依旧在社交网络上笔耕不辍，每天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评论，言论风格和退休之前也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的言论的尴尬之处，在最近这段时间是越来越明显了，那就是想要和稀泥，但那边都不讨好。

自由派自然是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就算老胡从骨子里仍旧有对人道主义的向往，自由派也根本不会相信；左翼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在毛主席纪念日跳出来强调伟人也有局限性；连民族主义者也越来越不喜欢他了，因为他竟敢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竟敢还有那么一丝丝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情怀，他们现在更喜欢沈逸那样的冲锋手。

还有哪群人喜欢他呢？首先体制肯定喜欢他，老胡能够以高层喉舌身份自由在社交媒体发声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老胡因为自己的经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正因为这种和稀泥的思想倾向，他才被选中成为了主流发出自己声音的另类渠道。在体制之外，胡锡进的言论的拥趸是那些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党们。对他们来说民主很好、自由很好、平等很好、民族主义很好、人道主义很好，但现状最好，稳定最好，这些民主自由可以尝试尝试，但都不能过度，千万不能影响稳定。

可是现实矛盾的发展不以人意志为转移，浓眉大眼、八面玲珑的胡锡进们日益满足不了形势的需要。民间情绪一直朝着激进的方向在发展，主流需要一套更加激进的话语体系来消化这种情绪。其中被迎合最多的当然是激进民族主义思潮，这从沈逸、赵立坚等人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声机会可以看得出来；其次，民众对资本的不满，主流也以“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等话语进行回应，这种话语本身也适应了危机条件下的资本博弈需求；更为新奇的是，过去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李光满们也开始登上舞台，用一种以民间面貌出现的激进语言来包装其保守的内核。

只是不知道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仍旧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胡总编又要如何自处呢？

近日，上海、天津、深圳、泰州、南昌、荆州、黄冈等地有关部门相继发布清退令，禁止“超龄”农民工从事建筑施工作业。这引起了网上许多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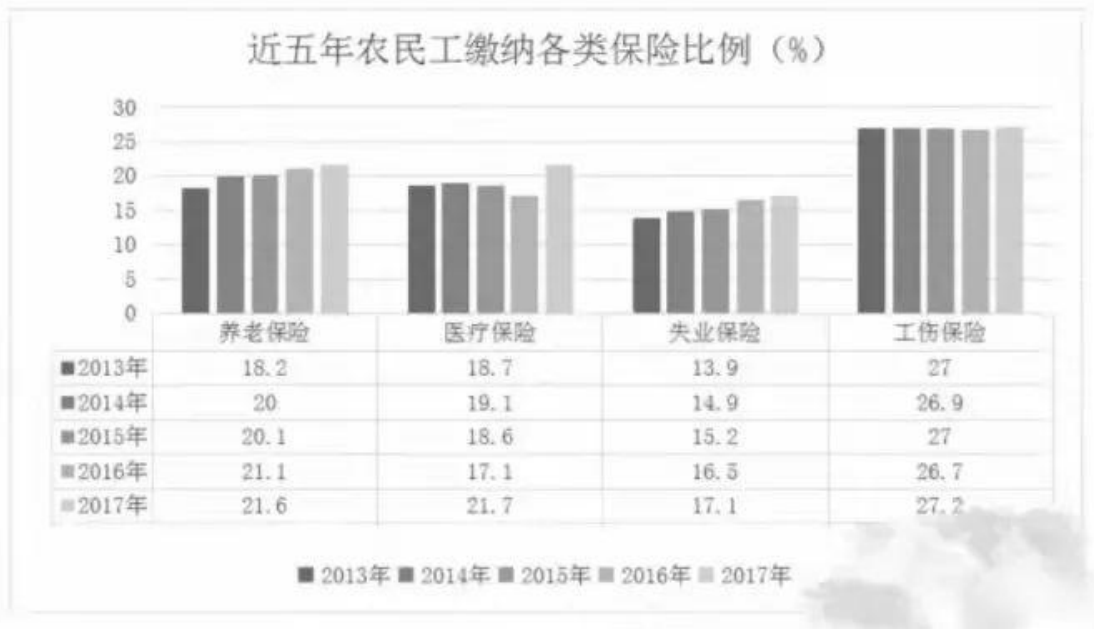


在此期间，一篇题为《请把劳动权还给老年农民工》的评论流传甚广。作者认为，清退令政策旨在减少工地事故，“初心是好的，是为了关爱老年农民工”，但由于不了解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疾苦，却可能起到反作用——“以爱之名让底层劳动者的处境更加艰难”，毕竟农民工回家务农的收入很低，一年养老金也只有1236元。另一方面，作者认为，“对于‘超龄’农民工而言，他们自由售卖自己劳动力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是最基本的自由”，政府无权干涉——这是就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来说的。从自由市场效率的角度来看，干涉也无益，因为“市场的力量足以维护‘超龄农民工’的利益”——到底是怎么维护的呢？这里却是说，因为我们有我们英明神武的雇主。他们不会傻到雇佣“难以胜任会引起生产事故的农民工”，“否则一旦出事，巨额赔偿也是他们很难承受的”。

政府好心办坏事，但是出于私利的市场行为可以实现多方共赢，这确实是非常理想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假设。但是如果说这种理论与现实情况是多么地契合，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且不论年年高发的建筑行业生产事故，每到年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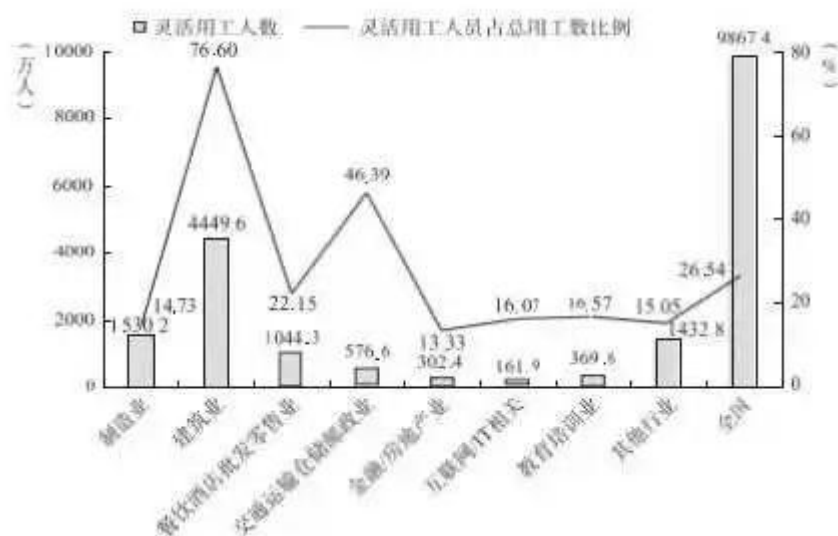
农民工集体讨薪的新闻都要登上头条，各级各地政府绞尽脑汁，想要解决这个顽疾，至今也没有根除，我们不是一年一度都要见证一下“市场的力量”是如何维护农民工利益的吗？鼓吹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但是完全不探讨建筑业农民工劳动保障缺失、事故频发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企业主体以及经济制度造成的，这无疑是在为雇主推脱责任。

实际上，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往往被城镇企业视为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也无须缴纳社会保障费用的廉价劳动力。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公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曾经披露 2016 年只有 35.1%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远低于 2009 年的 42.8%——自 2017 年起此报告就选择不再披露这项数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则发布数据称，到 2017 年底，只有约 22%的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27%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17%的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尽管比 2012 年底有所增长，但这仍然是相当低的水平。



根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的披露，2021 年建筑行业的灵活用工人员占总用工数比例达到 76.60%，在调查的各行业中比例最高，灵活用工人数为 4449.6 万。不难推想，这些灵活用工人员中大多仍是农民工。 来

源：《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



来源：《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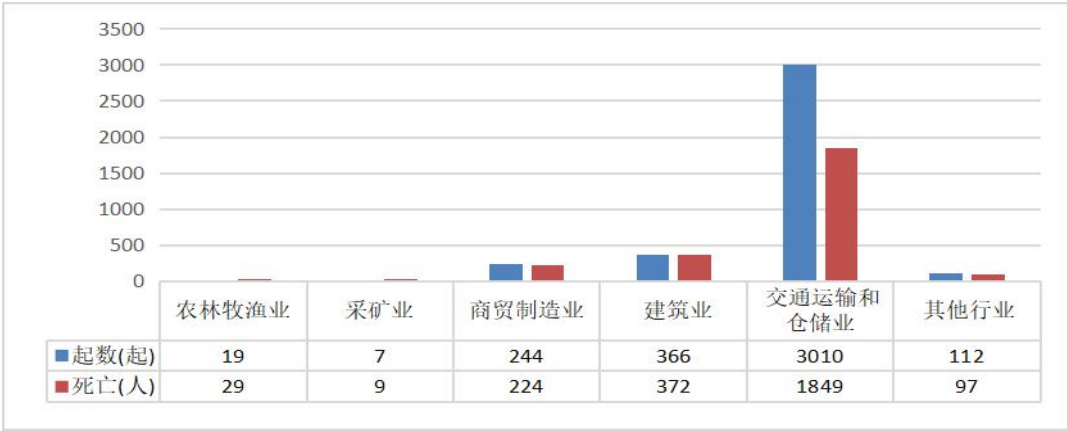
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以养老保险为例，考虑到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比例、年限和基数都很低，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以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实现养老保险的更高覆盖率。然而，两种养老保险的实际待遇却是天壤之别。根据《2020 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统计公报》，截至 2020 年底，共有 5.42 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其中实际领取养老金的有 1.61 亿人。该计划 2020 年支付的养老金总数达到 3355 亿元人民币，即人均 2088 元，相当于每人每月 174 元。相比之下，2020 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总支出为 51301 亿元，有 1.28 亿离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可领取约 3350 元。当我们大言不惭地谈及要把所谓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劳动权”还给老年农民工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辛苦一辈子的农民工为何无法做到老有所养？是谁没有为他们缴纳养老保险？他们为什么被排斥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之外？我们是否敢于批评和检讨城镇企业一直以来推卸责任的行为？我们是否敢于正视几十年来财富不断积累的农民工流入地对于农民工的残酷剥削？

让我们再以建筑行业的安全生产事故作为一个例证。尽管没有可以获得的全局性数据统计报告，但从我们找到的几个地区（主要是发布了清退令的几个区域）的局部报告来看，近年来建筑业生产事故仍然高发。湖北省、广东省和江西省安委会的通报均指出，本省 2021 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出现“双升”。湖北省 2021 年建筑施工事故 207 起死亡 218 人，与 2020 年比，增加 71 起 74 人，分别上升 52.21%和 51.39%。与 2019 年比，增加 40 起 30 人，分别上升 23.95%和 15.96%。广东省 2021 年建筑业事故 418 起死亡 410 人，与 2020 年相比，增加 52 起 38 人。江西省 2021 年建筑施工事故 120 起死亡 128 人，与 2020 年相比，增加 16 起 5 人。此外，尽管没有在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官网上找到公开数据，一份题为《市安委会动真碰硬落实四铁要求，坚决有效遏制事故》的文件仍然指出，“2021 年，全市建筑领域和地铁施工项目生产安全事故高发、多发、频发，尤其是地铁 4 号线登州南路‘10·12’较大坍塌事故存在谎报事故、非法出借资质、违法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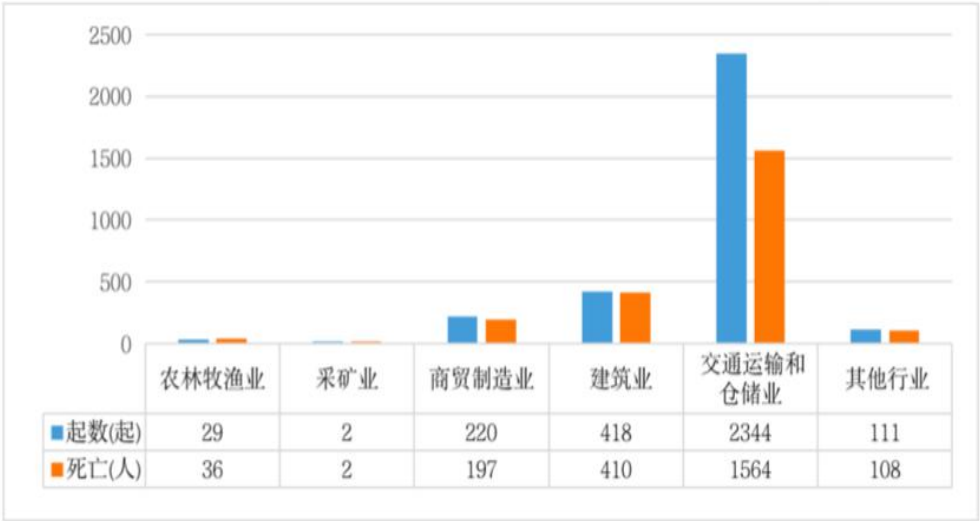


包等严重情节，教训深刻，影响恶劣。反映出我市建筑领域和地铁施工项目安全生产工作依然存在死角和盲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2020 年广东省各行业事故情况表



2021 年 1-12 月全省各行业事故情况表



可是，即便面临频发的生产事故，建筑工人仍然难以拿到工伤保险赔付。稍微了解一点建筑行业用工状况的人应该都清楚，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层层分包和转包、用工责任划分的含混不清、法律上对农民工劳动关系确认的模糊化处理（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劳动监察的薄弱以及法律维权如工伤保险申请程序的繁琐，都是造成建筑行业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没有劳动合同，无法认定劳动关系，建筑业农民工难以申请到工伤保险。而《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实质上的企业申报前置程序，导致农民工无法及时为自己维权。一旦企业在头一个月的申报期没有进行申报，工人很容易错过收集证据和申报的最佳时限。尽管从 2014 年底开始，各地人社部门结合建筑行业的用工特点，开始推广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制度，也就是说建筑施工企业以工程项目为单位，按总造价一定比例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但是仍然存在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考量导致的政策不连贯、建筑施工企业出于经营资质考虑选择瞒报

和私了、未做到工地动态实名管理导致未登记在册的农民工无法获得赔付等诸多问题。由此可见背后的利益勾连之深。

正如 2014 年一份建筑业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发布）指出的那样，“层层分包每进行一层都会带来更大的资金卷入，同时也将用工责任和安全责任的真实主体又遮蔽了一层，成为建筑资本实现增殖和规避责任的有效手段”。也应该指出，在过去二十年房地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支柱性产业并为地方政府带来主要财政收入的大背景下，是房地产资本与政治的勾连让建筑业农民工更容易陷入到饱受压榨、难以维权的境地之中。城乡对立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改开之后由官方主导所建立的跨区域流动劳动力市场，则为城市资本剥削农村劳动者提供了基础的制度保障。时至今日，建筑行业的基本用工状况仍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可是，最早从老家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老了。当他们年老力竭，变成官员眼中容易导致工地事故的祸端时，他们就不再被允许留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当中了。而与此同时，一向善于规避用工责任的建筑企业痛惜失去了廉价劳动力，因而他们叫嚷着要将被剥削的自由还给老年农民工。这就是资本家眼中所谓的“劳动权”。

可是，真正充分的“劳动权”，难道不包括留在家乡获得体面工作机会的权利吗？不包括来到大城市在建筑工地上获得劳动保障和保护的权利吗？不包括团结权、集体行动权和集体谈判权这三项即便是自由主义者也承认的“劳工三权”吗？不包括在工作地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权利吗？不包括在企业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吗？不包括在达到退休年龄以后不继续从事雇佣劳动的权利吗？如果农民工从来没有享有过充分的劳动权，又谈何还给呢？

回不去的农村，留不下的城市。可是，正是由于没有享受到充分的劳动权，老年农民工才处在这种两难的境地当中。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恰恰不应谈“还给”，而是要谈“拿来”。第一代农民工老了，但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仍然在为城市资本提供血液。维持阶级再生产的系统仍然在制造着阶级分化、城乡分立和区域发展差距。尽管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被接纳为新市民，但是他们面临着和父辈类似的问题：高工时，低工资，灵活用工关系泛滥，缺乏社会保障。第一代农民工所遭遇的问题正以另一种形式发生在他们身上。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并没有随着农民进城而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城市里一等公民的劳动权益也在发生着倒退——想一想仍在进行中的延迟退休政策吧，当我们提到要把“劳动权”还给老年人时，这何尝又不是在为延迟退休做辩护呢。而要改变这种对劳动者极为不利的局面，还需要劳动者自己伸手才行。

## 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

---

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是怎样的关系？愿意投身社会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又应该怎样建立自己与这个运动的关系？类似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统归到“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这个题目之下。不消说，对于这些问题，各国的革命志士都不仅用理论而且用实践回答过。从理论宣传方面谈论这个问题的急迫性，总是随着群众运动的起伏而变化，因为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群众运动最令人鼓舞的一种形式，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群众是迫切需要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在旧体制下通常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获得。

不过，我在此并不打算对已有的历史经验做系统的总结，因为旧体制的压力实在使我难以尽力去做这样的研究。我所着眼这个问题，只是因为近来实实在在地碰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感到群众运动的意识从低潮中开始复苏，另一方面则是我身边愿意或不愿意投身社会主义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呈现出了各种复杂的状态。亲身的经历不断在我心里做出这样的叩问，而我只能在这里提供一个至少能让现阶段的自己大致满意的思考。

### 一、知识分子

---

首先谈谈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印象是，知识分子可以说成是其社会职能主要是智力上的工作的那些人，作为脑体分工的脑力劳动这一极而存在。因此，文化程度的区分反倒只具有相对意义，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的社会发展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本来也会发生变化。在几乎遍地文盲的国家，能有现代意义上的“小学文化程度”就可能被视为知识分子。但是在更为发达的社会中，即使有大学文化水平，在真正走出学校参与社会生产之后，也可能只是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这时就可能不被视为知识分子（个人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比较明显）。总之，我们明确在这里主要想谈论的是以脑力劳动为主或将来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这个群体。从生产关系看，他们可能已经（或在进入社会生产后就）无产者化，即成为切实的雇佣劳动者；也可能作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的附庸（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而存在，有超越普通雇佣劳动者的一些特殊地位；当然也可能就是资产阶级，不过这一部分不是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讨论现实的知识分子问题时，葛兰西进一步为我们着重指出了两种重要形式的知识分子，即**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前者基于特定社会集团的需要而一并产生，例如“资本主义企业家同自身一起创造出工业技师、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和新法律体系的组织者等人员”[1]，后者对于新出现的社会集团而言则像是历史的遗留物，“代表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性”[2]。实际上，葛兰西的这一分类可以说是在历史横断面上的分析策略；而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所谓**传统知识分子**在某一历史时期也是一定社会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例如葛兰西提到

“教士阶层可以看作是属于与有土地的贵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范畴”。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兴起时，土地贵族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在诸如意识形态等领域掌握社会的需要，而这一需要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由教士阶层完成。在中国这边，士大夫阶层也起到了类似的效果，不同的也许在于，在刻板印象中，士大夫阶层起到的意识形态控制作用相对来说可能更为隐形，而其本身被直接和大量的同时吸纳到地主阶级及其统治机器中则是更显而易见的事情。

不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知识分子范畴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能够自治并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由于这些传统知识分子不是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如当今的资产阶级）的兴起而直接一并产生的，所以从起源上来讲似乎确实有一种相对独立性。然而，一个社会的主导生产关系会按照自己的样貌来重塑历史的遗留物在当前社会的关系，同样的对象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儒家思想中的尊卑等级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可以巩固农民群众对地主老爷的尊崇，而当它改头换面之后仍然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规训六七十年代韩国“汉江奇迹”中在蜂窝似的厂房里做苦力的工人。

传统知识分子也可以起这样的作用。当传统知识分子自身直接参与到新的社会集团对于社会的掌握时，其作用自不必说；而即使是传统知识分子某些时候明显表现出来的“相对独立性”，也不过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塑造了一种和平对话的可能，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教化和抚慰，甚至可以起到超越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定的改良作用。此外，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想象也可以引导被压迫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形成往靠近统治阶级的方向走，而不是形成被压迫阶级的自为的有机知识分子——阶级社会的教育总是发挥着这样的作用，而在一般情况下教育本来是由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统治阶级一侧的传统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自身的有机知识分子）把控的。

这样看起来要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似乎很悲观：资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自不必说，在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前大概很难脱离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而自觉地走向社会主义运动；传统知识分子的存续是通过对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妥协而实现的，在走向社会主义运动这一点上的难度不能说比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更低；而作为反抗力量的无产阶级，其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则受到种种限制。

事情当然不止如此。除却上述的消极因素外，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可以带来更强大的积极潮流。**群众运动，尤其是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会在工人运动内部产生自为的因素**，当然这种发展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自然是不平衡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运动也将大量的教育因素赋予工人阶级等劳动群众，前述的知识分子无产者化即是一例**。资产阶级兴起时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工程师一类在生产关系上仍然是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未凸显时，他们可以享受工人贵族的地位，但是矛盾运动所导致的经济下行也会让他们感受到生产关系上的直接压力。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学院里的传统知识分子们也会更多地感受到主导的社会集团带来的压力，无论是直接的“非升即走”式的生存压力，还是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压力。有时候，社会矛盾的激化可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连传统

知识分子渴求的相对独立性也不能保证，统治阶级的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越发得紧，逼得他们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决不折中的回答。

总之，社会矛盾的激化，会促进反抗和进步力量的增长，而以工人群众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这其中最有潜力最为彻底也最为坚决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而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是一种彻底而坚决的选择的明证。

##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

当然，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不能也不会只是在思想或感情层面，我们应当谈谈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的具体方式。这里绕不开的坎是“灌输论”，考茨基和列宁等人都描述过这样的内容。

简单地说，阶级社会内的**统治阶级是不希望被统治阶级有超过其阶级再生产基本需要太多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甚至是有意限制被统治阶级获取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如果说在古代这样的限制可以是赤裸裸的“驭民五术”，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劳动群众文化水平与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样的限制则变得更为隐形。潜在的教育意识形态的导向、直接和间接的名额限制等等都是适用的手段。总之，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无产阶级要作为一个阶级来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面临着不可忽视的困难。

无产阶级就其自身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言有社会主义的本能即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的需要，并且在其自身运动的发展中先进工人也会逐渐意识到只有作为阶级才能真正掌握生产资料和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但是，当没有作为人类历史结晶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时，这样的意识在理论上还不能形成明确的科学的体系。进而，科学理论体系的缺乏使得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往往只能达到工联主义或工团主义的地步，而没有向彻底摧毁资本主义体系更进一步。不过，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绝不会只涉及无产阶级，否则就不能称之为阶级的社会运动了；而在这样的运动中，起到提供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作用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本身受的仍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因而给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带去先进科学文化知识这一过程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知识分子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一种对于“灌输论”的常见反诘是，如果工人阶级自己不能掌握这些先进科学文化知识，那有什么理由说明其先进性呢？我要说，这里实际上混淆了不同的问题。**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根本上是由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造成的坚决的革命性决定的，而不是由是否直接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决定的。**知识的“先进性”并不直接造成社会历史发展中某个社会集团的先进性，作为科学家的拉瓦锡掌握着先进的科学知识，但作为包税人的拉瓦锡却“不幸”成为法国大革命所要扫除的旧制度的代表。自然，无产阶级实现真正的社会革命必然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但是，这样的科学理论决不是单凭知识分子的头脑就可以鼓捣出来的，关于社会发展与革命的科学理论只是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并且以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材料

才产生出来。或者说，这样的科学理论本身是工人运动的现实材料和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所作用的结果，而后者表现到具体的人身上则是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

没有必要把知识分子及其所代表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作为一种神圣化的对象去看待，但是同样地，也不应把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奉为神明。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也不应当只把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而选择做逍遥派，或者只是跟随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且不说知识分子中本来有很多实际上也处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只不过现时还能生活得比阶级兄弟要好一些；而社会革命总是社会的事情，是所有阶级和阶层的事情，决不是某些社会集团的单独作用就可以达成的。从现实的角度看，工人运动的增长引起知识分子与其结合是必然的事，无论是十九世纪的西欧、后来的俄国、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的韩国，学生等知识分子参与工人运动都俨然成为一个重要的阶段。其实简单想想，当谈到工人运动时就绝不仅仅是谈论一个阶级的事；脱离掉社会关系的思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怎么能绝对地设想革命只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呢？

工人运动的增长争取到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其来源可以从资产阶级方面来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无产阶级内部曾受资产阶级教育的那部分工人，但是共同的特点在于：他们不仅在阶级社会的教育中习得了人类所创造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而且从工人运动的发展中、从现实矛盾的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尤其通过这第二种教育从自在的个体转化为自为的战士。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在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潮流充当自为的波头，带领着阶级运动向前发展。

### 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

如前所述，在完全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以前，知识分子大多接受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其所持有的世界观价值观或多或少都仍然会带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或者我们经常谈论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为什么会说知识分子常常可能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呢？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给知识分子留下的正是这样一种地位：

首先，知识分子由于接受了更多的教育等因素而在文化水平和生活方式上可以显著地区别于一般的无产者，尤其是体力无产者。

其次，在资产阶级的体系中给知识分子留下了一定的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或者至少是工人贵族的空间，列宁曾说“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机构（指国家机器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3]，就知识分子来说情况也是一样。

最后，意识形态的灌输（作为资产阶级阶级斗争重要方面的灌输是全方位地存在的，不考虑这一点而空谈“独立”“自由”者往往只能沦为一定秩序的红脸或白脸的辩护士）本身加强着保持和增强上述地位的信念。无论是单从个人角度



谈的“奋斗”、“福报”、“励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还是从资产阶级国家角度谈的“奉献国家”，抑或是从学术角度谈的“去政治化的学术”，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这样的灌输，并且在秩序较为稳定的时期总是保持着不错的效力。在这样的灌输中，看似矛盾的观点是十分常见的，例如一方面是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呐喊，另一方面却又可能是学阀式的专断或者对官僚的阿谀。但无论怎样的矛盾，这样的观点总是基于资本主义关系的现实（如脑体分离）做出的，根本上仍然是维护这种关系的；而只要它们对于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有利，那么它们也总是“有用”的！就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并不在乎治下是君主制抑或民主共和制一样。

总之，知识分子就具有小资产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有上升希望而惧怕降落的特点，因此在行动和思维方式上常常也就呈现出类似的特点。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列举过的11种“自由主义”的表现就是极为现实的例子。不过，抽象地谈“自由主义”或“小资产阶级作风”近乎于扣帽子，因此我试着结合历史和现实就一些具体的方面做一点说明。

**首先是行事散漫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体系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往往是个人主义的意识，导致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散漫自由的风气，而不能自觉地遵从一定的组织纪律性。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员是否必须加入一个党组织的争论就十分具有代表性。马尔托夫等人认为不应该提出党员必须加入党组织的要求，而只需要党员能为党的工作提供帮助就行。

马尔托夫等人认为他们提出的原则便于吸纳更多的先进群众进入党，但列宁却指出，工人其实并不害怕什么严密的组织原则，而马尔托夫的组织原则反映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的散漫自由的风格（并且在实际上吸引的也是这一部分人员入党）。后来倾向于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仅在这一问题上也指出：“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并且得到通过的那一条党章条文为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分子混进我们党内开了门”[4]。

从组织原则和党的建设来说，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的意见当然是混淆了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因而会削弱党的力量。从历史来看，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参与社会主义运动，都需要足够的组织纪律性才可能有强大而持久的力量。一次有意义的宣传如是，一场成功的运动如是，而如果我们想做的是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事业，那就更加不可能不如是。

然后是不能正确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共产党人，尤其是在教育体系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在参与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时，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断改造自己世界观并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最重要的武器。但是，我常常见到错误使用这一武器的两种态度。

一是一团和气，不批评。大家身边在一起参与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同志，很有可能是同乡、知心好友、恋人等等，虽然有时看到一些问题，但是总觉得批评怕伤了和气，因此要么不说，要么只是简单提到，而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一个历史的例子是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这两位劳动解放社的干将。查苏利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充当了很多次和事佬的角色。其中有些事是值得称

道的，例如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之间起了一定的润滑作用，使得《火星报》得以办成；另外一些事则让人感到惋惜，例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的态度，倾向于孟什维克，调和同志之间的矛盾，却对这一矛盾的性质缺乏思考。普列汉诺夫在二大上关于组织原则支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但在会后由于孟什维克的进攻，他作为党主席由于希望“坚持党的无原则的统一”而不得不对其妥协，后来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则一步一步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

二是批评过火，也就是另一个极端：在批评他人的时候重点偏离于问题、矛盾、事情本身而着重于上纲上线的个人攻击。这样的批评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也不利于同志之间真正的团结。即使真的是个人作风上的一些问题，正确的态度也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之，批评的目的应该是认识问题的性质然后尽量解决问题。

此外，容易在两种极端之间摇摆这种情况确实需要预备参与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注意，尤其是青年学生。这样的例子是很容易想到的：

我刚认识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并且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之后，就很急切地想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些时候可以说是想做一些宣传，但是另一些时候在实质上却只能起到显示自己标新立异的作用，而这样的内容对于其他人而言可能起到反向宣传的作用。身边的同学出去玩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就义愤填膺地评论消费主义如此云云。又或者同学对我谈论社会现实问题漠不关心，我就斥责他没有责任心、没有什么样的意识。这样显然都是不合适的。至于在各种平台随意发一些言论而完全不考虑可能的效果和可能的危险性，也是容易犯的错误。另一方面，一旦这样的行为受到一些实质性的警告，例如辅导员、老师等人的关注乃至其他的一些威胁，我可能又立刻感受到这种危险性而不愿再冒任何风险。这时再看到身边有同学掀起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我就只敢远观、生怕引火上身而拒绝思考任何参与的可能性。又比如，一开始是教条主义，喜欢照本宣科的批判他人，后来遇到挫折又很快转向只依据个人经验的经验主义。总之就是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为什么会这样剧烈摇摆呢？因为这时候我们的活动还是出于完全的自发性，同时缺乏实践经验。因为缺乏实践经验，我们只能处于探索状态。而主要是因为仍然屈从于知识分子的自发性，我们还只是从直接的形式上做一下可能的工作，而没有主动地思考长期来看我们该怎么做，也不能有意识地吸取前人的经验（可以确定的是，有很多值得参考的）：于是面前工作的顺利没能让我们总结好的经验和不好的地方，从而能在推进工作时心中有数，反而让我们在“好的形势”下仍然只是盲目前进；而面前工作的不顺利则会直接击碎这种盲目，让自发的行动完全退回到起点去而不留下半点肯定或否定的痕迹。

这里最后必须谈的是立场如何真正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上面所谈的问题的实践的解决只能在这种立场的转变中推进。如今，当知识分子开始转向社会主义运动这一方向时，往往可能出于这样一些情况：（1）看到现实的苦难和社会问题，与追求抽象真理和正义的要求矛盾；（2）就业等方面的压力直接或间接地传导到身上；（3）诸多方面表达的自由被明显限制；（4）自己的其他一些切身利益受到损害。

直接因为这些情况而转向于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还不能说就是完全站到了无产阶级的或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例如，对于第一种情况，抽象的对真理和正义的要求在遇到现实的矛盾与苦难时是很容易退缩的。普列汉诺夫在正式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前最后一次回家探亲，告诉了母亲自己的决定，明确表示这样的决定是跟母亲从小给自己的追求真理和正义的要求密切相关的。但是他母亲却说：“可是这样下去你会死的！”[5]如果没有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没有超越个人利益而从阶级的角度去思考，这样的质疑是很难回应的。对于其他几种情况更是如此，更不要说对于这些情况的反应除了可能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以外，还可能为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非马克思主义的。

要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入无产阶级去开展工作是必要的。在五四运动时期，邓中夏等人曾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希望以宣讲的方式“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6]。但是，这样的实践最初仍然局限于知识分子的“教育救国”理想。

进一步的工作是到长辛店的工人中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关于这一经历的一些感悟，邓中夏曾写道：“我想起他们灾民在这严冬风寒雪冷，衣没有得穿，饭没有得食，屋没有得住，而那一班官吏政客资本家们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还拥着他们的第几姨太太正围着炉子取乐，比那班灾民露天席地的受冻饿而死，其苦乐真有天渊的分别，唉，那真是社会上最不公平的事。为什么他们穷到那个地步呢？他们的财产给谁抢了去呢，我们捐了几个钱就可以救得他们吗？我有一句话要奉劝各位热心救灾的先生们，请你们放远一点，放大一点眼光，去谋他们永远的灾荒困穷，那就是根本打破社会上不公平的事，请各位设法去做去罢。”[7]正因如此，劳动补习学校中的教育活动不再是一般的文化教育，不再是在肯定阶级社会秩序下的改良性教育，而是“劳动教育、阶级教育和团结教育”的综合[8]，是在工人中的阶级的教育、宣传和组织工作。

正是这种真正走到群众中开辟工作的经历能让知识分子真实地认识到（而不是仅仅通过书本和情感充沛的想象认识到）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状况，并且意识到：当知识分子只是站在劳动群众外边或上边捐几个钱或磨嘴皮子时，终究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这时候，一步实际行动，尤其是在丰富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行动，自然是要比一打纲领重要得多的。

不过，走入无产阶级中做任何工作，都必须时刻注意方式方法，而不能“工人做工人的、我们做我们的”，这样做的决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不如说是小市民情感的“神圣发作”[9]。这一点是全方位的，也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中的第一方面。例如，邓中夏谱名“隆渤”，字“仲灏”[10]，李立三原名“隆郅”，这些字对于当时的工人来说都不容易认出，有碍于融入工人群众，因此他们就分别改名为“中夏”和“立三”。我们应当学会无产阶级的语言，并且在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善于运用它们，而不是一开始就用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词汇把人绕晕、让人敬而远之。

此外，知识分子参与到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应该像无产阶级一样秉持着一定的组织纪律性，形成集体的力量有计划地推进与工人的结合。我们不能单打独斗，

这样只能造就转瞬即逝的政治明星，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不仅不能动员群众，反倒会损害社会主义在群众中的信誉。譬如对学生而言，趁着还未为雇佣劳动所累，可以积极团结身边的进步同学，形成一起学习实践的团体；推进学习理论的计划，推进到社会中实践、调研的计划；磨练与他人、尤其是与工人打交道的技巧，如有可能，较长时间地进入工人生活，乃至体验工人斗争的情形。通过这样一些东西，可以更确切地了解到目前的工人境况、工人意识和运动的发展程度，而不至于对运动产生不切实际的过高或过低的希望。

## 四、结语

---

1920 年时，邓中夏曾经组织了人力车夫的集会，向车行老板反抗，不过这一场集会由于警察的干预而失败；不仅如此，这之后工人还反过来要求邓中夏赔偿其中的损失[11]。面对这种情况，邓中夏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没有因为工人的“背叛”而恼怒，反而老老实实在自己身上把钱都拿给工人作为补偿。他也没有因为工人的“不争气”而就此放弃同工人的结合，反而是老实实在分析问题，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矛盾下人力车夫这一类工人还不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因此改变计划决定先到近代企业里做产业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总之，这正是知识分子在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时的正确态度。

其实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最初总是自己的利益受损或者能直接感到这种可能，然后才去思考社会问题，以及思考改造的可能性等等，只是由于在社会中的地位存在一定的差别，具体的诱因可能不同。无论是从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角度来说，都应当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要想真正成为一股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则必须最终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只有最终站到这个立场上，我们的勃勃生机才不至于被厚重现实的苦闷给直接窒息掉，我们才能理解到底为何“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才能真正超出“知识分子”的传统概念所加在我们身上的枷锁而真正融入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去！

# 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趣味者”

文/墨河乔杨

载/大石内藏助 3152626835

2020年，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走过了172年的光辉历程。2020年，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200周年诞辰，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坚决地肩负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建立了第二国际，并与各种反革命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但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伯-考反革命集团，在恩格斯逝世后渐渐掌握了第二国际的走向，并将其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巢穴！如果不是以列宁为首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坚决捍卫下，不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遭受多大的挫折！

而当今的世界，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互相紧密联系的影响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又混入了所谓未经彻底改造的，“共产趣味者”，即好在网络上一口乌拉，一口苏维埃，一口爱我苏联，时不时又键政，高呼“万岁”的共产趣味网民，这部分人，以青少年为主，以苏粉为主（在此不包括军事粉）。他们分不清苏联与苏修，分不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联系，分不清资产阶级文化，只是盲目粉苏，斗图，收集有关苏联的物品，不学理论，这样的共产趣味者，竟然也能大言不惭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的大旗可不是什么都可以裹挟的！（暂且不论日本的被称为政委的那位女士，很多共产趣味者因她而来。）

而更多的共产趣味者则只是对关于共产主义，关于苏联的一些口号与衍生品产生了兴趣，这也与大环境有关，这也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阵营的分化！瓦解！让共产主义只成为了空洞的口号，字符，从而使之庸俗化。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更不能松懈，要努力学习理论知识，从实际上真正做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口头上的共产主义者，做一个具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做一个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与政治观点，国际主义道德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的目的就是消灭私有制！过渡到人类自由的王国，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共产趣味者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认为有三点。

1.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队伍的分化；
2. 共产趣味者以学生群体为主，这一群体大多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精神层面上多为“小资”，生活上有一定“小资情调”，摇摆不定，且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洗礼；
3. 当今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激化，网络上类似“共产主义”的口号增多。

下面我就来逐条分析这三点。

## 1.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队伍的分化

首先我们要引用一段列宁同志在《国家与革命》中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

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伟大胜利，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列宁）

反过来说，一部分“共产趣味者”并不是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而是有目的，有行动地要“复读”共产主义的口号，使之庸俗化。这并不稀奇，早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正处于向帝国主义的过渡阶段，英国的工人阶级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分化，诞生出了一个依附于资本家，给资产者为虎作伥的群体，“工人贵族”。这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英国工人运动也因此遭受严重挫折。所以，这一部分的“共产趣味者”只能算少数。

**2. 共产趣味者以学生群体为主，这一群体大多为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且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洗礼。**

我们还是要先引用一段列宁同志的话：

“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遇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象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共产趣味者是以学生群体为主的，大多为“脱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立场并不坚定，在资产阶级学校中接受的教育又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

“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有全面教养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谎话，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们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着。自然，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永远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因此我们要否定旧学校，只从这种学校中吸取我们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教育所必需的东西。”（列宁）

可见，在资产阶级学校教育使学生群体的头脑充满了无用的、累赘的、死板的知识，这根本不可能造就全面发展的人，而当面对共产主义时，他们也只会“不求甚解”、不学理论、空喊口号。



### 3. 当今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激化，网络上类似“共产主义”的口号增多。

近年来，某些资本巨鳄公开在互联网上宣传“996”福报论等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的丑恶愈加暴露在人们面前，社会矛盾有一定的激化，互联网上的“左圈”，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而“左圈分子”，也就大多是那些“共产趣味小鬼”，不断的在网络上玩烂梗、喊口号。

“如果我们只求了解共产主义的口号，那就更危险了，我们若不及时认清这种危险，不用权力来消除这种危险，那么五十万至一百万男女青年这样学了共产主义之后，就会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就只会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到莫大的损害。”  
(列宁)

让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共产趣味网民参与革命运动，那可真是天方夜谭了。

“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日常的事。” (列宁)

### 革命运动想要开展下去，必须依靠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我认为，现阶段的共产主义者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学习，其次才是宣传鼓动。光有共产主义信仰是远远不足的，还要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储备，这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  
“如果根据这一点来看青年的任务，就应当说，一般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要学习。”

当然，我们不能只学习共产主义的著作理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汲取人类文明的所有有益成果，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要为我们所用，作为实践工作开展前的必要准备。

“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所有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

这时，有人要问了，那么我们在资产阶级教育系统中学到的东西是否要否定呢？我认为，旧的教育中也是有有益的学术知识的，要将其与糟粕分开，辩证对

待。“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列宁）

在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后，就要尝试宣传思想与接触工农大众。

“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列宁）

“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工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列宁）

所以，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能只沉浸在书斋中，而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在实践中锤炼自己的革命意志，提高自己的革命觉悟。而当面对共产趣味者时，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要发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先要自己反省有没有受其影响，还要致力于改造“共产趣味者”的世界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革命队伍。这样才能无愧于共产主义信仰，无愧于马恩列斯毛五大导师留给人们的丰富理论遗产。不要怕敌人的污蔑与诽谤，真理越辩越明。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斯大林）

# 四个概念——多维度的阶级划分与分析框架

文/愚者

载/大石内藏助 3152626835

在老马的年代，世界曾经还比较单纯。资产阶级就是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后者赤贫如洗，一无所有。货币尚且以国境为界、被黄金在物理意义上限制着流动效率，而各国劳动者都处在差不多的悲惨处境中。

但在今天，资本主义发展出了复杂程度和精巧程度都前所未有的各种剥削工具，而私有制的喉舌们也在一百多年间发明了许多迷惑人认识的新学说、新理论。

总而言之，世界有很大的变化，使得我们必须在深刻认识其复杂性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唯实唯细的方法论，来分析当前的世界。

今天要介绍的四个概念——实际上是四组概念——便是从上述基础中发展出来的工具。

这四个（组）概念是：

无产阶级（和与之相对的**资产阶级**）；

被剥削阶级（和与之相对的**剥削阶级**）；

劳动者阶级（和与之相对的**食利阶级**）；

中产阶级（和与之相对的**富人阶级、赤贫阶级**）。

每一组概念表征了一种阶级划分方法，背后也存在着对应的划分标准。本文将详细论述。

---

## 一、无产阶级 和 资产阶级

**划分标准：是否掌握生产资料。**

首先我们从最“古典”的这一组开始，也就是老马所提出的最经典的一种阶级划分。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人，要么属于资产阶级、要么属于无产阶级，而不可能两者都不属于或者两者兼有。因为其判断标准是绝对的：是否拥有生产资料。

但是在现代社会，我将这一划分标准小改为：是否掌握生产资料。此处“**掌握**”所指的不仅是形式上的所有权，而且是实质上的支配权。

这一修改是为了适应现代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发展变化而致。譬如一个人，在公开的证券市场里购买了某公司的股票，无论其份额多少，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和形式上，他便占有了该公司资产的一部分所有权。但是这种占有，对无产阶级来说显然不构成实质上的影响——难道一个老实拿工资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在为了养家而稍微积攒了一点积蓄之后，买了点银行推荐的基金理财产品，或者买了点股票，就能因此开除他的无产阶级身份了吗？他在形式上所“拥有”的这一小份资产，并不能在实质上使其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份子。

因此，我们以实质上的支配权，即**决定生产资料之使用范围、多寡、时间、**

周期等等的权力，作为判定资产阶级的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 150 年前，老马也从来没有将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划上严格等号。这就需要特别提一下小资产阶级的概念：自有生产资料，并靠自己的劳动、而非雇佣劳动剥削剩余价值，来获取生活资料、支撑自己的生活。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例子是街边摇爆米花机的老大爷：他拥有、且完全能够支配一份生产资料（也就是爆米花机），但他只靠自己的劳动赚取货币报酬，以此换取生活资料养活自己。他属于资产阶级，但不是剥削者。

比起“资产阶级=剥削者”的观念，各位读者更应该注意破除的，是“无产阶级=被剥削者”的观念。在现代社会，这种观念的反例已经越来越多见。

## 二、被剥削阶级 和 剥削阶级

**划分标准：剩余价值的净流入或净流出。**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什么是“剥削”：对他人劳动剩余价值的占有。

剥削这个词本身在中文里当然是负面感情色彩的，但是在老马对剥削进行论述时，其实完全是以中立的、科学的态度在进行定义和分析。我们也要把握到这一点，即**剥削现象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流动**。（由于篇幅原因，不在本文展开论述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的流动”这个观点很重要，我们接下来还会用到它去观察、理解许多现象。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根据剥削行为和剥削现象的本质，来定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劳动者们的剩余价值流向的对象，或者说吸纳各方劳动者剩余价值流入的人，便是剥削者；反之，劳动剩余价值所流出的源头，便是被剥削者。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在作为超复杂巨系统的私有制剥削体系中，存在一些前人没有强调的新现象：**无产阶级之间也存在（被动或主动的）剩余价值的流动**。

这里我们就拿网上最容易吵起来的一对例子来做解析：程序员和金融民工，以及农民。

有人认为程序员和金融民工（券商、投行等金融资本行业的普通从业者），尤其是一线互联网大厂、顶级券商的从业者，他们的高收入当然是建立在剥削了更底层劳动者的基础上的。也有人认为程序员和金融民工也是无产阶级，没有剥削其他劳动者。这样的争吵在网想法区已经发生了多次。

从第一组概念论述过的判断标准可以知道，程序员和金融民工，无论其货币收入有多高，都不对公司的资产具有实质的支配权，其收入都来自老板雇佣其劳动所支付的报酬，是非常标准的无产阶级。

但同时我们知道，程序员和金融行业的高工资，确实是来自这些行业占据了相对于实体经济（以制造业和农业为代表，也包含依托于实体的服务业）的更高产业链地位。可以观察到，上述下游行业的剩余价值整体性地流入上游的信息技术和金融业，从而在整体上也推高了后两者从业人员的总体待遇。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结论：**程序员/金融民工同时兼有身为被剥削者的一面和剥削者的一面——其身为被剥削者的一面是具体的、个别的，其身为剥削者的一面是抽象的、整体的。**

他们身为劳动者，雇佣他们劳动的是一个具体的公司、老板，占有他们劳动成果、剥夺他们劳动剩余价值的也是这一具体的对象，因此说他们“身为被剥削者的一面是具体的、个别的”；

他们所在的行业，总体地吸收了其他行业更多的剩余价值，但这显然不意味着某一个程序员个体、具体地剥削了某一个特定的农民或者工人，因此说他们“身为剥削者的一面是抽象的、整体的”。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把这一结论更加明确地做如下表述：

**程序员/金融民工所在行业总体吸纳着下游行业的劳动剩余价值流向，同时程序员/金融民工个体的劳动剩余价值流向本行业顶层的资本家。**

这样，我们就通过把握“剩余价值的流动”这一核心现象，认识了资-无划分和剥削-被剥削划分的交叉和区别，也无比清晰地解决了“程序员有没有剥削工人农民”的问题。

同时这一例子的辨析过程也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社会人个体身上同时存在着剩余价值的流入和流出，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通俗来说，就是当前社会的许多劳动者其实都同时具有剥削的和被剥削的侧面。

因此，我们以“剩余价值的净流入或净流出”作为在总体上判断一个人属于被剥削阶级或是属于剥削阶级的标准。也即是说，如果一个人（由于各种被动或主动的原因）吸纳着他人劳动剩余价值的流入，但同时（主动或被动地）向其他人贡献了更多的劳动剩余价值，那么我们在总体上认为他依然属于被剥削阶级。

（关于产业链上下游和行业间剥削，更多的研究可以参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有关著作。）

### 三、劳动者阶级 和 食利阶级

**划分标准：以劳动报酬或被动资产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

这一组概念相对是比较“古老”的了，现在已逐渐不多见。在建国前的一段时期曾经颇为常见。

在当时的语境里，“**食利者**”基本特指地主阶级，这显然是当时中国社会最突出、最普遍的社会矛盾的体现。这里“利”字不是指代“利益”、“利润”，而是指代“**利息**”——因为在私有制土地制度下，地主和基层暴力组织、高利贷基本是等同在一起的。佃田收租和放高利贷收抵押物是地主剥削劳动、扩张兼并的基本路径。从更广义的理解来说，这一“利息”就是指“钱生钱”的纯资产性收入，资产所增加的价值是完全由他人劳动填充的。

现代社会比较典型的新食利阶级是不事生产劳动、主要以房产收租为生计来源的房东群体。

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在马主义的语境下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因此“劳动者”应当是一切社会人的普遍身份。同时，现代社会完全“纯粹”的食利阶级也是极少的，哪怕像李嘉诚这样的大地主也还要进行相当程度的脑力劳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将“是否进行劳动”作为这一组概念的划分标准，否则划分就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考察一个特定对象的收入来源构成，如果其**主要组成部分**是劳动报酬，则划为劳动者阶级行列。此处的“主要”，可取统计多数意义的

60%为线，也可取其他适应具体研究目标的标准。如此既符合我们对一般意义上劳动者的概括和认识，也是一个比较方便核算的标准。

特别提出这一组概念，重要意义就在于“劳动者”在马主义语境中的特殊地位。马列主义的基本路径是：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实现一切无产阶级在经济权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利）上的平等，继而在扩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践和历史的辩证运动中消灭“专政”（即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集中体现）这一事物本身，实现一切劳动者在经济权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因而实现一切劳动者个体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所指向的是“异化劳动”的消灭，也就是每一位劳动者都可以自由选择实现自身价值的劳动方式和内容，而不再因“为了生计”、“为了阶级跨越/阶级再生产”的目的被迫投身于被他人支配的雇佣劳动之中——这也就等价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自由解放。

再考虑到马主义对劳动的定义——人类主观能动地通过多种工具（统称为劳动工具）对世界进行改造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普遍性，一切劳动者的解放事实上也就指向一切人类的解放。老马认为劳动是人类的本性，是人类的根本需求，因为劳动是人完成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注 1）。因此私有制社会中的食利者，或者说任何人可能具有的“食利的一面”（正如高收入无产阶级群体可能具有的“剥削者的一面”），其往往都反映着异化的人性，也即不把（一部分）人当人的意识。

（#注 1：这一命题的正确性此处不详细论述，可简单参考：我国和欧洲历史上，往往是不愁衣食、不事生产的地主或贵族阶级中，不断诞生出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这表明了人在生存安全、饮食等低层级需求特别满足、“无所事事”的状态下会自发通过劳动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

## 四、中产阶级、富人阶级 和 赤贫阶级

**划分标准：货币化的家庭所有资产、收入总量。**

这里首先要提出一点的是，“中产阶级”这个词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的含义变化相当大，例如老毛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所提的中产阶级就跟今天的中产阶级颇为不同。我们当下讨论的，仅以当前社会最主流的“中产阶级”诠释为准。

中产阶级总是和富裕、贫困的人口放在一起作比较，体现出它们是同一划分体系的产物。对中产阶级区间的划定有许多不同的具体标准，例如使用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定百分比比例（如 60%或 75%），或使用家庭资产统计的 quantile 区间，或是其他一些统计方法和标准。不同的调查和统计机构，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往往会各自提出不同的中产阶级划分标准。网上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对中产阶级的划定标准是年收入 5 万至 50 万元人民币之间（#注 2）。

（#注 2：国家统计局曾表示过中产阶级统计数据确实存在，但是并未公开。故具体标准目前还是不透明的。）

但无论是哪一家具体划分，其标准基础都是统一的——那就是核算为货币的家庭所有资产或收入。所谓货币核算，大多数情况下是换算为研究目标经济体所发行的法币，一些情况下也会换算成汇率计算的或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产阶级”倒是一个十分纯粹的概念。无论你收入来源为何，无论你的工作多么单调可替代、或者多么独特且富于创造，无论你配置了、经手了多少精巧的金融投资工具，只要最终呈现在账面上的收入和资产总值达到了某一阈值，你就可以被毫无疑问地划入或开除中产阶级之列。

只不过从实践上来看，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大规模重合的，收入水平能跨入中产门槛、却不掌握任何一丁点生产资料的人是极少数。但相对于剥削阶级，则不好说。“英雄不问出处”的划分标准使得中产阶级和其他几组阶级划分的交叉关系高度复杂，也就使“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内部呈现高度复杂性。再加上多数知友习惯性身边统计学、凭感性经验张口一说，所以谈到中产阶级基本都是一锅乱炖。

因此在明晰了四个概念的框架后，应该清楚，中产阶级是且仅仅是一个根据收入和资产划分出来的群体，并不揭示任何进一步的复杂性，因此必须和其他概念结合起来分析。

## 五、略谈“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这个词在如今其实也已经极少单独拿出来说了。虽然这个概念依然写在我们宪法的第一条，但如今官方最喜欢的表述显然是泛化的“人民”，而学术界在阶级理论方面也更注重资-无划分。

其原因也是显然的：“工人”身份属性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在老马的时代（或者我们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时代），工人是站在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潮头浪尖的一群人，是城市平民阶层里最早大规模接受教育、吸纳科学技术认识、服从统一纪律性训练的人群，是有知识、有组织力、有行动力的新生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分地域、不分民族、甚至不分年龄地受到原初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他们的生存境况趋于一致，因此利益诉求趋于一致。这使得这股新生力量无可置疑地成为一个具有改天换地能量的新生阶级。

但是在今天，随着技术和工业的极大发展（使得行业细分程度极大扩张，更带来和传统工业离经叛道的信息技术产业），以及教育的普及化（使具有基本识、读、写能力的人口极大扩张），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在不断下降。又或者，我们可以说工人阶级的普遍性在极大扩张，因为今天几乎所有“识字、给人打工”的人都可以算是过去标准中的“工人阶级”。**这种普遍性的扩张和特殊性的消弭事实上就消灭了“工人阶级”的边界——当几乎一切劳动者都可以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时，也就等同于说工人阶级不存在了。**

因此在当下，我倾向于把“工人”视作一个纯粹的行业、职业划分的概念，而不再是一个阶级性的概念。

事实上在学术界，如今提到“工人”群体时，也基本都是指向制造业工人或建筑工人这些相当传统的工业行业人群。没有人会用“工人”指称程序员，也没有人会去论证程序员是不是属于工人（虽然从实质来看程序员确实就是一种技术工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即使论证清楚了“程序员属于工人”，然后又怎样呢？如今，“xxx（职业）属于工人”这样的命题已经无法带来对这一行业更深刻的认识。

因此，了解我的人也应该可以注意到，我几乎不再使用“工人阶级”这个名

词，除了少数需要在历史的语境里讨论这一概念的情况。这是本文不把“工人阶级”列入四个概念之一的根本原因。

---

## 六、四个概念的分析法和实践意义

本质上来看，我们提出了四个概念，是提出了一种分析模型框架。其内涵是“四种最基本的阶级划分模型”。

不同的划分标准之间，产生的子集，将产生交叉关系。就像是对正整数，以“是否能被 2 整除”为标准划分出的【奇数】和【偶数】两个集合，与“是否仅能被 1 和它自身整除”为标准划分出的【质数】和【合数】两个集合，彼此之间形成了交叉。有的数同时是偶数和质数(2)，有的数同时是偶数和合数(4,6,8……)，有的数同时是奇数和质数(3,5,7……)，有的数同时是奇数和合数(9,15,21……)。当然，在讨论了所有交叉情形之后，自然就会发现还有需要单独讨论的例外(1)。

**四个概念的首要意义，便是通过四个划分标准的交叉模型，揭示社会人在客观经济属性和主观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性，并提供拆解分析这一复杂性的工具。**

曾经的世界非常简单，无产者一定是被剥削的，食利者一定是剥削的，而无产者也不可能积累下足以被称为“财产”的东西；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无产者一定支持公有制、支持共产主义，有产者一定支持私有制、反对革命。其中只有可能出现个别的例外，也就是“有背叛阶级的个人”，而不可能出现群体性的背离，因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

或许世界一贯是复杂的，只不过今天的世界，尤其在资本主义全球等级制剥削体系方面，显然比 100 年前要复杂许多。如今一个不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却有可能成为占有他人劳动剩余价值的角色，甚至享受着丰厚的收入；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却有可能手上没多少现金。

存在决定意识。纷繁复杂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劳动者们意识形态的隔阂与混乱。行业之间出现了收入壁垒，在社会意识方面就反映为鄙视链；地域之间出现了不均衡，在社会意识方面就反映为排外与隔阂；乃至民族之间、性别之间、种族之间、政权之间，现代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制造的各种不均衡，在劳动者之中划出深深的鸿沟，使得人们不再那么容易团结在“无产者”或者“劳动者”这么一杆大旗之下。

但，仅仅知道“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复杂的”毫无意义（我常常认为，许多存在性命题不带来任何深刻的见解），我们需要知道从哪些角度去拆解、理解这样的复杂。四个概念就是这样的工具模型。

因此现在我们知道，**审视一个具体的社会人个体或群体，不仅要看其有产还是无产，还要注意其所处行业、所任职务具体的剩余价值流动趋向，以此观察其意识形态中是否有“西风压倒东风”的一面；要注意其对劳动的本质认识，以此观察其对劳动本身和占有劳动、被动增殖的价值判断；要注意其具体收入水平，以此观察其对资本主义等级制的总体认识和态度。**

我个人所运用、所提倡的方法，正如上段所述，依然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资/无)划分为基准，因为所有权社会化即所有制(公有制/私有制)，也正是思想

意识形态方面最根本的对立。在客观上的资/无所属和主观上认为自己的资/无所属往往决定着一个人对革命、对平等、对资本运动规律和社会主义路线的根本认识。

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其他三个（组）概念划分之下，个人思想认识上可能具有的复杂性。这样就能综合性地、高效地开展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基于此目的，有了四个概念的框架工具，也就可以总结出以下**总体路线和基本原则**：

1、揭示、纠正对等级制认识不足或认识错误的一面，发扬、坚定对等级制批判和否定的一面，树立“一切劳动者人人平等”的基本认识（“人籍是个好东西，我希望所有人都有”）；

2、阐明其经济处境中剥削的和被剥削的各自侧面，通过人人平等的基本认识，建立对剥削非正义性的认同；

3、帮助疏导其面对自身剥削的一面（如有）时可能产生的负面情绪，如抵触、悲伤、自怨、恐惧等，亦帮助疏导其面对自身被剥削的一面（如有）时可能产生的负面情绪，如愤怒、冲动、自弃、消沉等；

4、深化理论阐述，建立“劳动者人人平等”必然要求全人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客观规律认识，从而进一步理解从无产阶级公有制（对资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全人类公有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5、至此，从多重复杂社会身份和经济处境对“无产阶级”共同立场的否定，达到否定之否定。

我在《共产主义入关学总纲》中曾提出：

全球国家间等级制剥削体系的维护主体是美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该主体的附庸（维护等级制的主要力量）包括……享受美帝国红利的美国中产及以上阶级人民。应当消灭其主体，分化其附庸，并最终在政治上（而非物理上）消灭其附庸，进而瓦解等级制体系。

如何在政治上消灭其附庸，方法正是以上五点。一切都是以客观规律、科学认识为基础，因此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不同位置、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都能找到实践的对象和方法。远到另一个民族，近到自己的身边人。我可以实践，你也可以实践。

乐于挥舞老马“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句话作旗号、努力想要否定追求科学严密的理论论述价值的人们，似乎总是忘记，他们所引用的这句话后边还写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

## 附言：一些补充说明

“四个概念”体系最早在我学习系统论期间由我的老师提出，其原始版本为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剥削阶级、工人阶级”，其提出时目的尚且不是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而仅仅是通过阐述几个概念之间的区分和交叉，帮助我们建立对今日之阶级复杂性的基本认识。我后来在历次讲解和教学中逐步调整、深化、扩充为本文的四个概念体系。

今日由于近一年多来网上屡屡泛起有关争吵，故我决定秉持本学派知识公有制的精神，写成此文分享，破除有关问题牛头不对马嘴的争论和迷思，但不敢因此自居“四个概念”的原始提出者。特此声明。

当前的“四个概念”实际已经是四组九个概念，但依然使用了“四个概念”的总称，一是向我最初学到这一思维的老师致敬，二是为了保留一点中式语言的精炼含蓄。（曾仕强语：中国人说“天”就包含了地，说“剑”就包含了刀，不需要总是把每个字讲全的。）

# 资本家拥有大量财产后，为什么还要剥削无产阶级？

文/李劫

载/大石内藏助 3152626835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资本家的快乐不在于拥有大量资产，而在于让老百姓穷，和老百姓有巨大差异。

为什么呢？因为资产无线增殖是无意义的。可能作为一个小资本家、城镇小工厂主，他们的目标是资本增殖，因为他们还没有到一定的临界点。但当他们成为巨富，有一万亿和有一千亿的时候，基本生活是差不多的，该买的汽车别墅游艇其实都一样，都有私人飞机，但更有钱的也不可能买个高达，变个迪迦出行吧。再多钱有什么意义么，资本家肺再好，一天能抽多少雪茄？资本家精神再好，一天能开多少 party？资本家作为人的物种的本质，并不会因为其占有资本多少而改变。

如果看见一个小资本家，他最爱谈的一定是如何做大做强和快速发财，因为他们是在增殖阶段；但是大资本家一定会说“我对钱不感兴趣，我哪怕只拿一块钱工资都无所谓。”很多人以为他们在骗人，实际上他们说的是实话，当你有钱到了一定程度，你想想的就是如何挣脱这一方天地的束缚、如何掌握众生的命运了。

因为纵然你亿万身家，世界上依然有种力量能让你的高楼大厦顷刻崩塌，所以他们会不断希望成为那样主宰的力量。因为只有当他们成为主宰，他们才能更加地为所欲为地剥削，才能毫不顾忌的吸血，才能把他们和老百姓的差距拉到天壤之别。就像《让子弹飞》中，师爷这样的小资本家从来只求跪着把钱挣了就好，黄四郎这样的大资本家要的是主宰，要的是其他人当他的狗。

资产到了一定程度就没差别了。但是让老百姓穷可以让资本家的生活提升很多，为啥，如果老百姓都人人基本生活挺好了，他们的仆人从哪里来？他们的小三从哪里来？他们的保镖和司机从哪里来？大家都有钱了，比如人均实现千万富翁，在目前物价状态下的千万，谁的儿子去给凶巴巴的资本家做苦工？谁的女儿会去让油腻的地中海资本家睡？谁的老婆会去给资本家做菜？甚至估计那样他们号召 996 谈狼性文化都没人要理睬他们了，工作就图一乐，你资本家吼我我大不了就辞职了，那么他们就无法享受欺压人的快乐了。

最快乐的事情是去讲座、去出书、去接受采访，去教育大众，去指着员工的鼻子说“当年我带几个人租个地下室白手起家”“你们如果和我一样每天只睡 4 小时，每周 007，才能有我的今天”。资本家又不是葛朗台，赚钱是为了每天打开金库数钱，资本主义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叫《百万英镑》，当你能证明你很有钱时，你就算不付一分钱也能做资本家，甚至你到底有没有钱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曾经通过财富获得的地位和权力。这就是欠几亿的思聪欠几十亿的贾先生欠百亿的许先生债台高筑依然是资本家风云人物的原因。

记住，穷人对于资本家是人生游戏体验的一部分，如果不欺负穷人，就像你游戏一开场 999 级号，结果一进服务器其他人都是 990 级，虽然都不如你，但你的快乐已经没啥了，相反，即便你是 99 级号，只要你游戏时到处是 1 级号，他们照样虐的很开心，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和欺压的快乐。评论说就像网游，的确如此，大资本家是高氪金玩家，小资本家是低氪金玩家，普罗百姓可能就是参与游戏的普通玩家，普罗百姓个别追寻的是自己逆袭之路，小资本像很多高赞答案说的那样追求资产不断增值，因为他们上面还有高氪金玩家，他们也想看看达到游戏巅峰是什么景色。而高氪金玩家玩的已经不是游戏打怪升级的快感了，而是作为游戏里神的快感，一言定人生死，游走游戏戒律的边界，甚至和游戏 GM 称兄道弟狼狈为奸。他们唯一的恐惧，来自游戏公司说不准何时的停服与调整，所以他们呐喊着，希望游戏公司放弃监管。

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他们应该更喜欢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而非资本主义，这又不同了，封建社会只有一个老大皇帝，其他人分分钟皇帝看你不爽就灭了，承让资本家都想有皇帝的感觉，但他们也明白真回到封建可能他们就成了和珅、魏忠贤这样资产再多却没命花的。至于奴隶社会风险就更大了，风险来自人民，现在你发工资让老百姓 996，他们最多背后骂骂你，如果你按奴隶社会那样随意处死他们还不给工钱，那就是逼他们武装反抗了。所以他们最理想的社会是统治者不能单一独裁，老百姓又能吃上饭有点奔头不至于玩命的社会。



# 既然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过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美国也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吗？

文/高林  
载/大石内藏助 3152626835

首先谁说过资本主义必然过度为社会主义？马克思说的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但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的理论里是摧毁私有制的革命，社会革命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相反社会革命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国家了，因为私有制消失了、阶级消失了，还要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干什么呢？所以马克思说的是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马克思可没说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必然存在一个过渡阶段、一个千年帝国。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为一种“信仰”之后就不可避免的和一切“信仰”一样，出现一个“不待你们走遍以色列的每一个村庄人子就要到来”和“千年帝国”之间的矛盾。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对革命的理解本来就因人而异。

对一部分人来说革命就是打打杀杀、步枪大炮，实在不行像艾米尔-亨利一样拿饭盒装上点火药再放点钉子都可以干一票。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革命社会进步潮流的体现。蒸汽机车取代马在铁轨上奔驰、本茨的老婆开他的三蹦子回了一趟娘家然后就把遍布欧洲各大城市的马车赶进了博物馆和特色旅游。

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呢？因为革命的迫切程度不同。有些人认为人类应该解放、有些人认为人类应该解放首先体现为他自己应该过得好！还有人认为人类解放不解放无所谓重要的是自己得过得好！

这三种人哪个更接近马克思呢？那就取决于你怎么理解马克思和巴枯宁的论战了。如果你觉得步枪大炮就是根本性变革的体现，甚至于人类社会可以被步枪大炮推动，物质的、社会的、经济的条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有机会干一票！只要你喊出“机不可失！”那你是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就不用我说了。

因为社会革命不需要“机会”，社会革命依靠的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和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而不是“今天我们有五十个喝多了烈酒的弟兄！”

# 阶级斗争下可以发展经济吗？

文/陈秀夫

载/大石内藏助 3152626835

首先要理解阶级斗争的含义，阶级斗争指的是——在阶级社会中，不管我们的主观意愿是否承认，阶级斗争一直都在。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一直对被统治的阶级进行着斗争，其方式常常表现为暴力镇压、金钱收买与精神奴役。

马克思指出来阶级斗争，等于是把资产阶级统治这个世界的秘密大白于天下了，这直接导致了被统治阶级的觉醒，这一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马克思学说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你称赞与“共产主义”有关的话题时，其控制下的媒体舆论对你都是不友好的，轻则批斗你，重则暴力暗杀你，黑豹党的休伊·牛顿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这是统治阶级内部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心知肚明，但是他们只做不说。他们改造后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往往会给“共产主义”贴上“集权专制”、“黑暗”、“暴力”、“冷酷无情”的政治不正确的帽子，借此提醒被统治的群体远离这些政治不正确。

而如果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人跟你说阶级斗争不存在或者是打着反对平均主义的旗号不让你说阶级斗争，你要警惕一下。事实上毛泽东时代也是八级工资制度，农民也有自留地，毛泽东本人也不认为养四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当时作为留学3年回国的知识分子杨绛，月工资是241.5元，而农民的普遍月收入5元。很明显，那些打反对平均主义旗号的人的目的是不让你反抗阶级的压迫。

于是我们就理解了，马克思说的阶级斗争是在描述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而毛泽东抓的阶级斗争，其实质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反抗。

阶级反抗的目的就是追求多数人的自由、民主。这个理念追求的是个人的全面发展，让个人能够被少量剥削直到生产力的发展不被剥削。

毛泽东说过：人是第一生产力。

解读过来的意思是说普通人被剥削的愈少，那么普通人的发展愈加全面，那么必然会爆发巨大的生产能力，原本每天在私企只能得到5块钱，经过反抗得到20块，倒逼企业更强大的盈利能力，提高整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可以挣全球的钱；再比如在国企原本看着厂长的脸色干活儿后来经过反抗变成了监督着厂长而使自己成为了工厂的主人，像原来的鞍钢一样，你说生产的积极性会不会更高呢？再比如因为普通人反对医疗教育等行业的产业化，促使其按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方向发展，避免自己被割韭菜，所以普通人会有更多的余钱进行消费，这是不是又提高了商品的流通速度，进而提高经济的发展呢？再或者因为普通人被剥削的少，所以贫富差距不会很大，拜金主义、奢靡之风、享乐之风是不是会大

大地降低了，这个时候的普通人更看重的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而不是物质利益，所以这必然会爆发出更多的创造力，于是更多地科学家也就诞生了。所以会有下面的一条逻辑关系，阶级反抗的愈剧烈，普通人被剥削的程度愈低，生产力愈加提升，所创造的财富越多，经济发展越快。所以，根子还是在为人民服务上，是为普通人服务还是为精英服务？把保护企业家、保护知识分子的法条多用到保护普通人身上才是正道，别的都是舍本逐末。用现在的蛋糕论来说就是，做大蛋糕的前提是分好蛋糕，这样才能有干劲儿，经济才能得到持续性发展。

事实上这套逻辑对不对呢？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在遍地文盲的土地上建国的，仅仅用了 27 年的实践，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就有了：青蒿素，以及同等级别的研究成果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那么为什么要把阶级反抗当作核心的纲领呢？毛泽东认为，阶级社会中最主要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其他的一切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都是通过阶级矛盾而被放大的，统治阶级总是想办法把阶级矛盾转移到民族、地域、性别、文化这些地方。只要抓到了阶级矛盾这条线，相当于是釜底抽薪，一下子抓到了蛇的七寸，性别矛盾、民族矛盾、区域矛盾等自然就弱化了。当然了，不要极端化理解毛泽东所说的话，不要把所有的矛盾都说成阶级矛盾，也不要把阶级斗争理解为必须暴力流血。

他把这个事情看的很重很重，很担心未来的普通人会忘记，所以他很多的讲话看来好像是在对未来讲的，他在 1962.9.24 日在怀仁堂说：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

总结出来一句话：抓革命（阶级反抗）不仅仅可以减少社会矛盾，也必然促进生产力的提升。

这个论断在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很受重视。

美国经常性给老百姓发钱，大面积发低保；作为革命老区的法国人也早已经告别 996 了；连小日本的佳能都化身资本家的道德楷模了。看似好像资产阶级吃亏了，其实这是双赢，这不仅消灭了革命产生的土壤，更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发展了经济，资产阶级挣的钱也更多了。其实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对马列毛主义的研究学习是很深入的，嘴上不承认身体很诚实，想要不被革命，那就自我革命。西方资产阶级的统治能力比我们这的资产阶级成熟的多。

有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个服务性质的工作，并没有付出多少有价值的劳动呀，如果要求高回报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大可不必。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种矿产等都有你的一份，千万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国有企业，也有你的一份，70 多年积累的科研技术生产能力也有你的一份儿，5000 年文明积累下的文明思想更有你的一份，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全面的资源，算成钱摊到每个人身上其实还是

很多的，更不要觉得你是服务员、搬砖工、销售员就觉得自己工作没什么价值，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作只是分工不同，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要理直气壮的要钱！

所以，回到问题，这个提问本身并不成立，因为阶级斗争与经济发展是因果关系而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想要搞好经济一定要抓阶级斗争，否则就不具备可持续性，财富都被统治阶级拿走了，越发展躺平的越多，属于空喊发展经济。

# 为什么民族主义的战斗力相比别的主义更加强大？ 为何近代国家多以民族主义作为团结国家的意识？

文/高林  
载/大石内藏助 3152626835

1，为什么“为了民族（国家）而战”所凝聚的战斗力比“为了国王”或“为了上帝”表现的更为强大（比如法国大革命）。

2，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以后，民族主义成为团结国家最有效的手段，而普世帝国、政教合一国家在与民族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常常是失败的一方。

民族主义定义了谁是敌人？谁是自己？

民族是排它的共同体？

把这两条结合起民族主义定义的敌人是谁？“非我族类的所有人都要消灭？”

民族主义定义的自己人是谁“跟我讲一种语言、看起来差不多、有共同记忆的人？”

那为什么民族主义者还这么喜欢抓 x 奸？

不是一个民族就是自己人了么？怎么还得必须听你的话、跟你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是共同体？

那你们的民族真的是语言、文化、相貌决定的么？还是顺你们则昌、逆你们则亡呢？

问到这里民族主义的本质也就来了。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用来弥合社会撕裂的东西。当人的责任和权力不相符的时候社会就会撕裂。我们也是一条命、老爷也是一条命，可我们死了妻子儿女就要饿死，老爷死了，太太少爷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这时候老爷让我们上前线，他在后方该吃吃该喝喝，连个样子都不做？社会能不撕裂么？

要弥合这种撕裂怎么办？讲道理肯定没用，你说多少话，他们一唱国际歌，“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穷人一讲权利和义务的性价比，你只能干瞪眼。

怎么办？那就只能不讲理，怎么才能不讲理？过去有一个可以不讲理的办法就是上帝，“君权神授”陛下让你去就是上帝让你去，这个没道理可讲。

可上帝有教会、君权神授是授给国王。养一个教会、养一个宫廷这都是成本啊。而且它们还可能不听话啊，不替企业家说话啊。

怎么才能既不讲理，让大家不计得失的听话，又保证这种非理性的热情能为自己所用呢？就得在宗教、君主之外树立一个新玩意起到同样的作用还绝对听话，不用担心它跑到“对面”去呢？这时候“民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

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爱国主义”不用非得死抱着“民族主义”不放呢？因为国家有它的制度、有它的利益分配，它到底是属于谁的、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每个人都有切身感受。老舍在剧本里说“我爱它，谁爱我啊？”这一句话就能让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冷静下来。

而且国家有议会、有选举，“无代表不纳税”，这个玩意从一开始就是必须讲理的。讲理就意味着要讲性价比，就违背了“别人必须不计得失”这条初衷。

那怎么办呢？民族咯！你是这个族的就得听话。听话，让干什么干什么，让咬一口不咬两口，不藏奸耍滑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可你要收敢讲理，敢问凭什么？你就不是共同体的一员了！你就是国民不是同胞了。然后你就非国民了。

民族主义就是剥削阶级的精神鸦片，用它来蒙蔽被剥削阶级，让他们无条件的、不计得失的为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自己属不属于它都看别人一句话的共同体卖命的工具。



# 日月奇谈

## 恩义

By 兔十一 2837406775

百年前，曾有一门派名曰明理，于域外光火派习得世间奇功，以图：还星愿予民之愿，内斩各愚众之门，外御犯境之敌。此等奇功，缘起神圣之地，如圣火速流于各地，一时间星火乍现，此起彼伏。可这世间却有异兽名曰茨木，专吃民愿所化之星愿，但惧星火。

初，明理门立派，唯以光火为则，冠以正道之名，付信于饕泯门，弃之火，遭灭门。幸得一踏遍山野乡间，广悉民愿之人，名曰：东方宏，于十门岗立派，存明理派之火。东方宏，生于水古月之南，少得志，欲与民同斩茨木。

历经二十八载，东方宏率明理门除犯境外贼，破饕泯门斩异兽。虽茨木之躯不复，但其心形仍化于人中。宏欲除茨木心形，还星愿于民，乃使民修奇功，以星火焚尽茨木心形。

东方宏掌明理门二十七载，精妙奇功，开创新理，与民共筑星愿，民甚爱之，予宏爱称甚多，宏谦，称己为教员，以传奇功，筑星火，焚茨木，还星愿为己任。

明理门立派五十五载，宏逝世，民甚痛惜。同门者关獠稻，数遭民之星火所焚，广结茨木之力，篡夺明理门。有四徒以奇功星火，欲复明理门，遭茨木绞杀，以歪史愚民。稻下明理门，以星愿盈余者济贫者为号，允以茨木夺民之星愿。四十余载，民星愿每况愈下，盖皆聚于茨木。初民甚恶，却已失奇功星火，无可奈何；后稻领明理门与外勾连，将宏之史掩盖篡改歪曲，愚民曰星愿本乃茨木所赐，今之明理门乃为真理也，冠之以特色实际之名，假以为民之义，行饕泯之事。

明理门立派九十九载，遭大瘟，民皆中毒也。初，稻明理门派下，欲如故掩其事，未料此瘟可燃星火，瘟势甚危，稻明理门先保己，后以解毒剂予民，使民共抗瘟。民得一时之救，此自宏逝四十余载复觉明理门之暖，稻明理门以此，广招弟子，笼络民心，一时间竟如沐春风。后，瘟势复发，稻明理门难掩茨木心形，民复中毒，稻明理门无可奈何。民复陷茨木之害中，其中宏之子弟言：稻明理门实乃茨木余孽，当除之以利民。稻明理门乃用权势，捕其人灭其口。愚民曰：吾战瘟利民也，批吾者乃忘恩负义违民之人，乃欺师灭祖辱明理门先烈之人，此乃民之共敌，当除之。

民跪将己星愿付予茨木久矣，唯宏时可站着有己星愿，若明理门实乃宏徒掌权，岂能深遭恶瘟之害？且战恶瘟者民也，何人可以人民之名义招摇撞骗邪？茨木不除，民终将跪受星愿，唯举星火斗争之旗，依民以共除茨木，方可将星愿织成星空于每个人。

译：一百年前，有一个叫明理的武林门派，在华夏之外的地方学到了这世界上的一种奇特的功法，于是明理门想通过这种奇功谋求，把星愿还给民众，在华

夏将各个欺骗民众的门派斩草除根，把侵略华夏的外敌驱逐。这种奇功，源自于神圣帝国，像圣火一样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一时间星火在世界各地出现，此起彼伏。但是这世界上却有一种叫做茨木的异兽，专门吃民众的愿望现实后所变成的星愿，却会害怕星火。

一开始的时候，明理门创立门派，只以光火派的奇功作为准则，并且给自己戴上正统道路的称号，信任饕泯门，丢掉了自己的星火，遭到了饕泯门的屠杀。幸好有一个人，走遍乡间山野，与民众联系密切，了解民众的愿望。他是东方宏，在十门岗这个地方重新建起明理门，将明理派的希望星火保存了下来。东方宏，生在一个叫水古月地方的南边，年少的时候有远大的志向，想和民众共同把异兽茨木斩杀。

经过了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东方宏带领明理门把侵略华夏的外敌赶跑，斩杀了饕泯门异兽茨木的身躯，报仇雪恨。虽然茨木的身躯已经被消灭，但是它的心形还存在一些人身上。东方宏想把茨木的心形也彻底消灭，把星愿还给民众，就让民众都学明理门的奇功，然后自己用星火把茨木的心形也焚烧殆尽。

东方宏做明理门的掌门二十七年，把奇功的精巧机妙都学透，并且开创了新的奇功内容，和民众一起把星愿织成所有人的星空，民众非常爱戴他，给他很多敬爱的称呼，东方宏非常谦虚，就只把自己叫做教员，把将奇功传给民众，让星火燃烧更加热烈，焚毁茨木身心，将星愿还给民众作为自己的责任。

明理门创立门派的第五十五年，东方宏与世长辞，民众非常痛惜。和东方宏一起在明理门的关獠稻，多次遭到民众用星火焚烧他的茨木心形，他大肆与有茨木心形的人结交，最终篡夺了明理门的掌门位置。有四个东方宏的门徒，用奇功星火想光复明理门，但遭到了明理门下茨木心形附身的人联合绞杀，他们把历史改写，用被扭曲的历史欺骗民众。关獠稻这些茨木心形附身的人，他们掌控的明理门，把有星愿多的人要带着星愿少的人一起编织星空作为口号，允许人用茨木去抢夺别人的星愿。四十多年来，民众自己的星愿越来越少，因为都被用茨木力量的人夺走了。一开始的时候，民众非常讨厌允许茨木的存在，但因为失去了有奇功星火的人，没什么办法只能接受；之后，关獠稻这些人掌控明理门和外面的茨木势力相勾结，把东方宏带领明理门这一历史时期的事实都掩盖掉，然后换成一些篡改歪曲过的历史，欺骗民众说：民众的星愿都是茨木给的，现在的明理门所学的奇功才是真正的奇功，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这是结合实际出来的特色真理。他们用为了民众星愿的名义，让茨木横行在世间，干着当年饕泯门干的事。

明理门创立门派的第九十九年，华夏遇到了百年难得一遇的瘟疫，老百姓都被瘟疫感染中毒。一开始，关獠稻这些人掌控的明理门，想要用和以前的手段，掩盖瘟疫这件事，没有想到这次瘟疫可以点燃民众的星火，瘟疫形势非常危险，关獠稻掌控的明理门先保护自己这些茨木化身的人，然后再把解毒剂给民众，让民众自己共同去抗击瘟疫。民众得到了一时的解救，这是自从东方宏逝世四十多年来，民众第一次再感受到了明理门的温暖。关獠稻这些人的明理门就凭借这次抗击瘟疫，在华夏招揽大量的人进入门派学习茨木之功法，笼络民众的心，让他们信服现在的明理门，一时间内，明理门竟然又和当年东方宏带领下的明理门受到了许多支持。然后，瘟疫突然再次爆发，关獠稻这些人掌控下的明理门，很难掩盖他们茨木吃人的心形本质，对待瘟疫不作为乱作为，民众再次遭到瘟疫的毒害，关獠稻这些人掌控下的明理门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瘟疫。民众又深陷茨木的危害中，民众之中有东方宏的子弟说：关獠稻这些人掌控下的明理门实际上就是茨木的代言人，应该推翻他们，解救民众。关獠稻这些人利用明理门的权力和

势力，把东方宏的子弟抓了起来。欺骗民众说：我抗击瘟疫是为了民众，谁敢对我有什么意见，就是忘恩负义，违背民众的人，就是欺师灭祖，侮辱明理门那些先烈的人，这种人是民众共同的敌人，必须除掉。

民众跪着把自己的星愿给茨木已经非常久了，只有东方宏这些人带领的时期，民众能够站着拥有自己的星愿。如果明理门还是东方宏这些人带领的，民众怎么会遭到瘟疫如此严重的危害？而且，与瘟疫战斗的始终是民众，什么人用民众的名义招摇撞骗，把战疫的功劳给自己？茨木残害民众很久很久，偶然对施舍还给一些星愿给民众，就把茨木美化，让民众永远要供着茨木，跪着接受自己的星愿。只有把用星火斗争的大旗举起来，依靠民众共同把茨木焚烧殆尽，才可能把星愿织成星空，让每一个人都在星空下。

# 烟魔

文/大石内藏助 3152626835

烟草这种植物，本来中国是没有的。那么它是什么时候从国外移进来的呢？关于年代，种种记录并不一致。有的说是唐朝，也有的说是明朝。到了道光十年<sup>1</sup>左右，全国各地好像都有了。咸丰年间<sup>2</sup>，吸烟已普遍流行，甚至出现了这样一首世态讽刺诗：

且莫言有禁烟令，  
空文一纸禁言令；  
皇上御旨无人听，  
华佗诊病也不灵。

烟草又是谁带进来的呢？举凡历史学家都会回答说，是英国人或阿拉伯人。但未必尽然。传说中，另外一种回答。据说烟草是魔鬼从什么地方带来的，而魔鬼又是夷狄<sup>3</sup>教神父（多半是方济各司铎<sup>4</sup>）不远万里带到中国来的。

这么一说，夷狄教徒也许责备我诬蔑了他们的神父。依我说，事实好像确是如此，因为夷狄的天主来到的同时，夷狄的魔鬼也来了——输进西洋的善的同时，也输进西洋的恶，此乃极其自然之事。

但是魔鬼是不是真的把烟草带进来了呢？这一点我也不敢保证。据阿纳托尔·法郎士<sup>5</sup>的作品，魔鬼曾企图用木樨草<sup>6</sup>花来诱惑一位修士。即使是捏造的，在某种意义上也许会意想不到地接近于事实呢。由于具有上述看法，我想在下面记载一个输入烟草的传说。

嘉靖三十一年<sup>7</sup>，魔鬼变成方济各·沙勿略手下的一名传教士，经过漫长的航程，安然无恙地来到中国，起初因为海禁而未能进入内地，但好在万能的主会在登陆后自行蔓延。魔鬼之所以能变成一名传教士，乃是因为那个传教士本人在妈港还是什么港口上了岸，一行人所乘的船只就起了锚，把他撂在岸上。魔鬼一直把尾巴卷在帆桁上，倒挂着暗中窥伺船里的动静。于是，它就摇身一变，变成了那个传教士，成天伺候方济各司铎。当然，倘若这位先生去造访海瑞，他还能变成权高位重的淳安知县呢。这点把戏耍起来算不得什么。

可是到中国一看，跟他在西洋时读过《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大相径庭。首先，游记把这个国家描述得似乎遍地是黄金，但是到处也找不到这样的迹象。看光景，只要用指甲搓搓十字架，把它变成金的，就颇能诱惑此地的人们。马可·波罗还说，中国人靠神仙力量获得了起死回生之术，这恐怕也是乱说的。既然是乱说的，只要见井就往里面吐口唾沫，让疫病流行，大多数人将会痛苦得把死后升天堂的事忘得干干净净。——魔鬼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跟随方济各司铎到处参观，心里这么想着，兀自踌躇满志地微笑起来。

但是只有一件糟糕的事，就连魔鬼也无可奈何。方济各·沙勿略乍来到中国，

<sup>1</sup> 道光十年是 1830 年。

<sup>2</sup> 咸丰年间是 1851 年到 1861 年。

<sup>3</sup> 封建中国华夷观，将外国人称为夷狄，文中将天主教叫作夷教，天主教堂叫作夷狄庙。

<sup>4</sup> 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司铎是神父的尊称。

<sup>5</sup> 阿那托尔·法郎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评论家。

<sup>6</sup> 木樨草分布于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其花为白色或淡黄白色（栽培中亦有橙红色和红色）。

<sup>7</sup> 嘉靖三十一年是 1552 年。

教既没有传开，连一个信男信女也还没有呢，魔鬼也就找不到可诱惑的对象。对这一点，连魔鬼也颇感到尴尬。别的不说，眼下就无所事事，不知道该怎么消磨光阴才好。

魔鬼左思右想，它打算种点花草来解闷。离开西洋时，它就在耳朵眼里装了各式各样植物的种子。至于土壤，从附近借一块田就成了。对此举连方济各司铎也满口赞成。司铎只当自己手下的这个传教士想在中国移植西洋药草什么的呢。

魔鬼马上把犁和镐头借来，耐心地耕起路旁的园子来了。

正当初春潮润季节，隔着弥漫的霞雾深处，咣——传来远处寺院懒洋洋的钟声。声音是那么清越悠扬，不像听惯了的西洋教堂的钟那样怪嘹亮的，当当震耳。——那么。魔鬼待在这样的太平景象当中，是不是心里就感到轻松了呢？才没有那么回事呢！

魔鬼一听到这道钟的声音，马上就皱起眉头，比听了圣保罗教堂的钟声还难受，他就死命地翻起地来。因为人们一旦听到这不紧不慢的钟声，沐浴在明媚的阳光底下，那心情就会奇妙地松弛下来，既不想行善，也不想作恶了。魔鬼特地渡海来诱惑中国人，这岂不白跑一趟吗！魔鬼顶讨厌劳动了，以致由于手掌上没有茧子，挨过伊凡的妹妹的责骂。它为什么如此卖力地抡起镐头来了呢？纯粹是为了取走那一不小心就会缠住它、使它变得有道德的那种瞌睡才这么拼命的。

魔鬼终于花了几天工夫把地翻好，然后将藏在耳朵里的种子播种在垄里。

又过了几个月，魔鬼撒下的种子萌芽，长茎，到了当年的夏末，宽阔的绿叶子把园子里的整个土覆盖了。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种植物叫什么。连方济各司铎都亲自问魔鬼，它都只是咧嘴笑笑，默不作声。

后来这植物茎部的顶端开了一簇簇的花儿，是漏斗形的淡紫色的花。魔鬼大概因为辛勤劳动过一场，花儿开了，感到颇为高兴。早祷和晚祷后，它就来到田里不遗余力地莳弄。

有一天（这事儿恰好出在方济各外出几天去传教的期间），一个农民牵了一头黄牛打园子旁边经过。一看，一个身穿黑袍、头戴宽边帽的夷狄传教士在围着篱笆、紫花盛开的园子里，正一个劲儿地给叶子除虫呢。那花儿太罕见了，农民不由得停下步来，摘下斗笠，毕恭毕敬地向那个传教士招呼道：“喂，神父大人，那是什么花儿呀？”

传教士回过头来。他是红毛儿，矮鼻子，小眼睛，一看就是个好脾气的人。

“这个吗？”

“是啊。”

红毛儿倚着篱笆摇了摇头。他用半吊子中国语说：“对不起，这个名字我不能告诉人。”

“哦？是方济各大人不许你说出去的吗？”

“不，不是的。”

“那你不能告诉我呢？最近我也受到方济各神父大人的感化，信了教，你看！”

农民得意扬扬地指了指自己的胸部。果然，他脖子上挂着个小小的黄铜十字架，但它虽被阳光照耀，却不闪闪发光。也许太晃眼了，传教士皱了皱眉，低下头去，随即用比刚才还要和蔼的语调半真半假地说：“那也不成。这是我们国家的规矩，不准告诉人。你还不如自己猜猜看呢。中国人挺聪明，一定猜得着。要是猜中了，地里长的东西，我全送给你。”

农民还以为传教士在跟自己开玩笑呢。他那被太阳晒黑了的脸上泛着微笑，

故意使劲地歪歪脑袋说：“是什么呢？一时半会儿可猜不出来呀。”

“哎，用不着今天就猜出来。三天之内，你好好想想，再来吧。问人也没关系。要是猜中了，就统统给你，此外还给你红葡萄酒。要么就给你张《人间天堂》画吧。”

对方太热心了，农民未免感到吃惊。“那么，要是猜不着，怎么办呢？”

传教士把帽子往后戴戴，一边甩甩手，笑起来了。他笑得像乌鸦那么尖，农民都有些觉得奇怪了。

“要是猜不着，我就跟你要点什么。咱们是在立契约。猜得着还是猜不着，反正就押这一注。要是猜中了，就全都给你。”红毛儿说着说着，那语调又变得温和了。

“好的。那么我也豁出去啦，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什么都给？连牛都肯给吗？”

“要是你不嫌弃，现在就给。”农民边笑边抚摸黄牛的额头，他好像一直以为这是和蔼可亲的传教士在开玩笑呢。“可要是我赢了，那个开花的草就是我的了。”

“好的，好的，一言为定。”

“答应。我以主耶稣基督之名起誓。”

传教士听罢，一双小眼睛忽闪忽闪的，满意地吭哧了两三下鼻子。他左手叉腰，略微挺起胸脯，用右手摸摸紫花说：“要是猜不中，我就要你的肉体 and 灵魂。”

红毛儿说着说着，抡起右胳膊，摘下帽子来。蓬乱的头发里面长着两只山羊般的大犄角。农民的脸色不禁变得刷白，失手把斗笠掉在地下了。也许是太阳西斜的缘故，地里的花儿和叶子一霎时都失去了光泽。连牛都不知道被什么吓住了，低垂着犄角，以一种大地轰鸣般的声音叫着。

“你答应我的话也得算数。你不是以那个我忌讳叫的名字发誓了吗！不要忘了，期限是三天。那么，再见！”

魔鬼以瞧不起人的、但又假装殷勤的腔调这么说着，又故意毕恭毕敬地向农民鞠了个躬。

农民后悔自己不该麻痹大意，上了魔鬼的当。照这样下去，终归要给那个“恶魔”抓住，肉体 and 灵魂都将在“永无止息的烈火”中焚烧。这样一来，他不是白白放弃过去的信仰而领洗了吗？

但是他既然凭着主耶稣之名发过誓了，就不能收回诺言。当然，如果有方济各司铎在场，好歹还能想出个办法；不凑巧，目前司铎外出了。究竟怎样才能将计就计，不让魔鬼的阴谋得逞呢？他连觉也不睡，足足想了三天。为了做到这一点，非得想法了解那个植物的名称补课。但是连方济各司铎都不晓得，又有谁能知道呢？……

在期限将满的那天晚上，农民终于牵着黄牛，悄悄走到传教士住着的房屋旁边。那座房屋挨着园子，房前就是大道。走去一看，传教士大概也已经睡着了，窗户连灯光都没有。虽然有月亮，却是个阴沉的夜晚，地里寂静无声，这儿那儿，在微暗中依稀能够看到紫花寂寞的姿影。原来农民想到了一个没有多大把握的主意，才强打起精神，蹑手蹑脚来到这里。可是这片万籁俱寂的景物使他望而生畏，他想干脆就这样回去算了。尤其想到那位长这山羊那样的犄角的仁兄正在那扇门后面做地狱的好梦呢，于是勉强鼓起来的勇气也就窝窝囊囊地消失了。但转念一想，怎么能把肉体 and 灵魂交给“恶魔”呢，绝不能这么泄气啊。

于是，农民一面祈求圣女玛利亚的庇护，一面祈求祖宗保佑，一面断然实行



了预先想好的计划。那就是把牵着黄牛的缰绳解下来，照着牛屁股狠狠地打一下，猛地把它赶进园子里去。

牛屁股被打得疼痛难忍，它就蹿了起来，撞垮了篱笆，把园子践踏个稀烂。它还把犄角三番两次撞在房屋的墙板上。蹄子声和哞哞的叫声洪亮地响彻四周，震撼着薄薄的夜雾。这时有人打开窗户，露出脸来。虽然黑咕隆咚地看不清楚，肯定是变成传教士的魔鬼喽，只觉得透过黑暗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它头上的犄角。

“这畜生，干吗踩我的烟草园子！”

魔鬼甩甩手，用发困的声音嚷道。他大概刚刚睡着就吵醒了，气得要命。

农民正躲在园子后面窥伺着呢。魔鬼这话，他听起来觉得就像是耶稣的福音一样……

“这畜生，干吗踩我的烟草园子！”

跟所有类似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结束得很圆满。也就是说，农民顺利地猜中了烟草这个名字，赌赢了魔鬼，并且把园子里长的东西统统据为己有。

但是我老早就认为这个传说恐怕有更深的含义。因为魔鬼尽管未能把农民的肉体和灵魂弄到手，却得以使烟草遍布中国。这么说来，正如农民之获救伴随着堕落的一面，魔鬼的失败也伴随着成功的一面吧。魔鬼连摔个跤也不会白白站起来的。当人自以为战胜了诱惑的时候，说不定已经掉进了圈套呢。

顺便再略记一下魔鬼的下落。方济各司铎刚一回来，就凭着他手里牧杖的威力终于把魔鬼从当地驱逐走了。但是那以后，它似乎仍旧扮作传教士到处流浪。还有关于建立夷狄寺的时候它经常出入京城的记载呢。自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的教禁<sup>8</sup>以来，起初魔鬼还露露面，终于还是完全离开中国了。……关于魔鬼的记载，只写到这里为止。进入咸丰时期后，它再度来华<sup>9</sup>，但对它的活动情况我却毫无所知，不胜遗憾……

---

<sup>8</sup> 清朝教禁：因罗马教皇与清廷发生中国礼仪之争，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下令禁止天主教；各省传教士被驱逐。

<sup>9</sup> 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天津条约》，条约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

## 己

文/大石内藏助 3152626835

这事发生在我上中学二年级的时候。

那年秋天，学校举办了一次历时三天的参观旅行。学校发给我们的通知单上规定：“早晨六点半在火车站集合，六点五十分发车……”

那天，我连早饭也没正经吃就从家里跑出去了。心里虽想，坐车到火车站，连二十分钟也用不了，但还是不由得感到着急。站在公交车站的电线杆跟前等车的当儿，也是焦虑不堪了的。

天公不作美，阴沉沉的，看着很压抑。令人觉得，四下里工厂发出的工人工作的汽笛声一旦震撼那暗灰色的水蒸气，说不定就会化为暴风骤雨，将这压抑着的氛围撕裂。在阴郁的天空下面，火车驰过铁道，运货车驶向被服厂，店铺一片一片地开了门。我站在那里的公交车站也来了两三个人，个个都愁眉苦脸，显得睡眠不足。好冷啊。——这当儿，开来一辆商车，看样子是晚班的，这定是加了班的。

车上很挤，我好不容易才抓住拉柄。这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早上好！”

我赶紧回头一看，原来是能势三十雄。他也跟我一样，身穿深蓝色粗斜哔叽<sup>10</sup>校服，将大衣卷起来搭在左肩上，缠着麻布绑腿，腰上挂着饭盒包儿和水壶什么的。

能势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小学，又进了同一所中学。他哪门功课都不特别好；另一方面，门门功课都还过得去。不过有些事他倒来得乖巧，流行歌曲只要听上一遍就能把曲调背下来，他对戏曲十分厌恶。参观旅行的途中晚上住旅馆，他就神气活现地给大家表演。吟诗作唱、萨摩琵琶、说书相声、魔术戏法，他样样来得。他还擅长于比手画脚、挤眉弄眼来逗人乐。因而我觉得他在班上人缘应该不赖。我和他之间虽有所交往，可是说不上怎么亲密。

“你来得挺早哇。”

“我一向来得早啊。”能势边说边蹙了一下鼻子。

“不过前些日子你迟到啦。”

“前些日子？”

“上语文课的时候。”

“哦，是挨张飞洪罚的那回吗？老马失蹄嘛。”能势经常对老师直呼其名。

“我也挨过那个老师的罚。”

“是因为迟到吗？”

“不，是拒绝参赛争奖。”

“飞虫贪名图利得厉害。”

“飞虫”就是能势给张飞洪老师起的诨号。说着说着，公交车已经开到火车站跟

---

<sup>10</sup> 哔叽：密度较小的斜纹的毛织品，小说中为上层阶级才能用得起。

前了。

公交车还是像上的时候那么挤，好不容易才下了车，走进火车站一看，时间还早，同学才到了两三个。我们相互说了声“早上好”之后，就争先恐后地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坐下，照例兴致勃勃地聊起天来。在我们这个年龄，都以“老子”代替“我”，自鸣得意极了，但我却独善一身。自称“老子”的伙伴们，大谈对这次旅行的估计，议论旁的同学，并说些老师的坏话。

“老泉可鬼啦。那家伙有一本老师用的英语课本，听说他事先一回也没看过呢！”

“神更鬼。据说考试的时候，他把历史事件的年代都写在指甲上了！”

“说起来，老师也鬼。”

“可不是鬼吗！育仁连 receive 这个字是 i 靠先还是 e 靠先都拿不准嘞，就考那本教室用的课本好歹糊弄着教呢，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留到现在的。”

我们开口一个“鬼”，闭口一个“鬼”，没一句正经话。能势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工人，在读报，他的鞋不但失去了光泽，而且前头还裂了口。当时流行一种“马金莱”鞋，能势在对其百般嫌弃中就送给这个人一个诨号，叫“啪金莱”。

“‘啪金莱’可真绝啦。”大伙儿不禁笑了起来。

我们越发得意，就去注意出出进进候车室的形形色色的人，并一一加以只有我们这种大城市的中学生才说得出来的刻薄的讥讽。在这一点上，我们当中没有一个逊色的老实人，我也不例外，其中尤以能势的形容最损。

“能势，能势，看看那位大娘。”

“她那副长相活像一只怀了孕的海豚。”

“这边的搬运夫是不是也应该像个什么。你说呢，能势？”

“像虾瞪人。”

最后能势把所有坏话都包下来了。

这时同学其中的一个发现了个古怪的人，站在列车时刻表前面，查对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他身穿暗褐色戏服上衣，但很容易就看出来那是穿了许久的旧的西服，它甚至没有被熨斗烫平过。那人深灰色粗裤子里的两条腿细得像跳高用的撑杆一样，宽边旧式黑礼帽下露出花白的头发，看来已上了岁数，脖子上却围了一条黑白格子的醒目的手绢，腋下紧紧地夹着一根长长的木竹手杖。不论服装还是举止，活像是把讽刺漫画上的插画剪下来，将它立在这熙熙攘攘的火车站里了。由于找到了新的笑柄而兴高采烈的同学们，乐得两肩直颤，拽拽能势的手说：“喂，你瞧那家伙怎么样？”

于是，我们就把视线集中在那个怪人身上。那个人脸部略挺，从西服下的补丁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系着紫色绦带的的手表，一个劲儿地核对时刻表上的钟点。我虽然只瞥见了他的侧脸，却一眼就认出那是能势的父亲。

但是在场的同学谁也不知道。个个都想听能势恰如其分地形容一下这位滑稽的人物，于是大家兴致勃勃地盯着能势，准备大笑一场。我当时作为一个中学二年级的学生，是无从揣度此时此刻能势的心情。我差点儿冒出“那是能势的 father 嘞”这么一句话。

这当儿，我听见能势说道：“那家伙吗？他是个伦敦乞丐。”

不消说，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有人还故意挺起脸，掏出表，学能势的父亲姿势。我不由得低下了头，因为我没有勇气去看当时能势脸上作何表情。

“说得妙！”

“瞧，瞧他那顶帽子。”

“贫民窟里才找得到吧？”

“贫民窟里也找不到的。”

“那么只好到博物馆去喽。”

大家又趣味盎然地笑了。

阴天的火车站黑得跟黄昏时分一样。我在半明半暗中悄悄地打量着那位“伦敦乞丐”。

不知什么时候透出了微弱的阳光，窄窄的一条光带从高高的天窗朦朦胧胧地照射进来。能势的父亲正好处在光带中央。——不论目光所及之处还是不可见之地，周围一切都在活动，并像雾一样笼罩着这栋巨大的建筑物，难以辨别这是人声鼎沸还是燃油机的轰鸣。然而唯独能势的父亲却一动也不动。这个身穿旧式西服、与现代社会风马牛不相及的老人混在川流不息，山止川行的人的洪水中，斜戴着过时的黑礼帽，右手掌心上托着系着紫色绦带的手表，依然像讽刺漫画的剪影那样伫立在列车时刻表前面……

事后我暗中打听出，能势的父亲当时正在工厂里工作，担任工会要职，为了在去工会开会讨论工人权益保障的途中看看自己的儿子跟同学一道去旅行的场面，才特地到火车站来的一——事先他也没告诉儿子一声。

中学毕业以后，能势三十雄在三十岁时因为患肺结核死了。我们在中学的图书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我站在戴了制服帽的能势遗像前致悼词。我在悼词中有这么一句：“你素日孝敬父母……”

## 何以斗争？

By 兔十一 2837406775

古往今来，华夏之地，不乏踌躇满志，一心为民，以身许国之人。在这之中，有人建功立业，赢得生前身后名；亦有许多人壮志难酬，思古讽今心悲愤。

古时的许多爱国文人是后者。他们的爱国，大多表现在笔杆子之下，或期望当朝统治者。其流传下的诗文，多为批判统治者，希望其能做出改变；又或是表达内心的悲愤无力，以昭示自己的爱国心。谈起事迹，多为在官场上，参与权力争夺，可往往以徒劳告终。他们的爱国心毋庸置疑，用笔杆子为爱国事业所作贡献也值得称颂。但无论是他们的爱国心，还是笔杆子，都表现出对统治者的依赖性，指望统治者为他们创造建功立业的条件和机会。他们的一生，大多在忧国忧民却又无可奈何悲愤中度过。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论其原因，在于过多依赖于客观条件，却未能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进行有效的实践去改造客观条件，最后在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不平衡不匹配的矛盾下，陷入一种爱而不得的心境。

想为国为民，却不去依靠人民，那只能受制于统治者，难有作为，空有才华。

文人就一定只能依靠统治者的权力吗？非也，还有爱国文人，虽然壮志未酬，亦赢得生前身后名，施展了才华。抗金名将岳飞，就是典例。有人说，岳飞是武将出身，兼备文韬武略，不完全是文人，当然能用枪杆子干实事。如果以此为由，那么在安史之乱中，参军报国的李白，还有明末爱国诗人文天祥，又是否该给他们安上个武将的名号呢？所以，为民为国，不一定要说有什么权力，又或者能一夫当关。岳飞组织民间力量，成立岳家军，将爱国事业同人民联系在一起；李白如此浪漫的诗人，投笔从戎将自己融入人民之中；文天祥自发组织民众，誓死不降。他们拿起笔杆子，又端起枪杆子，为国为民牺牲奉献。他们不会因为现实的残酷，而感到无力与悲愤，他们时时刻刻在奉献，在竭尽所能。究其原因，他们发挥自己的能力和能力，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去实现为国为民的人民事业。

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为了伟大事业的成功，终归是要端起枪杆子的。什么人拥有真正的枪杆子？是掌握军队的统治者吗？如果是，那么他们将无所畏惧。真正能掌握枪杆子，拥有砸烂一切旧事物力量的，终归是人民！所以，笔杆子是要为团结人民的力量，端起枪杆子，砸烂旧事物，完成伟大事业而服务的。而不是一味的宣泄情绪，引起人民反感，失去所有支持。

当今社会，同样不乏为国为民的仁人志士。很多人苦于社会现实的黑暗，心有不平欲图改变，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只能限于批判社会，宣泄不满，最后感叹生不逢时，壮志难酬。

这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信息化发达的今日，各类社交媒体和资讯平台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能随时随地了解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各种灾难悲剧。我们怀着同理心，与遭受悲剧的人们共情，感叹世界不美好；另一方面，回望浪漫理想的革命岁月，让我们产生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同时我们认识到，曾经有过更加理想化的社会，我们认为是现实社会，理所当然应该更加美好，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下，我们会对现实悲观愤懑。

如果沉溺于我们自己从历史中构想出的理想社会中，认为改变现实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只会故步自封壮志难酬。具体表现就是：对统治者的种种行径嗤之以鼻，欲图将其彻底砸烂砸碎，但却不提如何在旧事物的废墟上建立美好的新事物；对

人民的处境感到悲悯怜楚，欲图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但却要把大多数民众贴上愚民的标签；对自己的未来迷茫悲观，欲图做出一番事业，但却有千万种理由拒绝实践付出。

觉得民智未开，那就深入群众中去宣传；觉得社会黑暗，那就为革命事业奋斗；觉得无能为力，那就做好分内该做的事。空谈理想，悲天悯人救不了人民。百年前的革命年代，客观条件比今天更加艰苦，但革命先驱仍然留下了丰功伟绩；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崇敬他们，学习其思想理论。如果我们不愿意和他们一样去干实事，那么可谓虚伪至极，何谈所谓“为人民服务”，又和谈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辩护？

分散的斗争必然导致共同的失败，只有联合起来，依靠人民，才是向一切旧事物斗争的根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要发挥好当今互联网强大的信息传递功能，把革命星火播撒，做好宣传工作，团结人民。



# 彩蛋

1.你试图进入学校，门口保安要求你一定要戴上口罩，否则不能进入。当你越过他一步之后，摘下口罩，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保安对你不闻不问，并且里面的人大多也没有戴口罩。

问：保安的行为是为了（ ）

- A. 疫情防控
- B. 免除责任
- C. 钝角

2.有一所学校，关上校门，对学生号召“非必要不出校”，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教职工们仍可自由穿梭。

问：此处的“非必要不出校”是为了（ ）

- A. 疫情防控
- B. 免除责任
- C. 钝角

4.有一所学校，课堂上无需间隔就坐，食堂一位难求，放学摩肩接踵。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组织全校核酸或抽样核酸检测时，有人却要求“请同学们戴好口罩，保持一米间距”。

问：其含义是（ ）

- A. 防止病毒扩散
- B. 为了拍照好看
- C. 钝角

5.有一所学校，为防止复现楼道内打球失误导致高空坠物，禁止学生携带任何球类运动器材，并审查教室内是否存放有相关物件，一经发现将批评教育。

问：该学校禁止学生携带球类运动器材的原因是（ ）

- A. 减少安全隐患，防止意外发生
- B. 学校领导担责，一刀切省事儿
- C. 钝角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是可行的！

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是可行的！

